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夏河·拉卜楞寺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7·4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李振宇　张正龙　石为怀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述林　毛存显　米　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张　伦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　中　彭晓峰　谭得胜

主　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　辑：孔令奇　李佳潞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32期 2017·4

·特 载·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新疆四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摘选) ·4·

·史志视野·

天水地方史志领域历史成就探 华 丹 陈 谦 ·8·

·志鉴编研·

地方志书篇目分类述论 梅 森 ·15·

略述地方综合年鉴条目编写的基本方法 王文生 ·27·

·史志研究·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赵鹏团 ·33·

嘉峪关市史志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杨生宝 ·38·

·史志探源·

兰州水车研究 邓 明 ·42·

GANSU SHIZHI

·旧志再现·

《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　高启安　·52·

·史地考证·

秦国“西都”考述　袁智慧　·59·

·史海钩沉·

庄浪卫蒙古裔姓氏源流考　周朝阳　·64·

·人物春秋·

张世英与清末秦州地方自治　陈尚敏　·68·

抗击吐蕃收复河陇的归义军首领张议潮评传　程对山　·74·

·史志快讯·

甘肃省志9部志稿通过复审　·14·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向省政协文史馆赠送志书　·32·

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荣获“全国方志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51·

甘肃省志四部专志通过终审　·80·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新疆四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摘选）

【编者按】2017年8月1日，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工作推进会暨援藏援疆工作座谈会、“继承中华传统，弘扬方志文化”论坛暨2017年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会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出席会议并作题为《聚焦主业，履职尽责，用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讲话。现将李培林讲话摘要刊登，以供学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继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6年“加强修史修志”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后，2017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要“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全国地方志工作总的趋势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定位更加清晰、要求更加明确，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工作任务更加明确，地方志事业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没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就会错失良机。这次在新疆伊犁召开会议，目的是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凝聚力量、抓好落实，既要全面促进完成“两全目标”，又考虑到西藏、新疆、兵团的实际困难组织商讨援助机制、模式，同时通过论坛和理论研讨进一步明确地方志工作的定位等，这是新形势下深入贯彻中央精神的具体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深刻认识按时保质完成“两全目标”的重大意义

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省省有志鉴、市市有志鉴、县县有志鉴，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是地方志事业实现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重中之重，意义重大。

一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两全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衡量是否实现全面实现小康，关键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高度、新水平。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志鉴编修是基础性文化工程，是地方志工作的主业，“两全目标”的完成，将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和极为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是全国地方志系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工程。

二是从树立文化自信看“两全目标”。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的重要论断。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体现的是

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植根于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深厚积淀，植根于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地方志传承数千年而不断，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志鉴成果，记录的是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蕴含的是当地祖祖辈辈人民积淀的历史智慧，对培育民众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意义重大，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最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国主权、管辖权的文化宣示。

*三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看“两全目标”。*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和魅力所在，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代代相继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是最为久远的赓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要揭示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离不开志鉴成果。在当代中国，志鉴成果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继承发展的重要支点，蕴含的方方面面的重要国情、地情信息，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次“继承中华传统，弘扬方志文化”论坛，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深入研讨，进一步明确方志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

*四是从地方志事业发展看“两全目标”。*要认清地方志事业发展，就必须清楚地判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古代地方志编修相比，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地方志事业发展历程，根基在于志书编纂。“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经过古代从地记、图经、宋代志书定型、元明清古方志的繁荣，到民国的转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一本志书编纂，到综合年鉴编纂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一直到目前的“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原生动力在于志鉴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基在于志鉴编纂，没有志鉴编纂就没有地方志事业的诞生、发展、繁荣、升华。

二、清醒认识完成“两全目标”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两全目标”的提出，截至目前已经两年。两年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采取多项措施、多种手段，坚持依法治志，认真贯彻“一纳入、八到位”，全面开展宣传、提高认识，加强顶层设计，依靠党委政府出台规划和设定时间表、路线图，利用行政督查、年度考核、表彰先进等多种手段强力推进“两全目标”，取得了重要的成绩，部分省份有了重大突破，预计在2017、2018年可以全面完成。为了全面摸底、实时掌握各地“两全目标”推进情况，2017年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专门发文就“两全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细致统计。从统计情况和这次会议各地上报的材料看，按时保质完成“两全目标”，形势不容乐观，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是进度推进还不够理想。*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末，全国第二轮三级志书规划5652部，其中省级志书2346部、地市级志书390部、县级志书2916部。三级志书共出版2464部，占规划总数的44%。规定的334部地级市综合年鉴编纂，324部实现一年一鉴，5%没有实现一年一鉴，12.75%没有实现公开出版。规定的2844种县级综合年鉴，2543种启动编纂，尚有21个省区市的301种未启动编纂工作。距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还剩三年左右的时间，必须下大力气、大决心推进。

*二是工作措施还不够得力。*近三年来，在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为完成“两全目标”各地采取了不少办法措施，有不少创新，出台了包括行政督查、编纂规范、志书评审、行文准则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强有力的工作手段推进。但同时还要看到，部

分地区还存在重视不够、措施不得力、进展缓慢等情况，比如有的还没有上报党委政府出台本地的规划纲要，有的没有明确完成“两全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有的面对进度缓慢状况一筹莫展、听之任之，有的以存在机构、人员、经费等问题为理由畏难不前，等等。思想不够重视、措施不够到位，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全目标”的推进进度。

三是区域发展还不够平衡。根据统计结果，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轮三级志书出版总完成率超过50%的只有10个省市，完成率在40%～49%的有5个省区，完成率在30%～39%的有8个省份，完成率低于30%的还有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以看出，“两全目标”总完成率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突出，而且这种不平衡跟经济发展现状不存在因果关系，有的西部省区市抓得紧，进度反而快；有的中东部省区市因为种种原因，情况反而不容乐观。当然，如果从机构、编制、人员、经费来看，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西藏、新疆、兵团存在的困难更多。

四是质量建设还不够完善。质量是志鉴编纂出版的生命线和底线，中指组及其办公室一直强调，在确保进度的同时，要保障志鉴质量，以“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责任感和担当，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的志鉴成果。这几年，各地强化志鉴质量的流程控制，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在质量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应看到，志鉴质量建设仍然在路上，甚至有些志稿都已通过终审了，还存在政治问题、史实问题、体例问题、资料问题、行文规范问题等，把关不严、审查不实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志鉴成果如果正式公开出版，不仅不能给地方志系统带来荣誉，相反，会给地方志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为国家和地区发展带来麻烦，需要敲敲警钟，引起重视。

五是队伍素质还不够过硬。人始终是决定工作和事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最近几年，通过公务员招录、人才引进、临时聘用等，地方志系统补充了新鲜血液，特别是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业务骨干，队伍素质总体有所提升。志鉴编纂需要有专业要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这就决定参与的人员必须具有专业的水平，才能够胜任岗位的需求，才能编纂出高质量的志鉴成果。虽然，这几年的队伍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学科带头人、业务骨干缺乏，人员流动性大，志鉴编纂人员知识基础不够扎实等现象还未彻底扭转，需要花大力气改变。

三、把完成“两全目标”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当前，距离2020年只剩下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两全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没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信心和决心，没有顽强拼搏的劲头和毅力，没有科学的工作规划和手段措施，要完成任务难度较大。这次新疆会议，是对完成“两全目标”的再动员、再部署，是对地方志系统援藏援疆工作的动员部署，务必引起高度重视，把这两件全国地方志系统的大事办好。

一是要狠抓思想认识。现在已经到了能否完成“两全目标”最为关键的阶段，各地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树立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完成“两全目标”对国家、地区基础性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与使命，充分认识志鉴成果的重大社会价值、历史意义，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把工作安排得更细致一些，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完成“两全目标”。

二是狠抓依法治志。按时保质完成“两全目标”，是党和国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法定任务，也是硬指标，务必完成。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一方面要向党委政府主动汇报，争取支持，依法将完成“两全目标”纳入本级政府的工作任务当中；另一方面要明确自身承担的法定职责，依法治志，把按时保质完成“两全目标”作为最核心、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尽职履职，不辱使命。

三是狠抓“一纳入、八到位”。把地方志工作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地方志工作保障体系的明确要求。现在，还有个别地方没有出台地方志工作规划，要尽快出台；各级政府也要按照要求为完成“两全目标”提供相应的机构、人员、经费、设施等保障，才能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四是狠抓“时间表、路线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没有对每一部志书完成进度的精确掌握，就难以切实推进“两全目标”的完成。目前还没有对第二轮规划内志书、年鉴编纂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的地区，要尽快结合实际，特别是围绕到2020年剩余的时间，拿出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路线图”，按照计划全力推进。对于“时间表、路线图”要做到分级管理、上下联动、认真执行。中指办也要建立相应的统计分析系统，实时掌握全国地方志系统“两全目标”推进情况；各省区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要统筹协调、靠前指导，精确掌握每一部志书、每一部年鉴的进度安排，加强管理，全力推进。

五是狠抓行政督查。实践证明，行政督查是推进志鉴编纂的十分有力的工作手段。这次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的同志专程到会对全国地方志系统督查工作进行指导，中指组及其办公室也要建立督查机制，在全国开展定期督查通报。“两全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下来的工作任务，不能听之任之，要纳入各级政府的督查工作内容，强化督查手段，建立督查通报机制，明确责任追究，提升工作效能。还没有开展“两全目标”督查工作的地区，务必在2017年全面开展。

六是狠抓质量控制。没有堪存堪鉴的高质量志鉴成果，地方志事业发展就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强身健体之基。在加快推进“两全目标”完成的同时，务必绷紧志鉴质量控制这根弦，常抓不懈，真正编修出堪存堪鉴的志鉴成果。志鉴成果质量控制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做好编纂流程控制，还要严格审核把关；既要抓好志稿撰写细节，还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史实关；既要提升编纂人员的业务素质，还要严格建立系列规章制度。质量建设，是全国地方志工作常抓常新的命题，特别是在完成“两全目标”进程中，更要紧抓不懈，丝毫不能放松。

七是狠抓援藏援疆工作。完成“两全目标”，关键在西藏、新疆。两个地区的志鉴编纂工作，有些地方是从零开始，难度较大。这次中指组及其办公室专门组织召开援藏援疆工作座谈会，就是要总结经验做法、全面摸清对口支援的需求、探索建立对口支援的模式，举全国地方志系统之力，切实帮助解决西藏、新疆、兵团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中央确定的各对口支援地区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结合两地的实际做好援助工作；其他虽没有被中央列入对口支援的地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要伸出援手。对口支援西藏、新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围绕维护西藏、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认真做好援助工作。

八是狠抓理论研究和业务培训。一支高素质的地方志工作队伍，是事业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当前正处于“两全目标”推进最为关键的时期，面对队伍建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队伍培训加以解决。这次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发挥期刊的理论阵地作用，引导全国地方志系统就志鉴编纂进行深入研究，切实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各地要加大培训力度，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不同的工作阶段，在培训内容、课程设计等做到有的放矢。理论研究和业务培训是提升地方志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业务水平、业务能力的有效手段，越是关键阶段，越要坚持，越要常抓不懈。

天水地方史志领域历史成就探

华 丹　陈 谦

内容摘要：天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统计，天水在民国以前共编修类方志和地方志50部，现存31部，为甘肃各市州存佚方志之最。天水在历史上不仅修撰的方志多，而且编修的名志多，涌现出的修志名仕也多，如清顺治《秦州志》刻本十三卷和康熙《秦州志》抄本，都是珍稀版本，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十二卷和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二十四卷，至今流传甚广，胡缵宗、安维峻、任其昌、王允、冯国瑞等历代名仕，也有精品佳志流传至今。

关 键 词：天水　地方史志　成就初探

天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大量的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人文始祖伏羲氏在这里画八卦、制嫁娶、创文字、兴音乐，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因此，天水又被称为“羲皇故里”。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各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天水各区县。其中大地湾文化层距今7800年～4900年，其早期文化遗址比西安半坡遗址早1000年左右。在发掘的241座房址，378个灰坑灰穴，76座墓葬，35个窑址中，出土各类文物8000多件，其中有绚丽的彩陶、精良的工具、古雅的雕塑和别致的装饰品。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标本—炭化稷和油菜籽，最早的彩陶和古文字鼻祖—彩绘符号，最早的地画和最大的原始房址。这一切，充分说明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华夏民族的祖先便在天水一带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而天水，则是秦的发祥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非子在天水为周王朝牧马有功，周孝王乃“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邑（今张家川县城南）是秦的最早都邑，此后的秦州、秦城等名称，即由此而来。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县份—邽县、冀县，成为形成绵延几千年的中国郡县制的肇始。秦都西迁后的天水，仍然是秦人的大后方和祭祖之地。汉代以来，天水作为“丝绸之路”东段南道上的重镇，是西域经济文化与中原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近年在北道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秦简秦纸及大量汉简，尤其是1986年在放马滩汉墓中出土的一章绘有地图的纸质地图（此图原置于死者胸前、纸薄而柔软，纸面平整光滑，出土时呈不规则的碎片，残片大5.6厘米×2.6厘米，纸上绘有细黑细条绘制的山脉、河道、道路等），更是将我国地图和造纸术的历史大大提前。自南北朝时期相继开凿的麦积山石窟、水帘洞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特别是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集中体现了天水人民卓绝的历史智慧。自冀人石作蜀，上邽人秦祖、壤驷赤从孔门学成后，尤其是作为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石作蜀，在陇上传播先进文化，使文教大兴，人文蔚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文臣武将、学者诗人。如秦国名将李信、汉初功臣纪信，西汉名将李广、段会宗，军事家赵充国，西汉末年“名震西州”的隗嚣，东汉文学家赵壹，三国名将姜维，前秦王朝的开创者苻坚，后凉

创建者吕光，隋代名将王仁恭，唐代名臣权德舆、文学家李翱、军事政治家赵昌，五代时期的大诗人王仁裕，宋代的政治家尹崇珂，明代的著名诗人史志学家胡缵宗，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做出过贡献。清末到民国，任其昌、王权、安维峻、任承允诸家，都品学兼优，著述宏富，或教授乡里，或主持京师大学堂，造就了无数英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天水的地方志成果极为丰富。从南朝刘宋时期郭仲产地方志性质的名著《秦州记》到民国《甘谷县志稿》，天水在民国以前共编修类方志和地方志50部，但有19部已佚失，佚失的这19部志书中，如南朝（宋）修撰的《秦州记》，清代仇兆鳌注杜甫秦州诗，犹多处引用。宋代修撰的2部《秦州记》《秦州图经》，《遂初堂书目》和《玉海》第十四卷都有记载。上述3志，并《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五巩昌府所引《天水志》及乾隆《甘肃通志》疆域、风俗所引《天水记》，至今都已不存，但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籍亡佚，令人惋惜，令人欣慰的是，至今尚存的天水方志，为数仍然可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著录及省、市、县图书馆和地方志工作部门的整理搜寻，天水现存类方志和地方志共31部，其中州志4部、散州志1部、县志18部（包括县志残本1部）、山志2部、见闻录1部、风土调查录1部、乡土教材稿1部、小志1部，天水地名考、天水三字经各1部。现存地方志中，如清顺治《秦州志》刻本十三卷和康熙《秦州志》抄本，都是珍稀版本，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十二卷和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二十四卷，至今流传甚广。民国年间，天水曾二度修志，即《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八卷和《天水县志》十四卷，收藏遍及各地。

天水在历史上不仅修撰的方志多，而且编修的名志多，涌现出的修志名仕也多，下面将天水历史上几位修志名仕及其修撰的名志做一简要介绍。

胡缵宗《秦州志》《秦安志》等　胡缵宗（1480年～1560年），字孝思，又字世甫。号可泉，又别号鸟鼠山人。明巩昌府秦州秦安（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公元1510年后，历经嘉定州判官，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抚，足迹遍及江南、中原。胡缵宗为官爱民礼士，抚绥安辑，廉洁辩治，著称大江南北。1534年罢官归里，遂开阁著书。胡缵宗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性著作除《鸟鼠山人集》《可泉辛巳集》《拟古乐府》《唐雅》《雍音》外，其成就主要在方志学，据统计，其先后修撰过《安庆府志》《秦安志》《巩郡记》《秦州志》《羲台志》《汉中府志》等6部地方志。

《安庆府志》，共31卷。借鉴《史记》等体例，用纪、表、志、传体裁，记述今安徽安庆历史、人文、风俗、物产等。编目：郡县表、疆域表、职官表、古今人表，地理志、建置志、职官志、兵卫志、学校志、选举志、礼制志、食货志、沟洫志、艺文志、祥异志、刑法志，列传。缵宗《安庆郡乘引》言："今之志，古之史也。"《秦州志》序云："《安庆记》（即《安庆府志》），予稍变之，然未仿古也，而览者不以为枝。"《明史》著录，记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正德十六年（1521年）修纂、嘉靖元年（1522年）刻本、抄本均存安徽省图书馆，安庆市地方志办公室所存缺前6册。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逊等循缵宗模式，再修《安庆府志》。

《秦安志》，共9卷。记述今甘肃秦安建置、地理等。卷首有康海、亢世英、关治教序。编次：建置志、地理志上、下，职官志、礼制志、学校志、人物志、田赋志、艺文志。卷末有陈瀛、耿沿义跋。嘉靖十三年（1534年）编纂、十四年由知县亢世英刊印。此志借鉴史体，平行立目，是明代方志佳作。亢世英刻本（1535年）存北京等省市图书馆，清顺治年间增刻本于建置、职官、学校、人物、艺文均补嘉靖十六年（1537年）之后的内容，增刻本及抄本存甘肃等省市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两种明刻清印本各4册，皆是善本书，民国晒印抄本存北京大学图书馆。20世纪70年代，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出版嘉靖本；记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7年，秦安县志办整理抄配本，整理本内有嘉靖十四年后的补续；1990年，甘肃省部分文化、图书界人士成立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将亢世英刻本影印

收入丛书第一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8卷。北京、甘肃等省市图书馆存亢世英刻本，嘉靖十四年(1535)刻、清顺治增修本，分别列入文化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

《巩郡记》，《明史》作30卷著录，残本为20卷。记述巩昌府领秦、阶、徽3州辖陇西、安定、通渭、漳县、会宁、宁远、伏羌、秦安、清水、西和、礼县、成县、两当、文县14县，洮州、岷州、靖远3卫，西固城1守御所；即今甘肃定西市安定区、陇西县、通渭县、漳县、岷县，天水市秦州、麦积区，武山、甘谷、秦安、清水、张川县，陇南市西和、礼县、徽县、成县、两当、文县、宕昌县等19县区，甘南州临潭、舟曲2县，白银市靖远、会宁2县，计5市州23个县区的历史、地理等。编次：第1卷州郡典、州县典，第2、3卷疆域表、郡县表、州牧郡守县令表、古今人物表，第4至14卷地理志、职官志、选举志、仪制志、兵戍志、祥异志、食货志、边防志、艺文志，第15卷历代纪，第16至19卷列传，第20卷叙述。残本保存了明代巩昌府及所辖3州14县的资料。胡缵宗主张志为古之史，《秦州志》自序云："《巩郡记》，予又变之，然未劣(或为略)今也，览者不以为縻。"记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清渭草堂刻本刊行的甘肃最早的坊刻本，北京图书馆存14卷、四川省图书馆存13卷；甘肃省图书馆存1至4卷，又有胶卷存14卷、静电复制存13卷。

《羲台志》，2卷，佚。明《行人司书目》、《宝文堂书目》有引。

《汉中府志》，10卷，佚。《明史》著录存目。

《秦州志》，共30卷，佚。仅存有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首辑录胡缵宗《秦州志》自序，可知大致编目：地理、官师、选举、仪制、边防、食货、兵戎、灾祥、人物等。序云："今之郡县，古之国也，郡县之志，郡县之史也。""若今之史则非三代之史也"，"史所以记也，记古今，记得失，记贤不肖耳。""史也。亦欲被选者。""不识先天，何以学卦；不达黄钟，何以学律吕，欲记之志也。""国朝郡县志，则《(方舆)胜览》之余韵也。故不分门，无所考；不列类，无庸索。""述，述乎古，以诏乎今也；表，表乎物以仪乎人也……考皇述帝，郡不得而纪也，其诸列传允文允武，非程度乎，而圣政巍巍也；克忠克孝，非准则乎，而圣教穆穆也。况循足以劝，酷足以惩哉！"《明史》著录。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纂成，未刻[1]，有散遗，40年后的万历年间，由分巡陇右道李国士主持征遗、补刻，明末清初散佚。《秦州志》在明代被称为嘉靖名志，为诸多名家推荐，现已不存，实为可惜。现仅将胡缵宗《秦州志自序》予以摘录。

《秦州志序》

嘉靖戊午暮春，郡大夫质庵先生枉驾于余鸟鼠山房，因论政教风俗孰王孰霸、孰古孰今。缵宗对曰："巍巍乎！周孔百王之师而万世之宗也。舍周非王矣，舍孔非圣矣。"侯曰："唯。然政不皆关雎也，教不皆邹峄也，如何？"缵宗曰："苟志向一，于是人皆可以为周孔矣。"侯曰："唯。夫秦亦大矣，考之郡未有记也，闻录于傅侯而未成也，故无传。""然无史矣？"曰："然！然郡亦有史乎？"曰："今之郡县，古之国也，郡县之志，郡县之史也。"曰："然则郡记不属之子乎？"缵宗再拜，以不文辞。侯曰："郡有子而无史，可乎？"缵宗曰："秦大矣，昔与雍并，今虽称州，揆之府也。学者学羲皇之易，学轩帝之律，而宗周孔也，夫复何求？"侯曰："唯。然有史以宗周孔而祖羲轩，无则守何以政学，何以教哉。"曰："三代之学然也。若今之史则非三代之史也，故自《方舆胜览》出而世无史矣。"曰："彼备考索耳，考索非学乎？"曰："史所以记也，记古今，记得失，记贤不肖耳。考索岂学乎？"曰："子不究史乎？"曰："经且未穷，况史乎？""然子秦人也，秦记当属之子矣。"缵宗再拜，以非史辞。侯曰："子参对《敬皇实录》，列职户馆矣，列衔圣录矣。"曰："史也，然非史也，未被若选尔！"曰："黄公司徒仲实郡公、太仆思抑非史乎？"曰："史也。亦欲被选者。"曰："然则记

不当属之子乎?"缵宗再拜,弗获辞。复日:"不识先天,何以学卦;不达黄钟,何以学律吕,欲记之志也。"于是复再拜,质之我侯。日:"史也,人皆称《左传》、《国语》,又称《左传》又不称《左传》;人皆称《史记》、《汉书》,又称《史记》又不称《史记》,如何?"日:"传,鲁史尔,史不有《尚书》、《仪礼》乎?记,太史氏创为之者,史不有《周礼》、《春秋》乎?然皆经也。或日经载道,史载事,左、马、班 天水市志 纪事尔。经亦事也,周道也。或以称蜀入寇为非,或以为纪实,或以目秦为闰位为未,或以为明统。然史岂易作哉?国朝郡县志,则《胜览》之余韵也。故不分门,无所考;不列类,无庸索。夫《玉海》类也,然事核焉。《通典》类也,然制该焉。"复再拜,质之我侯。日:"《安庆记》,予稍变之,然未仿古也,而览者不以为枝。《巩郡记》,予又变之,然未劣今也,览者不以为縻。兹《秦记》或以为今而非今也,或以为古而非古也。二泉公尝志许昌,浒西公尝志武功,举世称之,兹记敢比 二志?犹夫二记尔,何以复我侯?是故,述,述乎古,以诏乎今也;表,表乎物以仪乎人也。日地理敷土也,日官师建官也,日选举宾兴也,日仪制遵宪也,日边防御戎也,日食货理财也,日兵戎纪兵也,日灾祥记异也,日艺 文勒实也。考皇述帝,郡不得而纪也,其诸列传允文允武,非程度乎,而圣 政巍巍也;克忠克孝,非准则乎,而圣教穆穆也。况循足以劝,酷足以惩 哉!然皆本之迁史、固书,然迁、固之罪人也。是故,范氏《唐鉴》本之《伊洛》,吕氏《大事记》本之《获麟》,而史不徒作也。然缵宗非史也,如 政教何?"侯日:"可也,殆欲家岐丰而户邹鲁乎?"日:"唯公一德一心者也。"诸父老日:"比观我侯之一鹤一琴,倘如也,必其厚有得者。"诸绅曰:唯父老白之台云。

嘉靖戊午秋七月七日,鸟鼠山七十九翁胡缵宗书。

巩建丰《伏羌县志》 巩建丰(1673年～1748年),字文在,号渭川,别号介亭,晚年自称朱圉山人。伏羌(今甘谷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纂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等。告老回乡,亲授生徒数百人,远近学者尊为"关西师表"。著有《朱圉山人集》、《伏羌县志》各12卷。

巩建丰所著《伏羌县志》,距上部志书修成63年,前序后跋,有依经树则的凡例12则,体例完备,分类明晰。建置志较天启《伏羌县志》详细厚实,地理志记载了汉、新朝甘谷疆域变迁。志书每一纲的前序后论,附圣居宗,反映出纂修者仕途为官谨严,治学勤朴精深、为人师表的儒家理学正统思想,并以其思想、史料秉笔直书。志书内容丰富,史料真实,文字优美,缮刻具佳,版本上乘,堪称一代名志。全志纲目如下:

卷1天文志设星野、气候、图考3目;卷2地理志设沿革、疆域、山川、古迹4目;卷3建置志设城池、公署、仓储、学宫、典籍、祠祀、寺观、坊表、里镇、桥梁、河渠、墩铺、堡砦、邱墓14目;卷4赋役志设田赋、户口、杂项、杂税、经费、俸薪、站支各银两、物产8目;卷5典礼志设庆贺、祀典、兴贤、特恩、讲约、风俗6目;卷6秩官志设县令、儒学、典史3目;卷7选举志设荐辟、进士、乡举、贡士、例监、吏员6目;卷8名宦志附大尹(全志末);卷9乡贤志设人物、儒林、孝行、善士、隐逸、廉义、耆德、义举8目;卷10列女志设义妇、节妇、烈妇3目;卷11艺文志设赞、记、传、诗、赋、序、铭、颂8目;卷12祥异志附僭国传。全志12个分志63目,计8万余字,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王权 任其昌《秦州直隶州新志》 王权(1822年～1905年),字心如,号笠云。甘肃伏羌(今甘谷)人。晚清学者、诗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主讲岷州文昌、秦州天水、宁远正兴、文县兴文书院,造就大批人才。同治九年(1870),任陕西延长知县。后历任兴平、富平知县,政绩优异。兴平任内,陕甘总督左宗棠路过,王权迎谒路旁,左敬佩其为

人，下车扶起说："足下，陇右读书人也，宰相不为县令下车，我为陇右读书人下车。"留谈多时。并给陕西巡抚信中说："王权学问人品，当代罕有，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光绪十二年(1886)，王权辞官回乡。潜心学问，著有《笠云山房诗集》、《笠云山房文集》、《兴平士女续志》、《秦州直隶州新志》等。任其昌(1830～1900)字士言，甘肃秦州(今属天水)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二年(1873)，以母老乞养归。主讲天水、陇南各书院，造就甚多。著有《敦素堂诗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等，《清史稿》有传。

清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清姚协赞、余泽春修，王权、任其昌纂。始修于光绪十四年(1888奶奶)，历1年3个月志成，十五年(1889)陇南书院刻本。编次类目如下：

卷首序及舆地图、卷1沿革、卷2地域、卷3食货、卷4学校选举一、卷5选举二、卷6选举三、卷7选举四、卷8戎政、卷9职官上、卷10职官下、卷11名宦上、卷12名宦下、卷13人物一、卷14人物二、卷15人物三、卷16人物四、卷17人物五、卷18人物六、卷19艺文一、卷20艺文二、卷21艺文三、卷22艺文四、卷23附录、卷24附考。民国张维《陇右方志录?序》曾对《秦州直隶州新志》作其评价："于州县志多有纠正，而辞气冲和，无稍嚣矜，志山水详备，整厘冠陇右诸志。此志体例严密，编次讲究，考证精当，文字优美，是一代名志。"

冯国瑞《麦积山石窟志》 冯国瑞(1901年～1963年)，字仲翔，别号麦积山樵，晚号石莲谷人，甘肃天水人。考古学家，曾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北图书馆编纂等。青年时期跟随前清进士、陇南书院山长任承允(文卿)和翰林哈锐(退菴)窥诸子百家，习经史文辞，为他的学人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22岁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受业于吴梅、王瀣、罗振玉、商承祚等博学鸿儒门下。26岁考入北平清华学院国学研究所(后改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时吴宓为主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掌教习。梁启超评价冯国瑞"其学于穷经训诂为最长，治史亦有特识，文章尔雅，下笔千言，傍及楷法，浸淫汉魏，俊拔寡俦"。冯诗善于用典，兼长诸体。其书法力美雄健，酣畅多姿，巧拙相生，生气郁勃，"似晋唐文采风流，不减古人"(陈半丁语)，"今观仲翔先生所为，仍是依遵唐宋书法家规矩，力求近似原作"(沈尹默语)。冯国瑞一生博学多才，其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文学、历史、训诂、考古、书画等诸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天水地方史研究方面，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并先后辑佚、编著《秦州记》《天水出土秦器汇考》等专著，最早提出天水是秦人发祥地的观点。担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时，冯国瑞又在天水县(今天水市麦积区)甘泉发现两棵唐代所植的玉兰树，遂倡议修建双玉兰堂。1937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欲将自己私人收藏的5万余册珍贵图书捐赠陕甘两省。与邵先生过从甚密的冯国瑞力劝邵力子将书捐给天水，并于炮火威胁中从西安亲自护送其书安全抵达天水，在天水图书馆专辟"邵力子先生纪念室"珍藏。在甘肃省，对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等石窟的发掘、勘察与研究，冯国瑞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开拓贡献。1940年之前，麦积山石窟因道路不通，年久失修，栈道塌毁，凋蔽残破，人迹罕至，一片荒凉。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冯国瑞与地方好友6人相约，徒步入山考察。当时的木质栈道经过千百年风雨的浸蚀，早已破烂不堪，行走时不但吱嘎作响，危险处更是不得不手脚并用。但冯国瑞依然以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感情，攀危崖、探幽洞，从而获得了关于麦积山石窟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次考察是麦积山石窟开窟15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对麦积山石窟以后乃至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考察中看到和接触到的石窟文物，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冯国瑞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憾。神圣的使命感和沉重的责任感使冯国瑞夜以继日，耿耿难眠。他用了两个月时间，编写完成了一部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麦积山石窟志》，从而让世人第一次认识

到了麦积山石窟非凡的艺术价值和让人神往的美丽。现在麦积山石窟前“瑞应寺”匾额就是他1955年所题并书。已刊印行世的主要学术著述有:《秦州纪》《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壮游草》《绛华楼诗集》《张介侯先生年谱》《守雅堂稿辑存》等。

安履祥《甘谷县志稿》 安履祥(1881年～1952年) 字书芝,号啸云。甘肃甘谷人。光绪三十年(1904)以秀才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后,任庆阳中学教员、河州(今临夏州)中学校长、伏羌模范高小校长、甘谷中学教员。安履祥于教学之余,潜心地方文史研究,身临观察,著有《朱圉山志略》、《冀城文献拾遗》、《冀城金石拾遗》、《陇上文献拾遗》《朱圉山志略》等。1963年秋,安履祥次子安升霄以《朱圉山志略》、《冀城文献拾遗》两稿托贾鸿逵请时在兰州的甘肃省文史馆馆员魏绍武、水梓,安履祥的学生、天水甄载明为之写跋,并认为两稿合编为《甘谷县志》方为得体,又拟出目次,魏绍武推举贾鸿逵担此重任,贾采用甄拟的目次,又辑入《冀城金石拾遗》、《陇上文献拾遗》的相关内容,装订成《甘谷县志稿》10卷手抄本。1964年,贾鸿逵编志稿时,两子病逝,生活困苦,其抱痛而为,出售藏书,购得纸张,并付他人抄誊志稿报酬。在魏鸿发的资助下,由其题名、私人编纂的《甘谷县志稿》得以完成。此志距清同治十一年《续伏羌县志》修成92年,距民国18年(1929)《重修甘谷县新志稿》成书35年。安履祥生性甘淡泊,不为名利,以个人之力钩沉辑要史籍,群采博访传闻,将1872至1949年77年间的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伏羌、甘谷县的地方乡土故实史料收集记载下来,弥足珍贵。贾鸿逵先生敦厚直朴,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创深痛中,毅然担当起整理编纂一方史志的责任,使前人遗稿得以一方志书行世,确实难能可贵。由于有他们的劳苦,使得甘谷历史自明有记载始,每个朝代均有记载,堪称修志者的楷模。此志为甘谷县诸旧志字意最详尽者。1964年手抄稿本、复印本存甘谷县档案馆。全志纲目为:卷1舆地、卷2食货、卷3建置、卷4礼俗、卷5职官、卷6教育、卷7人物、卷8艺文、卷9灾异、卷10兵防,以上10纲未尽之事,殿以杂记终。计10纲80余目,约12万字。

除以上天水籍名仕撰写的家乡名志外,天水也有外籍在秦为官名仕主持纂修的名志,这其中首推清顺治宋琬、姜光胤修,王一经纂的《秦州志》。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一年(1654)任陇右道兵备佥事,驻节秦州,减赋税奖励生产。秦州大地震,纾难“出家财,从莱阳邮致,以恤其灾。”捐俸重修秦州城垣。十三年(1656),提议、并同秦州知州姜光胤修《秦州志》13卷,次年刻版印行。后任永平兵备道,十五年(1658)纂修《永平府志》,康熙二年(1663)刻印。姜光胤,字继海,辽东海州人。贡生,顺治十一年至十三年(1654～1656)在任秦州知州,颇有政绩。王一经,字心古。江南吴县人,拔贡。顺治十年至十三年(1653～1656)任伏羌知县,有政绩。宋琬邀以胡缵宗嘉靖《秦州志》为蓝本主纂完成《秦州志》。全志顺治十三年(1656年)修,十四年(1657年)刻本。 编次类目如下:述(州郡述、郡县述);表(疆域表、沿革表、职官表、古今人表);志(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选举志、仪制志、边防志、食货志、兵戎志、灾祥志、艺文志);考(皇记考、帝记考);列传(名宦、列贤、隐逸、流寓、文苑、群雄、孝行、列女、节妇)。全志共分5类,除述、表、考、传外,10个分志。清代秦州志第1次纂修。时秦州为直隶州。顺治十四年(1657)刻本甘肃省图书馆存卷10至13卷,海内珍本,被列入《第一批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将宋琬《秦州志》自序予以摘录:

《秦州志序》

古之君子入人国也,于其山川云物、草木禽鱼诸属,莫不悉而志之,况于人物之大者乎! 于其险要厄塞、蹊径关梁诸地,莫不谨而书之,况于封疆边守之重且远者乎! 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此其所以志也。

今夫秦四塞之地,被山带渭,天府之国也。东有关河,南有汉中,西有巴蜀,北有

代马，故自古帝王都会于此志也。史称秦地，刚决耕绝，修习战备，高上气力，故其诗有“王于兴师，修我甲兵”及《车辚》、《驷驖》诸篇。纪陵有言，疆界虽远，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处耳。大淮以北，地之要害莫过乎秦，故自古弓矢器械、车马之用于斯志焉。若夫！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其风故不远也。敌王所忾，复祖父业，秦世父之秉心忠孝，犹奕奕也。贾生过秦之论，杜甫秦川之诗，非不琅琅听睹也。攻伐战守，则谋臣策士首尾为用，齐、楚、赵、魏、中山之君莫能相尚也，故自古英略智谋策于斯志焉。《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言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言恃险之由人也。孙卿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国之兴也。”参而由焉，卿所谓合其参是也；恃险而已，卿所谓舍其参是也。

夫雍州之地，宜其崇也。崤函战斗之士，宜其俊也。山川之险不易也，劲利之器不销也，先政之策可循而守也。然则，云物草木禽鱼诸属，一迹而至耳，披图览镜可不亟亟哉！是故君子观于志都会，知守国矣；志弓矢、车马器械，知修备矣；志谋臣策士，知所得者在此，所失者在彼，与至贤之学远矣。然则秦之有志，自胡可泉先辈载笔以后，百有余年阙焉未备，岂非邦大夫之过欤？三韩姜君，以丰沛之彦来刺西州，实藉将予。会当甲午崩骞之变，余偕郡守竭音羽之瘁者终年，民有宁宇。余顾姜君曰：是非秦州之一大兴革乎？惜哉！旧史之芜也。姜郡乃毅然裒辑。适当亭王令心古新去其国，憩南湖度夏，余遂以其事属之，严殿撮搜，铁微稽裁，住复三阅月而书成。州所有人物之大，封疆之重，山川云物、草木禽鱼之微，亦庶于是乎备矣。胡先生其许我哉！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省志9部志稿通过复审

2017年11月6日至11月30日，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通过《甘肃省志·金融志》《甘肃省志·政协志》《甘肃省志·供销合作志》《甘肃省志·报业志》《甘肃省志·地理志》《甘肃省志·文物志》《甘肃省志·生物志》《甘肃省志·信息产业志》《甘肃省志·人民防空志》9部志书的复审。复审通过的9部志书，在编纂中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志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篇目设计合理，体例完备，突出了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规定。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王华供稿）

地方志书篇目分类述论

——兼论志书分类标准制定的需要与原则

梅 森

内容摘要：本文从传统地方志分类的做法、首轮新方志篇目分类的历程与基本特征入手，对第二轮地方志书篇目的分类标准进行研究。地方志分类标准是地方志独有的，它不能从某个单一角度出发，而应从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角度拟定。

关 键 词：地方志书 篇目 分类标准

结构设计、篇目拟订是地方志书编纂中尤为重要的工作，历来受到编纂者的重视，也是编纂方法研究中较多的一项研究。故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说：“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有无鉴裁之力。大抵工于鉴裁者，合则极包罗之象，分则尽剖析之能。非然，则如市中之杂货肆，欲取何物，先自茫然。故欲精志例，先求分目以允。但各地方情状万殊，极不能强为齐一。”[①]经过近1/4个世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实践，在志书篇目拟订、分类设计方面，应该说有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方式方法，但近观一些方志编纂研究，发现并非完全如此，过去在第一轮修志中逐渐被舍弃的一些做法现今又被重提出来。想也难怪，猜度原因有三：一是参加首轮修志的同志今已在岗无几，现在岗者对以前的研究做法了解不多；二是首轮修志的研究是自发的并未经方志管理部门形成稳定的编纂原则；三是第二轮志书记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内容较首轮丰富复杂得多。故出现以上的情况也就很自然了。所以，本文想就传统地方志书、社会主义首轮志书篇目分类的实践和论争；我们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参考哪些因素来拟订篇目；在篇目拟定中又如何对待他学科的分类；地方志是否应该有个自己的“分类标准”等几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地方志书篇目分类的做法

我国传统地方志书的篇目大体可以分为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诸种。纪传体模仿正史，把门目归属于图、表、纪、志、传、录等类，类以下分细目。目以类归，层次相对清晰，传统志书大都采用此体。门目体是有目无纲，平列门目，无所统辖，清中期以后渐被淘汰。“三宝体”根据《孟子》“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而来，分志书为土地、人民、政事三类，有的加文献共四类。过于简概，统摄复杂的事物困难，嘉庆后不多见。编年体无篇目，事物按年代编入，类地方史，乾隆后不多见。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篇，详叙其始终，只有康海《武功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少数志书属此结构。类书体主要是按类辑录资料，并注明资料出处，附书目，在保存地方文献方面较有价值。[②]

传统志书结构还有“平列分目体”与“两级分目体”的称法。“平列分目体”实际上就是门目体，将全书分为若干门目平行排列，典型的是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全书50卷，39门。《吴郡志》被后代方志家认为是名志。“两级分目体”是先分大类，下分细目。如明代的《鄢陵志》分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官师志、人物志、人品志、杂志、文章志等8卷。志下分目，认为便于反映事物的统辖关系。[③]清代方志学家李兆洛嘉庆十九年纂修的《凤台县志》是典型的“两级分目体”，被誉为体例完善的佳志。全书分为：舆地、食货、营

建、沟洫、官师、选举、艺文、人物、列女、古迹、图说、附录等12大门类。大类下辖小门类，如舆地下辖沿革、疆域、坊保、山川、形胜、分野6小类。④

民国年间，虽逢战乱，由于西方科学自近代开始传入，到民国已成气候，志书的编纂研究有许多新成果，民国方志学家黎锦熙主持编纂《城固县志》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方志今议·十总结全文》中说："时贤方志拟目，酌古准今，实多凭臆悬拟，闭户造车；今则图实践于一邑，征众证而引端，所拟篇目，似可权作定论矣。然而不能也！……今者全国一千九百余县，……各有特征，正宜量体裁衣，岂容削足适履？故预拟篇目，皆属假定，纂著之际，删并增析，一随当地材料多寡轻重之宜。"可见，当时就认为篇目拟订是有阶段性的，同时也同样强调篇目要体现地方特点。⑤黎锦熙在"先明三术"中所列"创"的门类，均是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学科："事类新增者，例如地质、气候、公路、卫生等。"⑥黎锦熙总体上如何拟目的呢？从他的《方志今议·七县志拟目》可见："凡五部门、共三十篇，附两种，篇分子目，标以甲乙；目复分项，标以子丑。……然此间之自然、经济、政治、文化，重要现况，略举例中。"以上黎锦熙70多年前的文字，证明民国年间的志书分类已考虑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大体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部分来对篇目门类系统化了。其30篇分别是"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以上3篇黎锦熙称之为"全志总纲"）、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交通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司法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附本县丛录。（本文作者注：1938年黎锦熙为组织编纂陕西《城固县志》拟）一专志为1篇，篇以下为"子目"，子目下是"项"，可见比前边介绍的清代《凤台县志》一类的两级分目体增加了一层，是社会事物复杂了的原因。如"吏治志"辖"县政府组织沿革考"、"职官表"、"行政纪略"3个子目。"财政志"辖"省税"、"地方税"、"金融货币"、"度量衡（附）"3个子目，"省税"下列"田赋"、"契税"、"牙税"、"畜屠斗税捐"、"烟酒牌照税"、"其他"6项。当时把金融、度量衡放在财政志中，证明当时的社会分工比今天要粗，是所处生产力水平的原因。⑦

二、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书篇目分类的历程特征与他学科分类的影响

（一）第一轮地方志书篇目分类的历程与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者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志书篇目的确定和取舍，应从科学性和现代分工的实际出发，对旧志的优良传统形式予以继承，但同时又有创新。也就是保留社会发展稳定的类目，删去社会发展中消亡的门类，合并社会发展中弱化的门类，增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门类。可见，篇目的增删并留，主要体现的是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篇目的结构，力避重叠或繁简失当。

为了容纳大量资料，志书选择了与史书相反的横分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事物的联系。故为了解决志书记述的相关客体间联系的问题，提倡在志书的篇目上要体现事物内在结构的逻辑性，加强志书门类篇目的整体性（包括"概与专"、"源与流"、"近与邻"、"统与分"、"点与片"的"五交叉"处理）。社会主义新方志为了资料的全面性，由各相关部门参与编写，志书出现了志书分类专门性与部门分工的矛盾，认为在分设专志时，不能机械地按部门、按行业设志，而是应考虑到分类的科学和适中。省级以下志书往往采取"两步走"的方法，先由各承编部门编写部门志或带部门志痕迹的专志，再由地方志办公室根据门类的科学性重新编排加工，编纂出科学性、整体性较强的志书。而省级志书由于内容宏富，采取"一步成志"分卷出版的方法，在整体结构上尽量体现科学性，但专卷之间交叉处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志书是资料性文献，省志强调资料性文献的同时，兼顾最大可能的科学性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遵循了"从科学性和现代分工的实际出发"。可见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志种不同，篇目结构包括操作方法也是不同的。

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首轮大规模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也是这样。初期对志书篇目结构的思考：一是参考传统志书尤其是时代较近的民国时期志书的分类；二是参考工具书，包括《辞海》关于专业名词的解释，以及相关专业书籍中的专业分类；三是接受史学专家的指导。首轮志书的编纂发动是“自下而上”的，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成立，胡乔木同志在会上发表“大声疾呼，予以提倡”（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重要讲话。次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主要成员是史学界的领导和专家（新方志此时实为初创），在成立大会上讨论了《关于新省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新市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省志建议篇目结构为：总述（或概述，为省志之纲）、大事记（为省志之经）、若干专志（按事类分类，类为一志，为省志之纬）。县志列10大篇（见以下刘纬毅文），后来被称为“大编体”，从中看到当时的史学界设计者已经考虑到志种的不同志书的体式也应不同——县志为大篇体而省志为“若干专志”体。当时深入基层参与修志实践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光禄、胡惠秋先生在《方志学讲座》中给方志定义。他们认为，方志是“以地区（或叫行政单位）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史书”，（方志的性质是）“志书可以说是属于史书的范畴，方志是地方史书中的一种”，“志为史之积，史为志之成”。[8]所以，初期志书不少受国家、省市高校、社会科学院的史学专家指导，县志多设大篇统辖，历史体裁的特征较为明显。如1980年出版的《呼玛县志》设7编41章，除首编是“全县概貌”、尾编是“杂记”外，其余5编是按年代（清末、民国、伪满、“九三”、“建国后”）分编记述，为典型的编年体。1981年修成的《台安县志》采用的是概况、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杂记6大篇。

1982年开始，各省市区陆续成立省地县三级修志机构。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地方志从组织上与历史学科分离，地方志形成自身系统并独立实践地方志编纂研究的时期开始。1984年6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和《中国地方志通讯》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新编呼玛、台安、万年、如东、本溪5县县志学术研讨会，评论了5志关于“以类系事”与“以时系事”的问题，认为《呼玛县志》用5个分期分五大编之弊是：专志不专，门类不清，割裂了各项专志发展变化的体系；一事多见，各处均不完整；分时期断开，冲淡了本地特有事物。说它是地方志也可，地方史也可，有些不伦不类。并非志书完全不可分期，但不是历史的、政治的分期，而是具体情况的分期。[9]这次会议是地方志系统欲分清志书门类结构与史书分期结构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中国地方志通讯》（今《中国地方志》杂志前身）1984年第4、5期合刊刊登了会上几篇文章。刘纬毅《志书、断限、纪年及篇目顺序》认为：《新编县志基本篇目》安排的顺序——历史大事记述、概述、自然志、经济志、政治志、军事志、文化志、社会志、人物志、附录（即“十大篇”），体现了先综合、后局部，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原则，反映了客观规律。该文谈的是结构顺序，而并非要求设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大篇进行统辖。随着编纂实践，人们越来越发现，由于事物的关联性，以及部门的现代分工的原因，统辖的层次过高过粗，会导致多重性事物归类的困难：如先总后分，人口应置前，但人口控制内容（计划生育）与医疗卫生相关；民族、宗教有社会的内容，也有政府工作内容，如何处理？民政的社会福利、优抚、救济属政治部类还是社会部类？造成归属的困难。所以，初期只有部分志书采用“五大篇”、“十大篇”统辖外，后来绝大多数改为了平列式。县志一般在30个专志（或称卷，或称章，或称篇，或称编，或称志）左右，中等城市志大体与县志情况相同，市志内容侧重工贸、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科技，蔬菜副食品等，农业内容较县志弱，设40个专志左右。可见，从表面形式的科学性出发，用“大篇”统辖似乎很科学，但在覆盖一地各业的地方志面前，解决不了全志各主要内容的全面归属，才是被迫改为平列式的根本原因。但在操作中，编纂者尽可能地讲究平列式门类间的内在逻辑的科学性，只是去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篇名的虚设层次。例如，1982年开编的《全椒县志》（黄山

书社，1988年版）在安徽首创“平行章节体”，即全志平列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渔业、多种经营、工业、交通、邮电、电业、城乡建设、商业、对外贸易、粮油、工商管理、税收、财政、金融、党政社团、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医药卫生、体育、宗教、风俗、方言、人物等34章（章节为编次，各章之间按先全局，后局部，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部门次第排列），建置区划入地理，人口、民政、宗教单立，民族人口归人口章，解决了以上讲的归属问题。此后安徽绝大多数地市县志书均采用这种体式。1988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实用方志编纂学》，其“志书内容提要”就是按这种体式编排的，发行后得到全国方志界的肯定，与其他同类书籍一起，对推行“小篇平列”体起到一定作用。据调查，全国第一轮修志的地市县志书篇目绝大多数采用平列式。这里体现的是形式的科学性要服务于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1984年欧阳发先生在武汉市修志人员会议上的发言对初期市县志篇目分类的看法是历史的一个记录。他说：“许多同志认为，经过四年多的修志实践，县志基本篇目应该大体确定下来……现在流行的县志篇目，大体有两种：一种叫二级设志，即篇下设志；一种叫一级设志，即平头设志。篇下设志，一般设：概述、大事记、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附录等十篇。平头设志，少者二十多卷，多者已达三十，有人赞成前者，有人赞成后者……采用什么样形式……不作硬性规定。”[9]但随着修志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市县志还是采用了灵活机动便于归属的“平头设志”。

在市县志编纂的同时，省志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其篇目结构的做法几乎也走过市县志的运行之路，形成相似的轨迹。

1984年1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委托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筹办的全国省志稿评议会，对省志篇目：“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志，即按事业分类设志，不宜机械地按组织机构设志；还应注意类次相当，篇幅相宜，不宜分解过细，设志过多。[10]此次会议尤其强调不宜分解过细，设志过多。省志分类设志一时间引起热烈争论。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全国省（区）志体例篇目座谈会上，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省志采用“大志多篇体”还是“多志平列体”。[11]会上有人认为：目前省志都是一级平列结构，建议改为统率型的“大志多编结构”。这样，“整体性较强”，“系统性较强”。1987年5月18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提出大篇体的《<湖南省志>编纂方案》，设28卷（近似市县志篇目）。诸葛计先生在《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一书相关的按语中说：（《湖南省志》）“后来在实践中变为91个分志，没有采取这种大篇体式，而是采用了小篇体式。坚持大篇体式做法的全国只有《湖北省志》一家，该志设32卷41分册。”[12]同年1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南京召开全国省志篇目讨论会，选择湖北、贵州、陕西等大、中、小篇各一种体式的篇目下发，并明确“既不是树典型，也不是立靶子”，[13]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安徽省志》也曾经历过与《湖南省志》同样的经历，80年代初拟订的篇目是47卷，80年代中期改为57卷，1991年改为后来定型的67卷（属省志的中篇设志，加目录、卷尾共69卷）。有人当时写文章说：“张书记来挖沟，李书记来填塘”（前后三任省志处处长）。其实并非如此，例如57卷中有1卷“经济综合管理志”，包括计划、统计、物资、物价、标准计量等多个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内容，造成1卷本文字量（最多150万字）难以承担，加上分交多个部门承编，谁都没有积极性，所以才把该卷拆为多卷。1991年，刘柏修先生对所见的21个省志篇目进行分析：“在大、中、小、细的四种体式中，按大篇体式（10篇左右）设篇的一个省也没有；中篇体式（30篇左右）的有3部，即湖北、湖南、吉林；小篇体式（60篇左右）的14部，就是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云南、贵州、青海、甘肃、安徽、广西、广东、新疆、浙江、黑龙江；细篇体式（90部左右）有4部，即陕西、河南、福建、江苏，其中篇目最少的是湖北，只有27目，最多的是福建，约100卷，82志。”[14]（本文作者按：此为当时的统计，四分法是刘氏的分法，实

际上省志一般被分为大、中、小三体式，小篇100多卷、中篇50～70卷左右、大篇40卷以下）。可见，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实践，省志还是以平列的小篇体居多。1992年，王复兴主编的《省志编纂学》认为：分志是省志篇目的第一层次，由于认识不同分志设置多少不等。实践证明，单纯以部门立志、以学科立志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从现行体制出发，单纯强调综合，以学科“一刀切”，从篇目形式看比较完美，但落实编写困难。所以既要考虑科学分类也要考虑现行管理体制。初期有几个省志篇目的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大编，第二层次才是分志。后来考虑省志是分卷出版，大编这个层次是虚设，便删去了，但省志在编排上还是遵循逻辑顺序的。[18]同年，本文作者也在《史志文萃》上撰文，就“省志与市县志等志总目之区别”、“当今省志总目三种类型分析”，对省志篇目结构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省志大篇结构与县志大体相似，30多个专志，是按照事物属性分类。但市县志可以“两步走”（先编部门志，再由志办分总纂成书），而省志内容宏富，从时间、人力上难以实践，此外，分30卷印刷也是不可能担负省志的所有文字量的（按：如《安徽省志》成书5500万字，如果用30卷平分，卷均达183万字，如何装订）。其次，中小篇结合结构，一般50～60个专志，以小篇为主，同时列有政务、经济综合管理等中篇专志。政务（当时）包括人大、政府、政协、外事、侨务、档案、人事等内容，经济综合管理包括计划、劳动、工商管理、物价、外资、统计、标准计量等内容，此外还有财政税务、民俗方言、政党群团等大篇幅复合型专志。缺点是中篇复合内容的专志，用一卷难以承担须反映的事物，被迫限制各方面的内容，就会使志书资料性特点失去。如《安徽省志》设57卷时，“经济综合管理”分志就只给物价部分9万字，只能抄物价政策，而具体的物价指数、主要商品的物价就无法反映，这样的物价志有什么价值？改为67卷后，物价分志写了100多万字。文章认为，小篇设目70～100个专志左右，便于操作，独立修志调动了部门的积极性，是既可行又较为科学的做法。平列门类多，便于容纳资料，符合志书资料性著述的基本特征。但省志设卷越多，独立栏界也就越多，所以编写组织中要在总述、概述、小序中解决志书宏观、综合性的问题，解决跨部门、跨行业内容容易缺漏或重复记述的问题，解决交叉内容各专志史料统一问题，解决分志“子系统独立”全国共性内容易在相关分志重复的问题。[19]此期，肖先治、张桂江先生也发出相似的声音，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论新方志编修》一书的“省志篇目的科学性与整体性”中，主张：“以专志为省志之基本构成单元，采用暗分大类的平头列志体例……一部专志反映的对象，可能是一种事业，也可能是一种行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省级志书的篇目结构基本上是小篇平列体了，理论上也得到相对的共识。

志书篇目分类，除时代不同、志种不同有显著不同之外，地域、地方不同，志书的篇目分类也有所不同，这是地方志书地方性特点所决定的。

地方特色内容，首轮志书除正常在相关门类类目中加重记述外，重要的、有份量够篇幅的，往往采取特点拔类的“升格方法”。“升与不升”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论争，如1987年王小宏先生的文章《县志篇目“升格”“降格”之我见》，他认为“升（降）格”的做法，破坏了篇目的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导致科学体系上的混乱。[20]紧接着王先生就接到了商榷，邓撰相和杨晓容先生分别在1987年《中国地方志》第6期撰文，均主张可以“升格”，理由是传统方志早有先例（本文作者按：宋范成大《吴郡志》将“虎丘”与“园亭”、“古迹”并列，历史上被人指摘为“类目统属失序”，实际上“虎丘”单立正是该志被后人称为“名志”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一种大胆创新的举措），理论上认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的变化、取舍取决于内容的变化，如果形式不能反映特点，就不是好的形式。[21]虽然这种争论在新方志发展史上不断，但很多的志书都采用了“升格”的做法：如《马鞍山市志》的马钢公司与钢铁业并列；《萧山县志》围垦与农业平行；《户县志》、《萧县志》、《金山县志》农民画与文化艺

术平列;《广东省志》单设《孙中山志》与《人物志》并列;《山东省志》的《诸子百家志》与《人物志》并列;《厦门市志》单设“厦台关系”、“厦港关系”等专篇等等。“特点事物升格”在首轮修志中已成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应该是志书突出地方特点实践的具体体现。

从上可见,在首轮修志的篇目分类过程中,形式为内容服务,篇目分类既要具有科学性同时要考虑到现行社会分工的思路逐渐占居上风。在具体的篇目分类中,实际上讲究逻辑编排、内在科学、易于分工的小篇平列体战胜了表面形式科学的大篇统辖体。此外,在篇目分类设计中大多数志书均考虑了时代特点事物、地方特点事物的突出。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在首轮修志中的具体体现。

(二)第一轮地方志书篇目分类受他学科影响的评析

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书在1/4个世纪大规模编纂中,曾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大量营养,主要是哲学、经济学、史学、地学、社会学以及各相关专业的营养,使志书的内容更加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在编纂中也受益于他学科专家的指导,尤其在社会主义大规模修志的草创阶段,许多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档案学家、社会学家付出了许多心血,起到了积极影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功不可没。此外,许多方志工作者也主动掌握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对志书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但事物是两方面的,在编纂实践中,也有机械地运用他学科分类,从单一学科角度考虑志书的篇目,或在方志篇目分类上有贴其他学科标签之嫌,导致在志书编纂中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有些专家从本学科的单一角度出发,说志书的篇目分类缺乏科学性,其言也有失偏颇。较大几次的影响分述于下:

1.史学理论的影响

社会主义大规模修志之初,对当时修志影响最大的史学界认为“方志应当是史料汇集,是史学的一个分支”。[9]大篇统属体与少数志书分期编年记述是受史学的影响。

2.行政管理学理论的影响

1985年,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在刊物上撰文,认为地方志是“辅治之书”,是“为行政管理服务”的,是“行政管理科学的书”。地方志要引用政区有关的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来为行政管理服务。[10]这是后来被称之为方志“行政管理科学”派的最早主张。这一主张对志书的篇目分类起到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普遍。

3.地学理论的影响

同一时期,一些地学专家认为地方志书设的地理志,内容不全,应该按地理学的分类写,即志书需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门类。但1985年8月,黑龙江省志办举办地方志地理志研讨会,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北京大学地理系专家与会。会议客观地认为志书地理志必须吸收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用地理学科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指导地理志的编写。须注意地理志与地理学、区域地理是有区别的,拟订志书篇目应从当地地理环境出发,绝不能按照地理学系统去生搬硬套。两种观点,地方志的地理志能不能按照历史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或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来设篇目?一时争论不下。修志之初,主要讨论史与志的关系,“而今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各学科领域,如地理学与地理志,人口学与人口志,社会学与社会志,经济学与经济志等。”[11]

关于地理志与地理学分类的关系,此后仍有争论。198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有多学科专家参加的《玉山县志》、《渭南县志》、《萧山县志》研讨会。会上,有专家认为,地学与地质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科,志书统称地理志,把地质当成地理志的一章不妥。而且,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人文地理有广泛的内涵。建议将“地理志”改“自然环境志”。次年,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撰文,指出:新志书以“地理”作为篇、卷的标题,但内容仅涉及自然地理学的若干方面,置人文地理于不顾;有的又加入地质的章节。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组成物质的科学,它与地理学是研究对象不同的两门学科,置于自然地理之下是不适当的。[12]据此,本文作者撰文商榷,观点:一是专家强调

地学的专业分支，脱离方志的编纂实际。将志书硬套地学分类，“贴地学标签”，写地理志就要写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实际上是将中国地方志协会初期提出的篇目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五大篇改贴地学的标签，也就是把地方志纳入地学的范畴。试想，如果人类学、环境学、城市学、经济学、人文学等等学科都来强调按他们的学科、专业分类，方志很难成为独立学科，甚至无可适从。二是地学与地质学过去统为地理，地方志只是沿用早期的粗分类，将建置沿革和地质地貌等合为地理志，是地方志分类的传统。三是如改“自然环境志”，建置沿革内容如何归属，省级志书篇幅大，可以两者均独立成卷（分志，另外还有地质矿产志），而中等城市以下志书“建置沿革”独立成志（篇章）份量就显不足。（后来省志不少改设自然环境志，地市县志维持地理志的较多）[29]

以上地理志的讨论，表明他学科的专家大多数是从自身单一学科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整部志书谋篇布局出发，一段时间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志书的整体把握。

4.“新三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方志工作者把从国外新进的科学知识和普查分类引入方志编纂中，开阔了思路，用现代科学方法分析资料系统、把握专业行业要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引入”往往有些勉强和牵强，对志书的篇目分类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1985年，“一些方志工作者开始将‘新三论’引入方志研究中。仅年内就有刘伯伦先生在《方志与信息》一文中提出：地方志是地方的‘信息全书’，方志学‘应理直气壮地从历史学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方信息学’。（《山西地方志》1985年第4期）。李汝舟先生在《方志学与信息学》一文中提出，志书是信息储存的一种形式，方志学的中心课题是研究信息的运动规律，即信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储存、信息反馈。（《湖北方志》1985年第3期）傅能华先生在《方志信息与四化建设》一文中认为，‘地方志是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的信息储存总库。一部好的地方志就是一个地区系统的、全面的长期的信息载体’。（《史志文萃》1986年第1期）于是又在方志界引发了一场讨论。”[30]除论争外，也有具体在篇目设计中运用的，如肖先治、张桂江先生在谈“方志的篇目设计”中认为：应“注意不同篇目级别所反映事物的完整性。从‘系统论’的观点解释，完整的事物下属各种因子本身也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因此，设计篇目时，力求不割裂这些相对独立的因子。”[31]再如齐红深先生就根据系统论方法提出教育志的篇目应分“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师”、“学生”、“教育经费”、“教育设施”等等。[32]

5.工业普查代码的影响

1985年，国家开展第二次工业普查，并下发了行业代码。有些方志工作者提出用代码法分类标准对志书进行篇目分类。表面上看，工业代码很现代、很科学，但与历史上工业的分类差别太大，与统计部门的历史上统计分类差别也大。如果志书工业部类按代码法划分，必然与编纂实际脱离，会造成历史上的工业数据无法对应“代码门类”。安徽省蚌埠市市志工业部分一度想用代码法分类，一时间争论不休，延误了很长时间，最后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分类，并较好地利用了此次普查的资料，提高了志书质量。此例说明，对他学科的东西应该如何借鉴，不应该照搬照套，而是要吸纳真正对己有用的东西。

6.“新三宝体”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有人用现代科学，如环境学、人口学、民族学等知识对方志传统的“三宝体”进行改造，提出“新三宝体”：席星加先生1985年在《中国地方志》当年第2期提出“世界以自然、人、社会三大要素组成，三者相互作用，人是主体”，志书各专志应“分为自然、人、社会三大类”。1987年，梁滨久先生在当年《广东方志》第2期、魏钢强先生在《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5期提出类似看法。梁滨久认为：“地方上的客观事物，可以归纳为自然、社会和人三大要素”。魏钢强主张对专志内容的物（环境）、事、人三

类，从状物、叙事、记人出发，专志的写法有状、叙、记三种。1989年刘柏修先生在《江西方志》当年第2期提出设“居民部类”，把地情概括为自然、人类、社会，把单个的人扩大为群体的“人类(居民)”。罗来兴先生在《内蒙古地方志》1990年第2、3期合刊提出：省志主要内容应放在自然环境、居住人群、人群的活动三者的关系上。认为此前的志书只记人的个体(人物志)，不记群体。平江县志办提出志书设“人生篇”的设想。而正式提出“新三宝体”概念的是韩章训先生。他发表在《方志研究》1989年第5期的文章标题就是《新“三宝体”方志的构想》，认为该体具体为环境、居民、经济、政治、文化五大篇。他提出居民篇包括：人口、民族姓氏、婚姻家庭、组织管理、人物传、人物表、人名录、劳动、生活、宗教、习俗、语言等12章。在编纂实践中设居民篇的有《开化县志》、《青州县志》、《武清县志》、《泰和县志》、《来宾县志》、《峡县志》、《冀县志》、《东阳县志》、《农七师志》、《文成县志》、《黑河地区志》、《白沙志》、《大足县志》。其中《东阳县志》分“环境”、“居民”、“基础设施”、“社会”四大部类，“基础设施”包括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9]可见“新三宝体”强调的是加强社会内容的记述，而在形式结构上只是第一轮大规模修志之初“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人物”五大篇的重新组合。实写的行业、事业无大变化，好像一种七巧板搭配的翻新。但“新三宝体”对方志记述对象新角度的分析研究，对要重视“国计民生”、重视人群等社会内容的记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志书篇目结构设计本身似乎变化不大，因之也只是一时间部分地方采纳，不失为一种尝试。

(三)第二轮地方志书篇目分类研究及评析

据研究，首轮修志关于篇目结构的研讨到了9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多数方志工作者认为首轮志书篇目结构设计的形式特点当时已基本稳定。由于多数市县首轮修志完成，1996年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下发，提出“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之后，方志界转而进行第二轮志书编纂的研究，俗称“续修”的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续志名称、指导思想、续志断限、续志体裁、续志记述地域、续志内容门类、续志体例、续志文体、续志资料征集、续志编纂组织、续志经费等等，续志篇目分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

近年，对第二轮志书篇目分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增、减、并、留”四个字上，即首轮修志中哪些门类应保留不动，哪些应减去，哪些因续修断限时间短内容份量不足可归并为复合门类，哪些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需增设新门类。[10]另外，还有两个新的研究：一是采用“志鉴结合体”创志书新的篇目体式结构；二是主张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即“三次产业”的分类形式来对第二轮新方志进行分类。“志鉴结合体”即采用地方志书的综合性叙事，加上年鉴的条目，每门类先是概括性综述，其下灵活运用条目记特色性、有影响的事物。这种篇目体式有创新，但缺点是条目设置易产生随意，如果综述反映事物的兴衰起伏不够，会导致志书“资料性文献”的基本特征丢失，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实践，我认为此体式关键在于千万不要违背志书资料性文献的基本特征。

根据首轮修志的成功经验，参考现代科学的专业分类和综合分类，并将其类目要素吸收并有机地融入志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任何学科分类都只是从单一角度出发，而区域志书是覆盖自然、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地方志书的篇目分类是融合各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分类，故对他学科分类不可“生搬硬套”。近年有人提出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即按照“三次产业”进行分类，理由是，这是当今最为科学的、最与国际接轨的分类标准，另外不按这一分类，就难以收集统计资料。能否照搬到志书篇目的设计中？也有分析的必要：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国家标准，1984年首次发布，1994年第一次修订，2002年第二次修订。1984年，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联合颁发的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并参照国外做法，国家统计局对第一、二、三次产业作

划分：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含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煤气。第三产业分流通、服务两大部分，具体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共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8]

2002年为适应我国加入WTO需要，参照联合国统计署制定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按市场化国家制定的产业分类，打破我国的部门管理界线，根据经济活动的性质，将相同的分为同一行业，但又考虑我国国情，修订后的标准实际是与国际标准兼容性的“国标”。明确适用范围为统计、计划、财务、工商、税务管理等领域。国家统计局修订，同年10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S/T4754－2002)实施。该“分类”共设20个门类、95个大类、396个中类、913个小类，具体为：A农林牧渔业(含农林牧渔服务业)；B采掘业(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其他采矿业)；C制造业(含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含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其他建筑业)；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含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仓储业、邮政业)；G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含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H批发和零售业(含批发业、零售业)；I住宿和餐饮业(含住宿业、餐饮业)；J金融业(含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K房地产业；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M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记述交流和推广服务业、地质勘探业)；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水利管理业、环境管理、公共设施服务业)；O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其他服务业)；P教育；Q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卫生、社会保障业、社会福利业)；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S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T国际组织。[9]

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不再明分第一、第二、第三三次产业，而是按照三次产业的逻辑排列，即A门类为第一产业，B－E4个门类为第二产业，F－T15个门类为第三产业。从中可见，这一划分完全是从统计角度出发，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产业、事业、专业、政治组织公共管理均划入三次产业中(从志书角度看就是覆盖全书内容的各方面，除自然环境、建置沿革)。这一划分，我认为可以为我们修志研究记述对象，检查实写的类目是否完整全面(当然还得看当地是有还是无，比如畜牧业在内蒙是重要的分志，在沿海城市却无法单独设志)提供一个角度的参照，但无法在志书中照搬照套此分类。因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是从经济从统计报表的角度，所以经济部类分得比较细。而地方志书，尤其

是中等城市志和县志，主要采用粗线条分类。如“机械设备制造业”在省级志书中也只是一个分志（更不要说中等城市、区县级志书了），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却细分为“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类。此外，该分类与代码是从经济统计单一角度，故把政治、文化、社会部类的内容也从经济角度放在第三产业中，并且分得较粗，难道我们可以在志书中取消政治部类、文化部类、社会部类（暗排也是有逻辑部类的），把党、政府、政协、人大、群团、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用第三产业表示吗？今天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固然有市场经济的成份，但仍与西方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成分仍是社会公益性质。以上可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是为了“入世”的需要，也明确了它的运用范围，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地方志书也需要超前地与世界经济接轨吗？所以，第二轮志书全书以三次产业的性质归类，还是仍设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专志（篇章）更合适？只要分析思考一下是非常清楚的。此外，大型城市第一产业，甚至第二产业都在向第三产业大量转移，如果按三次产业分类，志书门类内容必然畸轻畸重。再如商贸，主要是写各商贸行业，而该分类与代码只有“批发业和零售业”，既无生活资料（百货业等）销售，又无生产资料销售，外贸在“分类代码”中是分散各小类中的，根据该分类也难以集中反映外贸内容。所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如同首轮修志的各类普查统计，其分类都是从单一角度，纯经济统计角度，而不是综合地从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各方面出发，故在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中，也只能给我们提供参考或参照，而不是照搬。可见，“三次产业”一类篇目分类问题早在首轮修志中就有前车之鉴了，我们用不着“重蹈覆辙”。此外，统计部门的资料历来只是地方志资料的一个渠道，而不是全部。

除以上两点外，近年由于第二轮志书断限时间短，具体的单独门类与贯通古今的首轮志书同门类比较，文字量相对较小，故在志书篇目分类上有些地方再提大篇统辖体，如一部省级志书或市县志书设自然环境（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篇或几大篇。本文作者认为，大篇体放在今天，依然不利于志书资料性的体现和门类合理布局。好的办法，如果单一门类文字量不足，可以采用复合门类设立分志（或篇章），如设《XXX志·公安司法志》，把公安、审判、检察、司法行政并为1个分志或篇章处理（省级志书为1卷，省级以下志书为1个篇章），较为妥当。第二轮志书断限时间固然短，但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和社会内容复杂，这方面的文字量也是需要在谋篇布局中考虑的。

三、地方志书篇目分类实践与研究的结论及分类标准的制定

地方志书记载的对象是自然和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内容的不断增加，志书的内容和结构也由简单到复杂。志书是资料性文献，为此，志书的篇目分类的目的是为资料的容纳提供“合身”的框架，即书版资料库。

从以上传统地方志书、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篇目分类的实践和研究看，志书的资料性文献属性决定了志书的篇目分类，由于首轮修志曾出现过加强志书著述性的观点，因此一度出现过“统辖型的大篇体”结构的志书，但大篇往往是虚设，影响志书资料的有机分布，因此这种志书体式始终未成为方志编纂的主流。不论是封建社会的志书、民国年间的志书，还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志书的篇目体式基本是平列式小篇设志居多，原因是便于容纳资料，这是志书资料性特征所决定的；此外，社会分工与志书编纂分工能够较好地结合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本文作者认为，志书表面的形式科学，应该让位于内容资料有机编排的本质科学。志书篇目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就是——满足“资料性文献”的原则，有利于这一原则的体现就是好的篇目分类，反之就是差的篇目分类。所以说“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篇目分类设计的“一大原则”。

从以上新旧两个时代，尤其是大规模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的实践，根据以上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本文作者认为，志书篇目结构的设计除坚持以上的“一大原则”外，还应考虑“五个因素”：(1)稳定的基本类目因素，也就是参考前志，选择稳定的自然、社会的类目，如水利、农业、商贸、交通、文化、教育等等数代不变的类目；(2)时代类目因素，即根据志书断限时间内时代内容与前志比较，对前志篇目进行“增减并留”，增加时代性的门类，如第二轮修志，各地增加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开发区”、“文化娱乐业”等等类目；(3)地方特点类目因素，为反映地方特色事物，违反一般分类逻辑，“特点拔类”，如“围垦”与“农业”并列；(4)行业、专业类目因素，根据本地的行业、专业，以及行业、专业下一层次的内容设置篇目，如工业包括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等工业部门门类，诸工业部门门类下辖行业沿革、设备、员工、生产、产品、经营、企业、经济成分等分目；(5)志种类目因素，省级志书与中等城市、区县级志书，省志与直辖市志，由于层次不同，地域特点不同，志书的篇目分类不同，层次越高分类越细，层次越低分类越粗，这是由内容多寡决定的。城市志偏重第三产业，或二三产业并重，所以在城市志中二三产业的下一层次的具体部门往往与第一产业农业并列(俗称“老子与儿子”平列)。省志、县志分类较为平衡，但第二产业门类数相对较多。

地方志书内容事涉百科，因此在志书编纂、尤其是分类方面，必然要参考工具书和相关学科的分类标准，统计分类是参考最多的，统计数据也是采用较多的。根据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包括受到的历史学科、地学学科、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普查代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等的影响，对志书编纂质量的提高产生重要作用，但也出现过因“生搬硬套”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虽未成为主流，但在当今的编纂中仍然要引起重视。对于他学科的科学分类，方志编纂者正确的态度是参照其中的分类要素，看看我们志书门类及要素与之相比缺少什么，应该放在志书篇目的哪里。如前面例举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五业，可能我们志书只统设“机械设备制造业”一个门类，甚至还不到一个门类，但我们可以利用《分类与代码》，根据地方情况，看看细目上有无缺漏。

本文作者认为，地方志书就是地方志的分类而不是其他，它与他学科不同的是覆盖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各方面的综合性分类(而不是其他学科单一角度分类)。地方志书篇目分类的实质层次不是第一层次(统辖性虚设层次)，甚至不是第二层次，而是第三层次及以下的那些实写类目。因此“五大篇”、“十大篇”划分也好，“三次产业”划分也好，均是虚设层次，故不应作为篇目分类研究的重点。志书本质的内容是实写类目，因此我们研究的视觉应该在这里。此外，一地志书篇目的拟订与编方志编纂教材是不同的两回事，教材分类可以将志书内容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几大篇，或“三次产业”，每次产业或每一大篇为一讲，是为了便于教学分工。教材的目的是研讨和启发，而不是对各地拟订篇目的“越俎代庖”。也就是各地具体的志书篇目应该从以上讲的“五种因素”角度考虑，而不应该“人云亦云”，这样全国的志书才可以“百花齐放”而不是“千志一面”。地方志书篇目拟订需要把握和参考的，就是以上所归纳的：“一大原则”、“五个因素”。

长期以来，地方志书有着自己的分类方式，主流看，从未按某一单一学科的分类去分类，哪怕它是“国家标准”。正因为地方志书的篇目分类不符合任何一个学科的分类标准，故有人站在本学科的角度说地方志书分类不科学，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地方志书也的确是分解到相关单位部门(社会实体)，请其参与编写，但分类并不是按部门的管理范围，而是按行业、专业、事业、政治活动等“事以类从”的。有人认为地方志书既不是其他学科分类，是交部门编写，那么应该称为“部门分类”，这也是不妥的。还有人认为，志书

如果不按他学科的分类，写出来的就是“部门志”，更是不妥。但这些意见提醒了我们，他学科有自己的分类标准，其行为符合标准就被称为“科学”，地方志书没有自己的分类标准，难免被人诟病为“不科学”；所以，地方志到了该制定《地方志书分类标准》的时候了。每轮修志都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地方志成为一项事业、一门专业，当然更应该有符合自身特点的分类标准，甚至应该有国家标准部门同意实施的《地方志书分类标准》，像其他学科的国家标准一样，每轮修志对其进行一次修订，但制定分类标准的落脚点是在实写类目上，目的仍是为各地拟订篇目和审稿提供参照。

《地方志书分类标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地方志书分类标准》不是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它是地方志独有的，它的独特在于它不是从某单一角度出发，而是从自然和社会的综合角度拟定，全面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诸方面，这是地方志记述对象的全面性决定的，因此，这样的分类标准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分类标准一样，同样是科学的。

注释：

①瞿宣颖：《志例丛话·杂例》。

②③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问答》第13页、22页，陕新出批（1992年）字第340号。

④欧阳发：《方志研究》第97页，内部刊印。

⑤⑥⑦黎锦熙：《方志今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方志学两种》（黎锦熙《方志今议》、甘鹏云《方志商》）第131页、20页、28～128页。

⑧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第1、2讲，《中国地方史志通讯》第7、8期合刊。

⑨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128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⑩欧阳发：《方志研究》第120页，内部刊印。

⑪⑫⑬⑭⑮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140页、189页、214页、230页、375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⑯王复兴主编：《省志编纂学》第24～25页，齐鲁书社1992年版。

⑰梅森：《省志总目权衡谈》，《史志文萃》1992年第3期第3页。

⑱王小宏：《县志篇目“升格”“降格”之我见》，《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3期。

⑲⑳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236页、149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㉑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㉒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160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㉓陈桥驿：《地理学与地方志》，《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2期。

㉔梅森：《小议地理志改自然环境志》，《志苑》1988年第3期。

㉕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170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㉖肖先治、张桂江：《论新方志编修》第5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㉗齐红深：《运用系统论方法设计教育志篇目初探》，《四川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5期。

㉘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第485—488页，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

㉙梅森：《续志备考》第3～5页，黄山书社2000年版。

㉚《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1985年3月19日）。

㉛国家统计局修订，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年10月批准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略述地方综合年鉴条目编写的基本方法

王文生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论述年鉴条目选题的重点和难点，旨在地方综合年鉴条目编写中突出主体，找准和克服难点，把握和反映亮点；同时探讨解决如何平衡条目结构和数量，准确记述条目内容以及常见问题分析。

关 键 词：综合年鉴　条目结构　编写方法

条目是年鉴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表现形式。对于地方综合年鉴（以下可称年鉴）来说，因其记述内容的综合性、信息量的庞大性，条目的设置、定义和编写就更为重要。条目名称定义是否准确、编写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年鉴的质量。判定一部年鉴质量水平的高低，除看篇目大纲设计是否科学外，最重要的就是看条目选题方向是否准确、条目设置和数量是否合理、条目记述内容是否翔实新颖等方面。

一、把握条目选题的基本原则

编写年鉴条目的，离不开题材。选择题材必须突出其社会价值和资料价值。可从三个方面看：

1.从年鉴的定义和定位去看

从记述的内容和侧重点的不同上分，年鉴分为地方综合年鉴、行业年鉴、部门年鉴和专业年鉴等。年鉴的作用和属性是什么？年鉴作为一种舶来品，从英国传入中国后（现存最早的地方综合年鉴是1854年的《上海年鉴》，全英文版），经过160多年的逐渐演变，与他原来的生活百科全书的模式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但无论怎么变，年鉴作为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没变，甚至更加强大。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对年鉴的定义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是：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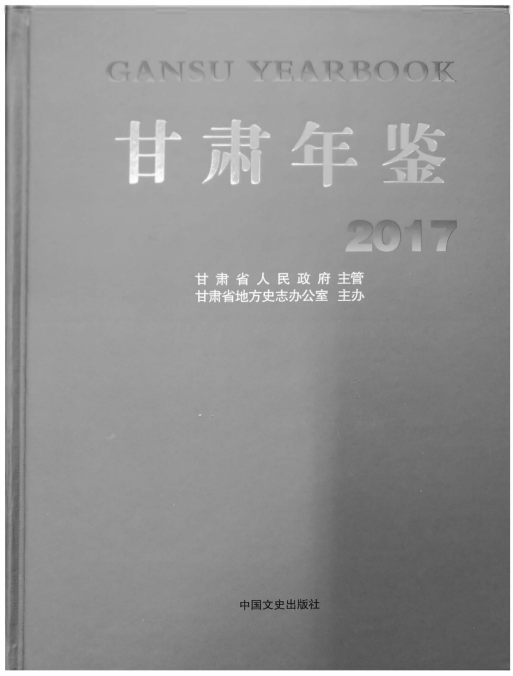
年鉴既然是工具书，他的条目选题就必须由反映对象的社会价值和资料价值去决定，就要按照读者的资料需求和查找、检索习惯去选题，尽量选择读者普遍关注和查检率相对较高的题材去设目。

全国编纂的各种地方综合年鉴，不论是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还是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都表明了年鉴是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活动为反映对象，因此，条目的选题就必须集中体现社会价值和资料价值，才能发挥应有服务功能。

2.从年鉴的编纂管理和组织方式去看

《地方志工作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

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并履行相关职责。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了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项法定任务。一部年鉴，无论从创意策划、框架设计，到约稿组稿、修改整合，还是审读审查、出版印刷，都是一项具体繁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用行政手段调集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众手成鉴，是中国年鉴编纂的特色之一。既然是通过社会协作实施的编纂活动，其成果就要有社会价值，作为内容主体的条目选题，就必须把突出社会价值作为重点。

3.从年鉴的服务功能和服务对象去看

年鉴年鉴，一年一鉴，且按年度连续、公开出版。从时间上说，具有强烈的年度限制性；从空间上说，具有特定的地域制约性；从内容上说，具有浓厚的官书性；从服务面上说，具有一定的社会广泛性。在这四者基础上，满足读者利用年鉴查找信息资料的需要。因此，年鉴条目选题应突破部门、单位的局限，选收读者感兴趣、有需要并具有社会意义和资料价值的题材，切实发挥年鉴社会价值的最大作用，不能追求面面俱到，更不能为了区搞平衡和照顾，把年鉴当成一个大杂烩式的平台，去刊载一些与年鉴根本搭不上边的风味小吃、姓氏考究、诗歌、散文、小说、摄影、书法、书画、研讨文章等等资料。

二、掌控条目选题的两个重点

做好年鉴条目的选题，一定要注意把握好两个重点：一是基础信息，二是大事要闻。

1.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的选题

所谓条目的基础信息，就是读者了解年鉴对应范围基本情况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读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参照。基础信息在年鉴中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综合情况这一主体部类的条目，以及其中的概况、概览、综述等条目。

这里所说的“大事要闻”，不仅是指大事记，是指记述内容中以条目形式反映的年度重大事件和重要新闻。大事要闻的“大”，必须具备影响大、分量大；“要”必须具备重要、必要。大事要闻在年鉴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动态信息这一部类中的记事条目（比如，2016年的陇南号通车，结束陇南不通火车的历史）。党委、政府工作的重点，领导机关关注的难点，人民群众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各项建设中呈现出的亮点，以及重大成就、重要进展、重要经验、重要人物、重要成果、重大奖励、重大事件等等，都是条目选题选材方向上的重点。

归纳起来，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分别包涵：各部门、各行业和所辖行政区域的基本情况；年度内取得实效或阶段性成果的重点工作和重大变革；重要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成就；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和突出问题；重大社会事件或自然现象；有较高知名度的事物和社会热门话题；本行政区域上级表彰奖励获得者；有存查价值的其他重要信息资料等。

2. 选题需要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我们在条目选题和条目设置时，要精挑细选，没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事不宜设置条目。这方面主要包括内部事务、内部建设、常规性工作、经常性的学习活动、人事调动、人员培训、达标晋级、行政后勤工

作，反映机关内部的工作布置、做法步骤、实施措施、经验总结等等。另外，一些常规性的领导活动，不好把握和驾驭的敏感问题等，也不宜去选题和设置条目。总之，没有社会实用价值的公事、虚事、应酬事、经常事等等，都不宜去选题和设置条目。

条目选题同时要注意文风，应由记述工作成绩为主向记述大事要闻为主转变，避免工作总结式的选题，去除工作总结式的条目设置。比如某区年鉴的“法制”这一类目中的条目是：[严格制定管理规范性文件][完善政府法律顾问管理][严格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初步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机制][积极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行政复议和诉讼活动]。有的年鉴，从条目名称设置，到内容的记述方式，全书基本采用工作总结式，去掉[]符号，就是完整的一篇工作总结。这与年鉴应有的文风是极其不相符的。

条目选题还要把握重点，把突出主体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我们许多出版的年鉴，在条目编写中，经常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日常事务信息多，年度发展动态信息少；部门政绩信息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信息少；零乱琐碎信息多，系统完整的公共信息少。“中央八项规定”第六项规定：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中央八项规定都明确中央领导人的报道要压缩字数，我们的不少年鉴却往往把重点放在了省、市、县领导的出席活动、讲话上，这与中央的要求不符，也与年鉴本来承担的功能不相符。

另外，随着国家的全面发展，文化和民生被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几年来，全国的许多年鉴在记述内容的关注点和篇幅上，也逐步发生变化和转移，开始进一步加大对文化、民生方面的记述分量。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些新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并在今后的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中得以体现和反映。

3.选题设条时要善于把握热点、亮点

所谓“热点”，也就是社会热门话题。

热点往往是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集中表现，某些热点还具有年度标志意义。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年鉴的年度性规定它必须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通过反映热点和亮点，才能突显年鉴的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年鉴编纂要体现特色，是大家的共识，更是追求目标。而社会热点，多数集中体现了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既有年度性，又有地方性。反映热点，是突显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的有效方法，更能提高年鉴的资料价值和借鉴意义。年鉴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社会热门话题，社会热门话题是年鉴必须去关注和记述重要内容，是年鉴内容创新的重要来源。

比如，近几年来，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而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这就需要我们在选题和设置条目时，对非公经济要开始记述或加大记述比重。对此，《甘肃年鉴》曾对非公经济进行重点选题，专门以特载的形式做过记述；比如，快递业务的迅猛发展，我们在年鉴中是不是应该去关注和记述？在我们省、市、县三级年鉴中，对此基本上没有专门选题，仅仅在“商贸流通”“交通邮电”这两个分目或条目中，有所涉及或涉及很少，这就很有必要单独设立一个分目或条目“快递”，对快递这个行业进行记述，这肯定是特色内容，是创新模式；再比如，这几年，甘肃省的电子商务发展迅速，陇南市2016年被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全国电商扶贫示范市荣誉称号，被称为“陇南模式”，这就是亮点内容。再比如，我省的文博会、农博会、9月份的兰渝铁路全线开通等等，都是新鲜有物的好题材，大家很有必要去关注和记述。

三、优化条目结构和数量

在年鉴的框架结构中，是一个分目统领一组条目。一个部门、行业、地方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一组条目来展现和记述的。条目结构是不同类型的条目

组合。从篇幅大小上分：小条目、中条目、大条目、特大条目；从内容范围上分：单一性条目、综合性条目；从变动与否上分：稳定性条目、动态性条目；从读者对象上分：外向性条目、内向性条目。

1.合理把控条目结构

从条目结构的变化属性上来说，年鉴的条目有稳定性条目和动态性条目。稳定性条目是指连续多年设立、主题（条头）不变、内容逐年更新的条目。主要包括概况、概览、综述等条目，反映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主体业务的条目等。稳定性条目是一部年鉴基础信息的主要载体，更是一部年鉴为便于读者查找资料时能够逐年对比的重要条件。

《中国地方志》杂志在2016年第9期中，刊登了一篇长篇研究论文《从部分地方综合年鉴在中国知网的引证情况看年鉴编纂工作》，文章对全国46个省级（含副省级）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进行了科学地分析论证。从文中数据对比可以看出，《甘肃年鉴》的被引证总卷次、引证文献数量、引证文献中硕博论文数量等十几个数据指标，在46个省级（副省级）地方综合年鉴中名利前茅，不少数据位列第一。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能够长期保持部分固定条目，并适时变换动态条目，便于读者查找资料时能够逐年对比和借鉴。

比如人民法院 ，可以固定下来的条目有：[刑事审判][经济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案件执行]等，这些都是部门的主体工作和业务；比如，市（州）县（市、区）概况，可以固定下来的条目有：[农业农村经济][工业经济或工业与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交通邮电][商贸流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社会事业][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等，这些都是反映的各地最主要基本情况。

动态性条目，顾名思义就是年度动态性内容，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亮点、热点话题。《第五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方案》中是这样要求的：动态性条目要题材新颖引人，主题鲜活生动。比如，《甘肃年鉴》(2017)，[陇南市结束不通火车历史][陈发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寻找甘肃最美家庭]。这些条目主题突出鲜明，事件新颖鲜活，吸引读者阅读。

固定性条目便于资料的查找对比，动态性条目新颖引人。要达到一部水平较高的年鉴标准，二者不可或缺。从条目结构的摆布上来讲，最理想的条目组合是：稳定性条目和动态性条目的比例是7:3。

2.不收内向性条目

内向性条目就是以内部读者为主要对象而设立的条目。比如不少年鉴中记述各部门时，设置出现这样一些条目：[知识竞赛][主题演讲][政治学习][机关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机关事务][财务工作][档案工作]等等。

这类条目的主要表现是：内容上具有浓厚部门性、宣传性、事务性和总结性。年鉴到了读者手中，阅读时这类条目不会被外界读者所重视，基本是本部门的内部人员去看。因此，年鉴选题要从“内向性”向“外向性”转移，也就是要突出前面讲过的反映主体业务的基础性条目。

编辑人员要按照读者对信息资料的关注程度考虑选题设目，对报来的稿件进行编辑时，要在不伤材料主体的同时，去虚存真，尽可能地去榨掉材料中的水分，只保留其中的骨干内容和干货鲜货；要在保有固定条目的同时，择新选大，尽量选收读者普遍关注、查找率相对较高的题材，将读者根本不关心、不感兴趣、不会查考的题材排除出去。

3.条目数量要平衡合理

一部质量较高的年鉴，在合理设置条目和条目数量摆布方面，一定是在全书的内容结构上统筹考虑过的，做到条目数量有大有小，既有所侧重，又合理科学（同一个版块中，出现大批量题目、超大条目的现象，在我们已出的年鉴中是比较常见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记述的各部门、各行业，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按照一定的比重，对处于主体板块的部门、行业，条目数量可以适当倾斜，并只记其主体业务。如果为了各部门之间搞平衡，都是面

面俱到，条目数量一样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年鉴一年比一年厚，越来越庞大，既费时费力，又比例失衡，并且质量不一定高。要裁减条目数量，坚持突出主业，不怕条目数量少，做到能够体现业务主体即可，尽可能去对全鉴瘦身减幅。

要做到瘦身减幅，就要不记或少记非主体业务。非主体业务一般有哪些？如：机关内部建设、计划生育、生活福利、财务工作、文体活动、歌咏比赛、摄影展览、书画展览、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调研活动、联村联户、精准扶贫等等。

四、准确记述选取条目的内容

规范、齐全、完整，是记述条目内容最重要的要素，也是一部年鉴内容资料性是否强大的标志。全国年鉴评奖时，这是评奖环节中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方案》中规定：规范内容要素有统一的内容要素规范，条目内容要素齐全，核心资料比较完整。

设置的条目具有比较规范的内容要素，可以保证和满足读者查找资料时，具备横向和纵向的可比功能（比较、比对）。条目类型不同，内容要素会有所不同。我们不少年鉴是全书篇幅庞大，但落实到具体的一些条目内容上，又往往要素不全、记述不足。

1.要坚持分类别去记述和规范条目内容

条目从类别上来说，可以分为概况概述和记事两大类，记事类又可分为会议、工程、科研、亮点事件等等。

一般来说，概况、综述类条目的内容要素包涵：基本情况、完成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生产经营情况等，这种情况在记述工业、行业、企业和各地域时经常遇到。记述工业、行业、企业概况时，他的主要指标一般是：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进出口额，主营业务收入、利税总额，主要产品产量，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行业内企业数、从业人员数、资产总额、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等；行政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土地面积，人口，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外贸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等。

记事条目的内容要素一般包括：事件的时间、地点、起因、发展和结果。这种情况在记述大事记、会议性内容和记述一些亮点内容时使用较多。此类条目在记述时要把握注意的是：

重大事件类条目（重大活动），着重记述的是时间、地点、名称、举办单位、主要参加者、内容、结果。不罗列出席人员、抄录领导讲话和偏重气氛描写等。

会议类条目，着重记述的是会议名称、时间、地点、主（承）办单位、主要内容和效果等。着重记述会议的重大决定，如新政策、新方案等。不记述会议的进程和场景气氛，不罗列出席的领导人名单、领导接见，不大量抄录领导人讲话等。

科研成果条目，着重记述的是成果名称、完成单位或个人、完成时间、成果价值、获奖等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重点突出成果的“新”及其价值。不对研制的意义和应用范围等进行渲染性描述。

工程类条目，着重记述的是工程名称、地点、时间（包括开工、竣工）、规模、投资、质量水平或达到的标准（不作自我评价，要有依据），承建单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记述开工或竣工典礼场面、领导人讲话。

总之，记事类条目一定要紧扣题目，把握和突出内容重点，既不能面面俱到，又不能缺事少项。我们不少年鉴在记述“城乡建设”时，没有精鉴筛选，具体又繁琐。可以用一个顺口溜来概况：改了几个户，修了几米路；种了几棵花，栽了几棵树；修了几根了棱，装了几盏灯；通了多少气，拆了多少牌；修了几条河，配了几台车。另外，在记述重要会议时，更不能只是罗列了一串领导人的姓名，谁主持会议，谁出席会议，谁列席会议，会议总计多少人参加，然后就算记述完了。以上现象，在我们不少年鉴中还是存在的，

甚至有的比较突出。

2.要按年鉴编写的体例规范去记述条目内容

年鉴编纂和志书相比，虽然在记述方法上，相对要自由一些，他还是必须要遵守体例和规范，不是想怎么记述就怎么记述，对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有详细要求。

要有统一的设条标准和选材原则，选题选材必须有统一的时间、空间界定。年鉴不是志书，记述的是本年度的内容，不存在某一事件的上溯和下沿，更不存在越过地域去记述相关的人和事。如，如何记述兰白经济圈、天水-关中经济圈时，我们的一些年鉴就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合理把握。

要统一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不能文白夹杂。汉字使用应符合《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严格使用规范汉字，不要随意简化或生造汉字，一般也不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要符合《标点符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有关规定。使用计量单位统一执行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使用法定计量单位，除公斤、公里、公顷以外的所有“公字号”单位都应该停止使用，也不使用市制单位，如尺、寸、担、斤、两、钱、亩等。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在对粮食、耕地等记述时，还是习惯采用吨、公斤和亩来计量。但不论用什么，全书必须统一。

全鉴中各种名词、名称要清楚明了，要统一规范。比如，我们的一些年鉴条目或内容中出现：“确保三个机制”“三考工作”“三电专项斗争”“四防建设”“三点四面战略”“543工程”“1111122项目”等等。

记述内容和表述时间时不使用模糊不清的代词和说法。如，“据不完全统计”“当前”“目前”“截至目前”“目前进展良好”“预计产值可能达到1360万元”“累计约”“将近”“差不多”“据说”等等，这类情况在我们不少年鉴中还是屡屡出现的，与年鉴作为工具书和官书的严肃性是严重不相符的。

3.要规范和善用图、表。

年鉴作为工具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图、表具有简明、直观、醒目等特点，十分便于读者作横向、纵向对比。保持主要指标数据的连续反映，便于读者使用，还可美化版面。年鉴文稿尤其是经济部门、市（州）、县（市、区）部分，应增加图、表使用数量。我们的大部分年鉴在使用表格、示意图方面，还远远不够。另外，使用统计表格，按照印刷出版规定，必须使用开口表。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处长）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向省政协文史馆赠送志书

2017年11月20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向省政协文史馆赠送志书仪式在省政协文史馆举行，共向该馆赠送《甘肃省志》24卷91套。省政协副主席黄选平出席赠书仪式。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石晶主持赠送仪式。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李振宇参加赠书仪式。

省政协副主席黄选平对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赠送志书表示感谢。他说，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作为甘肃地方史志编纂的专门机构，多年来精心组织、认真编纂完成多部地方志，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彰显了地方史志服务当地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该次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为省政协文史馆赠送的地方志书，涵盖历史、体育、水利、林业、人口、群团、气象等多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省政协文史馆的藏量。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怡晓红供稿）

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

赵鹏团

内容摘要：戴震与章学诚争论方志属性，提出方志“悉心于地理沿革”的“地理专门”说。戴震的说法，并非故为新论，自隋唐以来这种持论就代不乏人。从隋、唐、宋、明、清正史经籍（艺文志）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历代学人，都与戴震异时同声。这种把方志视为地理书的学术观念，往往发生于时代鼎革之际，为振世救急、讲求实务的时代潮流所激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工具理性特质的具体表现。

关 键 词：方志　地理专门　学术渊源　成因

清代戴震和章学诚在编修《汾阳府志》时，围绕方志的属性发生争论，戴震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①]；章学诚则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②]。近代以来方志领域关于章戴之争的研究，普遍强调宋元以后方志当中人物、艺文、姓氏、古迹、丛钞等门类的出现和增加这一现象，特别是依据人物、艺文的篇幅逐步占据志书篇幅接近二分之一这一实际情况，认为宋元以后方志的根本属性已经由地理转为人文，从而伸章屈戴。但是笔者注意到，这一学术观点主要是从方志史的角度提出，其重点仍在于论述方志的源流。而一直以来，戴震的“地理专门”说是从哪个角度提出来的、其学术源流如何，一直还没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笔者尝试回溯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渊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方志“地理专门”说并非戴震首创，在清代甚至近代之前，持方志“地理专门”说者代不乏人，并且这一观点一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隋唐以至于清代，即使是在宋元以后方志日益人文化的潮流面前，历代正史的经籍（艺文）志都选择将方志归为地理门类，历代也都不乏史学巨擘倡导方志“地理专门”说。这就与现当代学者普遍伸章屈戴的现象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长期以来未能受到较多的关注，本文拟梳理隋唐以来以方志为“地理专门”的学术思想源流，并对这一观念的历史成因作简略分析。

一、《隋书·经籍志》始以方志为“地理专门”

编修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但是方志的起源还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要讨论方志学术归类的起源，首先就要确定方志的起源，以及早期方志的形态。目前学界关于方志起源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将方志上溯于《周官》小史、外史或者《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古籍。而对于地记、图经——定型方志这一发展脉络，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关于方志起源的争论，笔者支持崔富章《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③]和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的观点，倾向于以地记和图经作为方志的早期发展形态。既以地记、图经作为方志早期形态，则方志之始见于学术归类，是在《隋书·经籍志》。

隋志在地理类中，开章明义提出“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④]。既然是将郡国地志和计籍放在一起说，说明史官是将当时的方志看作与计籍一类的文书，这显然是强调其地理而非人文属性，则其将方志区别于人物传记而归于地理门类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隋志又认为方志等同于《禹贡》、《周官》的春官和夏官，具备“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⑤]的作用，

还归纳出从萧何收秦图书、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撰《地理志》、挚虞著《畿服经》、陆任编撰《地理书》和《舆地志》到隋代普撰图经这一发展源流。虽然在隋志当中，还没有出现后世正史明确开列的地理门类，但隋志直承方志的作用在于“以备地理之记焉”，显然就是把方志归于“地理专门”了。

二、唐、宋、明、清正史均以方志为“地理专门”

自从《隋书·经籍志》首开正史以方志为地理的先河之后，后世正史凡著经籍或艺文者[6]，也都承袭隋志的分类思路，将方志著录在地理门类当中。从设置经籍或艺文志的新旧唐书、宋明清史来看，其史部分类前后继承关系非常明显，都很明确把当前方志史研究领域视为方志早期源流的人物杂传、谱牒与地理类图书明确划分开来，而将后世认为正宗早期方志形态图书归入地理门类，显现出与现当代学者认为唐宋以还方志以人文为要颇为不同的学术视野。

《旧唐书·经籍志》当中，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先贤、耆旧、高士、家传、郡书等以人物为重的书归类为“杂传”；而另外设立的地理门类，共收书“九十三部”[7]。特意将两者区别开来。地理门类中除了《山海经》、《水经》、《西京杂记》等上古及西汉地理杂史一类书之外，主要是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的地图和地记。笔者注意到，史官特意把孙处玄撰《润州图经》、阚骃撰《十三州志》、顾野王《舆地志》、郎蔚之《隋图经集记》、魏王泰《括地志序略》等几部早期方志形态的地理总志和图经全部归入地理门类，这说明在《旧唐书》的史官看来，隋唐时期地理总志与图经的主要内容就是“纪山川郡国”[8]，其核心属性应该是疆域地理而非前面杂传中的强调人文。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分类与《旧唐书》大致相同，认为“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9]，把重在人物品评的传记、重在家族世系的谱牒与重在记录地方山川人口的地理书分开记载。地理类共收录“六十三家，一百六部”[10]，在《旧唐书》基础上又增录了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沈怀远《南越志》、许敬宗《西域国志》，这三部都可以确认为早期方志[11]。

《宋史·艺文志》地理类收录图书“四百七部”[12]，包括地图、山川地理杂记和方志。在只统计可以确定为后世正式方志体例图书的保守估计前提下，其中正式方志近170部，约占总数的41.7%。如果说在新、旧唐书当中，还可以说史官对方志的认识偏于狭隘，其杂传当中包含的一部分以人文为重的郡国书和人物传记也是后世方志源头的话。那么，《宋史·艺文志》地理门类当中所收录的，已是无可置疑的方志书籍了。

《明史·艺文志》地理类收书“四百七十一部”[13]，包括地图、地区性的地理杂记、综合性方志、山水庙院等专门性方志等等，其中方志总量较前代进一步增加，约280部，约占总数的59%。《清史稿·艺文志》将地理类图书分为总志、都会郡县志、山川河渠、边防、古迹、杂志、外志七个小类[14]。除去总志中多地图和舆地考释、边防有部分边防军事地理杂记、杂志多地理山川考释杂记、外志多周边各国记闻外，都会郡县志、山川河渠、古迹这三个小类中记录的图书几乎都是方志。而从总量上来看，都会郡县志在地理门类图书中占比最大，该小类图书的方志属性也最纯。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明志到清志，地理类图书的主干就是方志。而在清志里，甚至可以说史部地理类图书，就是指方志而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清时期的正史，史官应当是认为方志类图书的主要甚至惟一功用就是疆域地理，方志图书的精华是在于书中的地理记述，而不应该是其中浩如烟海的人文集萃。

综上所述，隋、唐、宋、明、清正史的经籍（艺文）志，都把方志视为记载地方山川风土人口的地理书。我们知道，在隋唐时期，时人对于六朝地理书的批评非常严厉，主要是认为六朝地理书浮华不实、篇幅短小，于国计民生无益。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大都来自北方地区，朝廷的学术宗旨与六朝颇有不同。唐人就认为方志的作用就应当是“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15]，而认为六朝“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

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6]笔者认为，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实用地理的观念，新旧唐书才刻意把六朝时期大量偏重于人文的郡国之书和人物传记都排斥在地理门类以外。更有意思的是，《新唐书》的主编宋祁和欧阳修都已经是宋人了，其门类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反映了宋人的学科观念。而在从宋代到清末的这个历史时期，方志和其它地理书当中，流连山水、吟咏诗文、矜饰乡邦等方面的内容都越来越多，其人文属性都在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正史当中仍然强调方志的地理属性，这就更为耐人寻味。特别《清史稿·艺文志》在继承此前史著的基础上，将方志的地理属性进一步条分缕析为七个小类，这七类中，除古迹、杂志以外，其余五类都重在侧重国计民生的实用性，甚至杂志当中也颇有不少实用地理的倾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其强调地理书政教功用的学术思想。

三、宋元以来学者以方志为“地理专门”说的梳理

宋元以后，方志体例基本已经定型，平分类目、踵事增华，名宦、僧道、烈女、古迹、祠祀、遗事、题咏等人文类目不断增加，这些类目的文字总量也不断扩充。其中，以人物和艺文两个门类占据方志全书内容比例的增加尤为显著，不少志书对于乡邦的人物传赞和诗辞文赋的收录不厌繁富。到了清代，很多志书仅艺文一门的文字量，就占据全书近二分之一的比例。我们检看古旧方志的序言，当时不少作者和作序的人，动辄上拟班马，将方志比于国史。这种序言，一方面确有浮夸之嫌，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方志体例扩充后其性质的变化。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古旧方志这种序言声音之外，还一直都存在一种不同的声音，有不少学者上承隋唐史学观，与正史经籍（艺文）志归类法相呼应，不断强调方志的地理属性。现择要论述如下：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把史书和地理书明确区分为两类，在史类中又专门设传记这一目，收录了耆旧、高隐、孝友、忠烈、名士、交游、列传、家传、列女、科第、名号、冥异、祥异[17]共13个小类。而将地理类分为地里、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塔寺、朝聘、行役、蛮夷[18]11个小类，明确把方志列于其中。在地理类后面，又有谱系类，包括：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19]。郑氏把方志与史类书籍、重视人文的传记谱系类书籍分别看待，显然是要强调方志经世致用的地理功能。

宋末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引用并赞同《隋书·经籍志》的序言，把方志列为地理书[20]。

明末阎若璩在笺注《困学纪闻》时，专门有一段话讨论方志的地理属性，尤其值得关注：“万斯同季野，曩谓余云：‘撰《一统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传诸书。’余甚骇其说，及近览《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意果不足重在此，一州内或人物无，或仅姓名贯址，即间举生平，亦寥寥数语，不似明《一统志》夸多浮滥，令人厌观。乃悟著书自有体要，苟其人其事无关地理，不容阑入。”[21]阎若璩阐发万斯同观点的这段话，说得很具体，观点也非常明确，万斯同、阎若璩二人对地理书的看法，应当是承自隋唐史学，认为方志应该以实用地理为本，强调它辅益国计民生的政治功用。特别要注意的是，万斯同师从黄梨洲，学问渊源极深，他的话不像是率意而发，应当有所依据。只是由于阎若璩转引万斯同的话只有寥寥数语，很难进一步查证。而且万斯同、阎若璩当世名家，影响力非常大，笔者推断此二人的看法，在当时可能不仅仅代表他们两个人，应该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受众。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22]这虽然是批评明一统志，但显然攻击对象也涉及了明代方志。在顾氏看来，倘若方志不能明详地方山川地形，厘清战守攻取形势，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志书，这显然是以地理属性作为方志的根本。

近人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明代一统志修于天顺时，……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志，至

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乎?”[33]郑氏的观点，远袭李吉甫，近承顾祖禹，也是认为修志的重点在于明了地方人口风俗、山川形势，修志的目的在于留心时务，以备经世之用。对于侈谈艺文、流连诗赋，显然持抵制态度。

以上所述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的观点，除了源自于各人的学术师承作用之外，其背后应当多多少少都有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身历易代鼎革的惨痛之变，必然讲求学问的经世致用。推衍到方志上面，也必然重视其关系国计民生、军国攻守的政治功用。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确认，关于方志的属性问题，自隋唐以来都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随着方志当中人物传记和艺文所占比重增大，认为方志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单纯的一方地理之书转变为地方史书，就像古旧方志序言当中，往往以方志拟于班马，四库馆臣评价《太平寰宇记》也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34]而另外一种看法，即如上文所论述，历代正史的经籍(艺文)志及南宋、明、清、近代的不少著名学者都还坚持方志的实用地理属性。笔者认为，这应当就是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说的历史渊源。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的小序中说:“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35]这就是方志“地理专门”说在乾隆朝的延续了。四库馆臣之说与戴震并时而发，一方面涉及清代学术风气演变，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兹不絮论。另一方面戴震能显赫京师、入四库馆、赐同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等，都是依靠纪昀、裘曰修、于敏达等人的大力提携推荐，彼此交往甚厚。戴震对于方志的看法，应该与纪昀等人有共通之处。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元明以后方志时，特别强调舆图的重要性。而反观戴震所修的《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也都十分强调地图的价值。戴震在《与段若膺论县志》中说“县境图最紧要”[36]，并详细阐述地图的勾画标注之法。显然他们都倾向于强调方志地理书的属性，彼此应当都可以追溯到上述正史经籍(艺文)志的学术归类和郑樵、马端临、万斯同、阎若璩、顾祖禹、郑振铎等人。

方志“地理专门”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宋元以来方志发展的客观情况，一味强调方志的地理属性，似乎失之片面。但它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必有其客观原因。笔者结合古旧方志，对旧时方志的门类作了简单的梳理，发现虽然说在宋元以后，古旧方志中人物、艺文的文字数量占比过半。但我们都知道，宋元以后，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各州县方志在编修的时候，一方面是因袭当时一统志的体例，一方面也是递相仿效。特别是明清方志，各地所修方志的类目雷同性非常明显。总结起来，大体有舆图、境域、沿革、山川、物产、民政、武备、路桥关津、丁口钱粮、赋税课役、职官、选举、庵观寺庙、陵祠楼阁、人物、经籍、艺文、杂钞这些类目。如果不看书中各类目下面的文字数量和行文风格，单纯看门类设置情况，这些类目除人物、经籍、艺文、杂钞外，基本都是地理方面的内容。地理方面的类目在类目总数中占比接近80%。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到了明清时期，方志仍然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地理书。这说明虽然宋代以后方志逐渐失去了在此前历史时期直接关系国家军事政治的意义，而载笔之士又多为地方文人，每每于志书当中流连吟咏、夸饰乡邦人物。但从体例来看，仍不失其以地理之用为首的定位。方志当中学者尽心考订的，往往仍以地理为要，门类数量又以地理居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历代正史将其归入地理门类，戴震等人强调方志为“地理专门”的说法，确实不是故为新奇之论。

回顾历代关于方志的批评和持方志“地理专门”的说法，笔者认为，自隋至近代，之所以方志“地理专门”说一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对于方志明了人口地理、以资战守攻取等实际功用的重视，以及他们对于方志治人文而不得体要这一弊病的不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

历史上战乱易代频仍，而每逢变局，人们总会格外关注实务，而对吟咏性情之事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术工具理性的特质。自先秦以来，中国学者治学，往往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关怀。即使专注于讨论修身、心术的研究，也无不以致盛世之治为要义。史学著作，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知存亡兴替、致尧舜之治的重要工具。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就直陈修书的宗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㉗。方志一体，也不例外。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虽成书于宋元方志定型之前，但李吉甫在序言中对六朝地理书的判语用来批评明清方志的弊病，也并不为过。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以臻于至治为终极关怀的学者们一直比较注意强调方志作为地理书"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的功用。方志"地理专门"说的源远流长，也就不难解释了。

注释：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69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第869页。

③崔富章：《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④《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87～988页。

⑤《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第987页。

⑥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未设经籍志或艺文志。

⑦《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6页。

⑧《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第1963页。

⑨《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1页。

⑩《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第1508页。

⑪沈怀远《南越志》已佚，现有骆伟所撰的《南越志辑录》。据辑录文字看，分载建置、区划、物产、民俗、山川，已与宋代方志无异。许敬宗《西域国志》，据注文应当包括有物产、风俗、地图等门类，也与宋代方志体例无殊。

⑫《宋史》卷二百四《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5166页。

⑬《明史》卷七十三《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419页。

⑭《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六《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4288～4305页。

⑮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卷171，州郡一，典907。

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⑰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87年，第1559页。

⑱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第1575页。

⑲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第1586页。

⑳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考1679。

㉑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4页。

㉒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12页。

㉓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98年，第240页。

㉔《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596页。

㉕《四库全书总目》，第594页。

㉖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页。

㉗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嘉峪关市史志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杨生宝

内容摘要：方志是地方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方志是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修志，提高修志编鉴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修志工作的基础；提高志书质量，把修志事业当成一项文化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来抓；修用并重，地方志既是“官书”，又是群众喜爱的地情资料，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推进地方志阅读普及化，使用社会化。

关 键 词：地方志　编纂实践　创新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多次强调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总书记的重要论断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脉络清晰，为新形势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修志编鉴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坚持依法修志，实现市志、镇志、专业志全覆盖

地方志是地方的名片。坚持依法修志、依法治志，发挥方志“百科全书”作用，把好政治关、史料关、篇目结构关、文体文风关、保密关，确保志书质量，把地方志编纂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是二轮修志中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

（一）贯彻《条例》《规定》，提高修志编鉴重要意义的认识。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颁布后，嘉峪关市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修志编鉴中取得的成果。一是加大宣传贯彻《条例》力度。创办《修志工作简报》，将《条例》《规定》的内容、意义、作用、规定和各级领导的讲话刊登在《简报》上，使其精神、指导思想、相关规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轮修志以来出简报60期，约十万余字，对做好二轮修志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二是完善工作机制。把修志编鉴作为一项文化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确保领导、机构、队伍、条件、措施、运行机制、经费保障到位。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主任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了《嘉峪关市地方志工作规定》，形成主管市长亲自抓，分管秘书长负责抓，市志办公室具体抓，上下联动合力抓，全社会关心支持修志的工作格局。完善了办公室工作职责和聘用人员管理规定，形成责任明确、工作量化、奖惩分明的工作机制。三是坚持修志编鉴同步实施，整理古志和收集资料同步推进的原则。使年鉴编纂、古志校注成为编纂《嘉峪关市志》《嘉峪关志》“三镇志”的宝贵资料支撑，成为养志、促志、辅志的稳固阵地。四是完善软硬件建设。根据二轮修志工作需要，确定16名临时工编制，组成“老中青”结合、专兼职结合的修志队伍。并改善修志条件，建成文字中心，为每人配备一台电脑，并配备了照相机、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连通了政府内网和互联网，确保编修人员与外界的联络沟通渠道，确保编纂工作正常运行。

（二）明确目标，靠实责任，修志编鉴工作扎实推进。

2006年全市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根据中央、省、市修志工作方案，全市启动了《嘉峪关市志》《嘉峪关志》《酒钢志》《新城镇志》《文殊镇志》《峪泉镇志》六部志书和《嘉峪关大辞典》《历代长城诗选》《肃

州新志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嘉峪关图志》及《地名志》《金融志》《烟草志》《交通志》《人口和计划生育志》《城区志》《嘉酒电力志》和工商、医疗、军事篇的编纂。编修人员秉承“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精神，以弘扬民族文化续脉为己任，青灯黄卷，甘愿忍受艰苦、清苦、辛苦和寂寞，淡泊名利、恪尽职守、扎实工作，默默奉献，使修志工作按计划推进，取得显著成绩。2006年12月，《肃州新志校注》出版发行；2008年12月，《重修肃州新志校注》出版发行；2009年8月，《酒钢志》出版发行；2012年4月，《嘉峪关志》出版发行；2014年《文殊镇志》和《历代长城诗选》出版发行；2016年《新城镇志》《嘉峪关大辞典》《峪泉镇志》出版发行。这些志书、词典的编纂出版结束了嘉峪关有关无志、有镇无志的历史，填补了历史空白，对弘扬长城历史文化、提升城市品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理，为编修《嘉峪关市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支持。《嘉峪关市志》(1978—2010)经过参修人员十余次补充、修改、完善和提炼加工，2014年10月，通过市编纂委员会初审，2015年5月，通过市政府复审，2015年12月，通过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2016年3月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地方志书精品工程”，2016年9月通过初审，于2017年10通过终审。另外，《嘉峪关图志》已完成初稿编纂，全市的二轮修志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与时俱进，拓展创新，年鉴编纂步入常态化。

《嘉峪关年鉴》已连续编辑16年、编辑出版15卷。在年鉴编纂中，一是自我加压，敢于突破。编辑人员发扬团队精神，八年间，编辑出版了2007至2016年卷10部年鉴。二是吸收借鉴，不断创新。认真贯彻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吸收借鉴全国获奖年鉴的编辑经验，对年鉴框架结构、内容、板式、色彩、图片进行大幅度调整，使入鉴资料更加贴近实际，更具存史价值，更加精美大方，具有观赏性和阅读价值。三是拓展创新栏目，积累地情资料。开辟了“长城文化研究”“丝路文化研究”“周边地情”“文萃”等栏目，收录本地民风、民俗、人物、事件资料，为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保留了文史资料，增加了年鉴的存史功能。四是设置要事专记，记录历史事件。坚持大事详记，要事不漏的原则，详载细述，宏观把握，在进行文字记述的同时，坚持用照片资料记录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以全新的视角，记载全市的重大发展变化，增强了年鉴的可读性。五是紧贴时代脉搏，记录发展成就。设置“大事记”专栏，全面记述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的重要事件，为后世留下清晰的发展足迹，增强年鉴的资政性，成为领导干部的案头书，工作人员的信息库，对外交流的窗口，市情教育的教材，招商引资的桥梁。

(四)建设过硬队伍，夯实修志编鉴基础。

二轮修志启动后，在人员少、工作量大、任务重的情况下，一是抓好志鉴队伍建设。先后聘请10名退休人员、6名大学生承担志书、年鉴、大辞典等志书的编纂工作。二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修志人员整体素质。坚持每半月半天的学习制度，组织修志人员系统地学习《条例》《规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打牢思想基础；认真学习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理论文章、编辑经验和出版知识。在提升素质上求实效，在修志编鉴业务上求突破，在打造精品上下功夫。通过以会代训、专题培训、相互交流切磋，以老带新，提高修志队伍的业务能力和编辑水平。三是完善目标考核体系，建立责任明确，工作量化，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对新老同志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倡导年轻同志学习编辑知识，组织4名大学生参加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获取编辑资格。对修志成绩突出的老同志给予以褒奖，推动修志编鉴有章有法、有规有矩、有质有量地开展。

二、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在打造精品佳志上下功夫

地方志是全面记述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又是一项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事业和系统工程。具有全面性、权威性、客观性、真实性的特点，在弘扬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一）秉笔直书，突出地域特色。

嘉峪关是因企设市的新型工业旅游城市，又是全国少有的未设县的省辖地级市。特色鲜明，一是工业基础雄厚。域内最大的钢铁工业生产基地酒泉钢铁公司，经过近60年的建设发展，具备千万吨优质钢铁、百万吨铝制品冶炼加工能力，2016年酒钢（集团）公司排名全国500强企业第113位；地方工业形成了以冶金工业为主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力、化工、新型建材、酿造、食品加工为骨干的现代工业体系，嘉峪关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确定为国家低碳试点园区，嘉西光伏产业园被列为全省7个百万千瓦级光伏发电基地之一。二是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及周边地区大中企业聚集，西北钢铁基地、玉门石油基地、中国核工业基地和酒泉卫星发射场鼎足相邻，是甘肃西部生产要素最富集、最活跃的地区。三是文化底蕴深厚。地处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交汇点，是连接中西方最重要的商贸、文化、外交通道，西戎、乌孙、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吐蕃、粟特和党项等民族在这里迁徙繁衍，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地中海文化在这里交融渗透。从黑山石刻一幅幅先民操练演武、狩猎角力、欢聚起舞的岩画，从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的魏晋墓群砖画，从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城，从众多历史名人赞述嘉峪关的诗文中，能感受到积淀在这片沃土之上的浓郁历史文化氛围。四是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文化旅游景区嘉峪关关城、国际滑翔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魏晋墓群、西部八达岭之称的悬壁长城、万里长城第一墩、讨赖河大峡谷、亚洲铁人三项赛场地、长城博物馆、东湖生态旅游园区等一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方特欢乐世界、丝路文化博览园与嘉峪关关城构成“一古一今、一新一旧、一动一静”两大旅游主体，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6年全社会旅游人数达702万人次，全社会旅游收入45.3亿元，增长率达25%上。五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嘉峪关市除了逐年出生人口和农村原著居民外，城市人口全部系外地迁入人口。移民带来的是方方面面的融合，是智慧火花的碰撞，是地理之“通”、思维方式之“通”、人情之“通”、综合创新之“通”、顺其自然之“通”、政通人和之“通”的集中汇聚。一代又一代嘉峪关移民，在丝路和长城的交汇点上，以张骞凿空、玄奘拓荒的精神，托起了城市的新高度。在“一带一路”的大视野中，开启了继魏晋之后新的丝路传说，构筑起了交流与经济大通道的新丝路平台，延续并发展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六是城镇化率高。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4.59万人，城镇人口22.98万人，城镇化率为93.44%。

（二）树立精品意识，在提升志书质量上精雕细刻。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志书的质量取决于资料的征集和编修人员对记述史实的整体把控程度。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精确把握志稿特色，抓住特点、突出重点、攻克难点，把嘉峪关独特的历史地位、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景观、淳朴的民俗乡情，以文献史料的形式全面、客观、系统的挖掘、整理出来，永久保存下来，永世传承下去，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服务。二是继承与创新紧密结合。严格遵循志鉴编纂的要素、规范和体例，在篇、章、节、目设置上打破常规，与时俱进，在突出地方特色上求新、求实、求突破，编纂出工业城市的大气、旅游城市的人气、移民城市的和气、长城文化的灵气，不断赋予方志新的时代内涵，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三是强化资料征集。二轮修志启动后，市志办依据各承编单位提供的资料，组织编修人员对资料一一进行甄别、筛选、核实、挖掘和补充，于2010年底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经上下多次讨论，听取意见建议，反复核查、修改、补充和完善，于2012年形成草稿，2013年10月形成初稿。在此基础上经过十余次轮番审

阅、修改和调整，先后向100多家单位发函征集资料，查阅要案宗卷1000多卷，打电话询问万余次，完善补充资料6000余项，补充核实数据5000多个，于2014年6月底形成《嘉峪关市志》讨论稿，2014年12月形成评审稿，2015年8月形成送审稿，2016年3月形成终审稿，参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全国地方志书精品工程”。2016年9月后，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建议，市志办从源头细节抓起，逐编、逐章、逐节、逐条、逐目的补充、调整、修改和完善，逐句、逐词的精雕细刻，确保用词恰当，引用数据准确，记述事件实事求是。四是严把汇审关。按照自下而上的汇审要求，先后组织60余次编撰人员讨论会，9次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意见反馈会、4次专家学者评审会，对志书的规范性、权威性、客观性进行点评和评审，经层层反复审查“会诊”，志书编纂质量“可回溯、可倒查”显著增强，经受住了历史和读者的检验。

三、坚持修用并重，拓展志书的社会途径

修志是为了用志。地方志是研究、传承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拓展志书的社会途径，使地情资料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于群众，是地方志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发挥地方志“资政、育人、存史”功能。

一是围绕“资政”功能，组织编写资政类史料《嘉峪关大辞典》。把地方志真实记述的历史经验教训及各单位过去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汇总梳理，供各单位制定政策，各级领导做决策时参考。二是围绕“育人”功能，收集、整理、校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到近现代的长城诗词，选取523位诗人以长城边塞诗为题的诗词905首，编纂出版110万字的《历代长城诗选》，受到读者的追捧。三是围绕“存史”功能，强化对自然灾害资料和人类抗御灾害资料，人文、自然地理特征，长城文化、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收集和抢救。通过编审《肃州新志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发现丢失已久的5处文物古迹。两部肃州古志记述的古城堡，名胜古迹，现已成为备受游客关注的旅游热点。

（二）挖掘历史文化，保存地情资料。

一是加强古方志研究，挖掘长城文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古籍中有关嘉峪关地域文化的记载，挖掘积累了丰富的长城文化史料。二是挖掘历史文化，提升文化魅力。为2003年央视第10频道“家园”录制《大漠雄关》节目，2007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录制《走遍中国·嘉峪关》，甘肃电视台录制《文化风景线·大漠雄关》，2011年浙江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拍摄电视纪录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三是完善地情资料收集。结合志鉴编纂，将中央、省、市报刊杂志、照片资料，分类装订成册，完整保存下来；加强与兄弟市州方志工作机构的沟通联络，交换市、州（县、区）志230余部，各类年鉴200余部，其他工具书200余部，为建立方志馆积累了资料，奠定了基础。四是积极开展地情信息服务。在修志编鉴的同时，为基层和外来客商提供市情资料，为招商引资和旅游开发服务；年鉴、志书出版后，分发档案馆、图书馆，并将志书、年鉴资料拓展到政府网站上，方便读者阅读查询，营造修志、用志、传志的氛围。五是加快志馆建设。目前，占地近80平方米的嘉峪关市方志馆正在建设中，随着方志馆的开放运营，方志这座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将会开放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作者：甘肃省嘉峪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兰州水车研究

邓 明

内容摘要：本文对三国以来龙骨水车、竹质筒车、木质水车等传统提水农具的考释，探寻明代段续等在甘肃黄河段引进水车提灌技术的过程，兰州水车的建造、管理以及水车民俗及文化的概貌，以寻绎古代甘肃人的“天人合一”绿色环保观念。

关 键 词：龙骨水车 筒车 兰州水车 段续 水车文化

由卢嘉锡总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和《机械卷》上说：古代水车是转轮提水机械的统称，按动力分有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因为动力装置不同而有不同形制。用人力或畜力的水车称龙骨水车，利用水流冲动来提水的水车称筒车。东汉及三国时均有水车发明的记载，但那是龙骨水车，唐代始发明筒车，此后开始推广应用。

一、水车的前生今世

（一）东汉三国时的水车是龙骨水车

东汉时水车始见于记载，《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汉灵帝时太监“十常侍”擅权，其中的张让，他搜刮民财，大修园林、宫殿，派掖庭令毕岚“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里的“翻车”就是龙骨水车，“渴乌”就是此车上的提水装置。此车由上下两个链轮和传动链条为主要组件。将此车置于河边，双手摇动辘轳，驱动轮轴旋转，带动木制链条（即龙骨）及其上的刮水板循环运转，不断将水刮入木槽，将水吸上河岸，用来路面洒水压尘。这当然比人工挑水泼洒路面，省事多了。《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傅玄《序》记三国时马钧：

> 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

自张让时过了三十年多年，到三国曹魏时的发明家马钧，在吸水洒路的翻车基础上，经过改进，不仅提高了吸水效率，而且使之轻便灵巧，无需壮汉费力手摇，只需儿童轻轻摇动就能不断吸水灌园，超过以前的翻车上百倍。后来将手摇辘轳改为脚踏拐木，人抓住木架，踏动拐木，即可将水吸入田内，这比手摇的更为省力。其提水高度在一两米左右。

（二）兰州水车是筒车

兰州水车的鼻祖是筒车，它是利用水流冲动来提水灌溉的机具。筒车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陈廷章的《水轮赋》，水轮就是筒车。《水轮赋》描述筒车提水功能：

> 水能利物，轮乃曲成。升降满农夫之用，低回随匠氏之程。……鄙桔槔之烦力，使自趋之转毂。……钓深之远，沿洄而可使在山；积少之多，灌输而各由其道。

指出利用水流的冲击力，转动水轮装置，提水上升，灌溉农田，比利用杠杆原理的取水机械—桔槔省力多多。由于筒车在水轮上装置汲水筒，水轮的直径几乎等于提水高度，结构简单，用材基本上是当地盛产的竹子，因之造价较低，维修方便，至宋代已在南方广泛流行了。元代王祯《农书》对筒车的结构、制造方法有很详细的介绍，并附有详细的图谱，可供仿制。

二、水车引进者辨正

近来有人说兰州水车最初发明于东汉，三国马

钧又进行了改进，唐宋时期中原各地广泛使用了水车。这种说法实际上把手摇或脚踏龙骨水车，误认为凭借水流冲击力而提水灌溉的筒车了。并说民国《靖远新志》载房贵于正统三年(1438年)从南方老家把水车引进到靖远黄河边上。[9]关于房贵引进水车之事，查阅几部靖远县志，其说不一。

(一)房贵引进水车

现从靖远县建置说起。今靖远县明正统二年(1437年)置靖虏卫，属陕西行都司，雍正八年(1730年)改为靖远县，隶属于巩昌府，乾隆三年(1738年)改隶兰州府。正统二年(1437年)修废城为靖虏卫城，北抵黄河仅二里许，先后置守备、参将，辖六堡、十四屯寨，统领官军三千名，严加防守。其中任过守备的名将叫房贵，对于明代靖远的建设贡献很大。现存最早的靖远县志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李一鹏等纂《重纂靖远卫志》，其卷之三《射部·房贵传》载：

房贵，宁夏人，由汉中守备正统二年任，同藩臬建置靖虏城垣、公廨、墩塘。事竣递饬守备。正统三年(1438年)，奏设学校、仓场、驿递。景泰元年(1450年)，奏讨楚府，牧军七百，以资战守。百务聿举，事妥人安，历二十年。都御史耿九畴荐进署都指挥使，回司掌印。天顺三年(1459年)乞休，遂籍于卫。

从中可知房贵为宁夏人，正统、景泰、天顺时，任靖虏卫守备，筑城、置驿、设学，百事俱兴，边城安宁，致仕后落籍当地。但无房贵于“正统三年从南方老家并水车引进到黄河边上”的记载。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潘绍尧等纂《续增靖远县志》卷一《舆地志》中有房贵建水车的记载：

水池在北城外，正统二年(1437年)指挥房贵建于黄河南岸，安置水车，城北挑挖大池，引水注地，汲取甚便。年久山水泛涨，遂致冲坏，而崖岸犹存。嗟乎！房公惠人之功大矣！惜无继起者。今城北沿河上下，用水车激灌园圃，菜果给用不乏，盖皆仿其遗意而为之者。仁人之用心，其利普哉！

这里明确指出房贵于正统二年建水车，引水注地。但因年久，山洪暴发冲毁，只剩崖岸。至乾隆时仿建水车，灌溉园圃。此志但未曾记述这种水车是龙骨水车，还是筒车？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范振绪《纂靖远县新志·房贵传》载，房贵：

复念(靖虏)卫滨大河，多沙卤，冲毁无定，乃筑堤开渠引水。地较高者，复立桔槔、挑轮以济引之，至是，卫之水利以兴。”

此志比乾隆志晚出了190年，记述房贵所制为两种提水农具：一为以杠杆原理的提水工具——桔槔，一为筒车式的挑轮。

综上而述，房贵于正统二年建水车的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志，但不知是龙骨水车，还是筒车？这个水车因年久，被山洪冲毁，“惜无继起者”，直到乾隆时，才“仿其遗意”造水车灌园。这里不知是仿谁的遗意？若仿房贵的，早已冲毁，无所凭借。民国志则说，房贵建的是桔槔和挑轮提水灌溉，挑轮即筒车。

(二)段续引进筒车

明代所修兰州志书佚失。关于段续建水车的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黄建中纂《皋兰县志》卷五《水利》：

言水利于皋兰，宜莫如黄河者，郡人段续创为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亩，致有巧思。然有力者自办，无力者官贷。修补之工，无岁无之。遇旱则水落而车空悬，遇涝则水涨而车漂没，必水势得平，车机乃能无滞。所灌半田半园，通计东西夹河滩及南北两岸之上仅二百馀顷，而水之及时与否，不可预定，是所济不普，而利非自然也。

这里明确指出是“倒挽河流”的筒车式水车，并评论“致有巧思”。同时指出了水车的局限性：旱涝都不行，只有不旱不涝，水位持平，方可倒挽河水灌田；建造费用巨大，每年修补，费钱费工。

关于段续的生平，此志卷十四《人物》为之立传：

段续，字绍先，号东川，(段)坚曾孙，增之子。嘉靖癸未(二年，1523年)进士。诚笃精明，有公辅望。初以才力堪风宪，授云南道御史，议大礼，忤旨，廷

杖，谪鄠城丞。后知杞县，均田，革弊，绰有声称，祀名宦。历官湖广参议，督修显陵，调停节省巨万，擢密云兵备道。陵功告成，加三品俸致仕。总督贾应春荐称："孝友忠信夙重。乡评正直廉平，允孚士论。"未及起用卒。

从中可知，段续因为以都察院云南道御史的身份，在"议大礼"时"忤旨"，也就是反对嘉靖帝为其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为兴献皇帝，被贬官。由于在杞县知县任上均田、革弊，升为湖广参议。湖广行省辖今湖北、湖南两省，省会在武昌。参议是从四品官。又派去安陆（今湖北钟祥）督修兴献皇帝的陵墓显陵。此地正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皇子兴献王朱祐杭的分藩之地，山清水秀，多有竹制筒车倒挽河水灌田。段续督修显陵时，科学调停，节省经费巨万，陵墓修成后加三品俸，说明他历练了督修大工程的能力；同时，对于当地的筒车提水灌田的技术有所了解。

明代兰州进士、举人在南方做官的很多。如举人石执中宣德时任浙江布政使；探花黄谏正统时出使过安南（今越南）、任过广州府判；进士滕佐景泰时任过四川按察使；进士陈祥成化时任四川按察使；进士彭泽嘉靖时任徽州（在今安徽）知府；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有个共同点，没有督修工程的经历，因之对于南方的筒车熟视无睹，当然无从引进筒车提灌技术。

段续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致仕回兰州后，根据对南方筒车的感性认识，指挥工程的经验，参阅元代王祯《农书》中关于制造筒车的说明和图谱，凭借段氏家族的财力，在黄河南岸教场河段家湾（今宁卧庄一带）建成兰州第一辆水车。沿黄河农民纷纷仿制，遂使兰州成为水车城。为此，民国陇上学者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卷十五页二十二中评论：

通都大邑之间，见有高车而过者，则万头齐攒，可谓荣矣。而绿如秋草，过时即腐。段续急流勇退，为桑梓兴水利，其最初所创之翻车，皋兰人至今以"祖宗"称之。不求名而名或不磨，所以实业为贵耳。

地方志说段续"创为翻车"亦无大错。筒车也叫"水转翻车"。段续并未全部照搬照抄竹制筒车，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兰州不产能够制造筒车的竹子，黄河水面与农田的距离往往在十至三十米之间，这比南方的要大的多。在这种情况下，段续因地制宜，有所创新：一是充分利用当地出产的槐榆柳等木料；二是加大水车的直径，一般在十至三十米左右；三是直径大，水车的重量随之增大，往往重数千斤。推动这样的庞然大物，就要增大河流的冲击力，创新措施为：在水车上游筑扇形坝，将强劲的河水逼向水车巷，以增大冲击力。深掘水车巷，底部嵌硬石，使之形成很大的落差，产生很大的冲击力。经过这些创新措施，终使庞大的水车吱吱哑哑不断旋转，倒挽河水灌田。因此，不必苛求黄建中所用"创为翻车"之说。

其实明代就有兰州水车的记载。明代兰州属临洮府管辖，据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唐懋德纂《临洮府志》卷七《食货考·水利》兰州条载：

崔家崖坝、教场后坝，皆东西贰川所资水利于黄河者，灌田贰百馀顷。

这里虽未明言水车提灌，但确为水车提灌，因为明清时，兰州自流灌溉的水利设施只有溥惠渠，此渠引阿干河水，共灌南、东、北、西园四十余顷，其地大致在兰州旧城南、东及西南、西北。而西川的崔家崖（在今七里河区）坝、东川的教场（即东教场，即今西部战区陆军总部驻地）后坝，俱由水车倒挽黄河提灌。

清乾隆元年（1736年），甘肃巡抚许容所修《甘肃通志》卷五《山川》亦有清初水车灌溉兰州农田的记载：

有夹河滩二：一在州西十五里，草木丛杂；一在州东十里，可艺五谷。又苏家滩在州东北四十里，引河灌溉，甚为民利。

苏家滩"引河灌溉"的显系兰州水车，因为当时自流灌溉的只有一条溥惠渠。

总之，房贵于正统二年在靖远县建水车提灌，后来被洪水冲毁，直到清乾隆时重新仿制。段续于嘉

靖二十年以后在兰州建水车倒挽河流灌田，沿河农民皆仿效，到万历时能灌溉200多顷农田。这种技术在兰州自明清至民国连绵不断，到道光时有水车约150辆，灌田27420多亩，清末增至157辆，灌田19932亩，到1945年增至176辆，灌田29700亩，直到今天西固区新城下川仍有1辆清代所建水车，兰州水车可谓源远流长，流传有序。

三、关于段续造水车的几个问题

(一)段续在何处学得简车提灌技术

自改革开放以来，宣传兰州历史文化的材料很多，其中多说段续在云南做官，学习当地的简车技术，回兰州后创制水车，他们的根据是段续任过云南道御史。考察明代都察院十三道御史的职掌，即可知段续虽然做云南道御史，但他未曾去过云南。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湖广、陕西、云南等十三道监察御史是督察院属官，而督察院是中央监察机构，督察院的官员不奉差事，则不去地方。十三道监察御史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纠察百官，并负责两京刷卷，监督科举考试，巡视内库、皇城等。云南道监察御史还协管顺天府(北京各县)、广备库、在京羽林前卫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去外地出差，主要是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马等。《明史》有三处提到段续，都是嘉靖三年大礼议中弹劾席书、桂萼的事。《明史》及兰州方志均无段续巡按运南的记载，而他仅当了不足一年的云南道御史，故段续没有去过云南，当然就不会考察云南简车了。

那么段续是从何处学习简车技术的呢？应该是在今湖北，段续任湖广参议时，湖广行省辖今湖北、湖南两省，又去安陆(今湖北钟祥)督修兴献皇帝的陵墓显陵，见到竹制筒车倒挽河水灌田，学得其技术，回兰创制水车的(详见前论)。

(二)段续创制兰州水车的时间

段续大约于嘉靖二十年就退休回到兰州。据他撰文书丹的《兰庠生傅君良弼墓志铭》《明故吴母孙氏墓志铭》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尚在世。那么他创制水车的时间便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七年之间，或稍后数年了。

(三)段续创制兰州水车的构件

段续利用兰州所产榆、槐、柳木取代竹子创制水车，视河岸高低，做直径或20米左右、或30米左右的巨轮。巨轮用辐条，纲线等加固，轮周围置刮水板、长方体木桶。栽4根立木，通过托梁、车轴，装置巨轮。巨轮下部沉入水车巷中，上部高出河岸。水激轮转、木桶依次倒挽河水，倾于承水木槽，流过空中高架木槽，浇灌农田。一辆水车可灌田七八百亩。

(四)祖师车的位置

段续制作的第一辆水车，人称“祖师车”，它在何处呢？有的说在河水道北段(今金昌路北端)黄河边，人称“老虎车”。然而这是清代兰州回族举人虎文炳家所制水车，浇灌虎家花园(今甘肃省教育厅址)，即老虎家的水车，故名“老虎车”。有的说在段家滩。明代某年“兰州户一千一百七十，口六千三百四十二”，[②]人口不足7000人，分布在城内及城外近郊，基本上在黄河南岸居住，段家滩、雁滩等东十八家滩还是草木丰茂的夹河滩，未曾开发，哪里有什么“祖师车”呢？至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人口增殖，“户七万三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万五百四十六”。[③]也就是说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128年间，兰州的人口就比明代的人口增加了将近63倍。按此计算，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元年(1736年)92年间，兰州人口到康熙乾隆之交达20多万，黄河南岸可耕地不足，包括段家滩在内的东十八家夹河滩方才逐步辟为农田，有人居住，此即《甘肃通志》所载：兰“州东十里”夹河滩“可艺五谷”，“又苏家滩在州东北四十里，引河灌溉，甚为民利”的情况。

那么“祖师车”究竟在何处？据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秦维岳纂《皋兰县续志》卷三《水利》载：

水车园水车三轮，灌地六百馀亩。又东曰教场，北并河港汊，水车十轮，灌地一千二百亩。又东一里段家湾，邑贤段续官南方，得水车法，始引河水，水车三轮，灌地六百余亩。

水车园即今大教梁至金昌路之间，因岸边水车而得名，盛产瓜果蔬菜，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光辉社，现已成为楼群。水车园东为明清以来的东教场，驻军及演武场，新中国成立后为兰州军区联勤部，现为西部战区陆军总部驻地。这里的黄河汊河，也即南河道，因东教场而得名于教场河。再往东一里，为段家湾，系教场河河湾地带，因段续在这里创制第一辆水车而得名，其地即今宁卧庄宾馆北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填河拓筑为南滨河东路。

（五）段续创制水车的条件

明代兰州进士在南方做官的有黄谏、滕佐、陈祥、彭泽、刘漳、邹应龙、胡执礼等十来人，他们肯定见过简车，何以未将其技术引进兰州，唯独段续才将其引进呢？其原因有四：一是段续有济世救民的思想，注重实学；二是督修显陵的经历，使他了解工程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并获得了指挥重大工程施工的实践经验；三是段续一定研究过元代王祯的《农书》。《农书》中有《农器图谱》12卷，有插图200多幅，多为复杂的机械图形，每图附有说明文字，其中就有简车图形及文字说明，便于仿制；四是兰州段氏，世代为宦，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成为创制水车的物质基础。段氏的始迁祖段鸣鹤是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为锦衣卫力士，随肃庄王移藩兰州，聚族而居于东关，人称段家台（在今广场西口）。其子段坚为著名理学家，官莱州和南阳知府，《明史》有传。段续之子段炅为翰林院检讨。段续为段坚侄重孙，段续之子段补做过几任知县。总之，段氏家族在明代出了4个进士，其中1个是翰林，9个举人，世代簪缨，其聚族而居之地除段家台、段家湾外，尚有段家庄（今皋兰山红泥沟以北火车站西路花园招待所一带），段家湾农田以水车提灌农田，段家庄用五泉山、红泥沟水开渠灌田，这些旱涝保收的膏腴之地，可生产丰硕的农产品，此外还有房产、商铺等产业，表明段氏有经济实力，故能够提供巨金，创制水车。

四、水车的建造和管理

（一）水车的规模

自明嘉靖间段续创制黄河水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农民皆仿效焉”[4]。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水车已遍布河州到中卫县的黄河两岸，具体分布是：

兰州府属河州之积石关黄河入境起，经由皋兰、靖远二县地方，至宁夏府中卫县交界处止，计长七百七十里，因地高河低，难于疏引，且土性带沙，沟洫易淤，是以向未开有渠道。惟沿河两岸农民安设圆轮水车，水冲轮转，岸水浇灌，不费人力，而田滋润，收成倍丰，其法最善。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肃巡抚明德向乾隆帝呈关于“沿河水车亟宜修复，以资耕种，以利民生”奏折，是年，官方拟“填建水车九十二轮，浇地两万九百一十亩”[5]，则每轮水车平均灌溉227亩。到1944年，甘肃省共有水车361辆，灌田96300亩，平均每轮水车灌田267亩。[6]清道光时，兰州水车西自皋兰县半个川（今属永靖县）起，东到青城、水川（今属白银市），黄河两岸以及黄河夹河滩共150辆水车，灌田27420多亩；[7]光绪时有157辆水车，灌田19932亩。[8]1936年，兰州黄河两岸共有水车148辆，共灌田19500亩，平均每辆灌田132亩。[9]

清代有绘制水车分布图的制度，现存两帧，存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皆为光绪时所绘，题为《皋兰县黄河南岸握桥至东岗镇修防及水车位置图》《皋兰县黄河南岸段家湾一带岸门口水车灌溉区域图》（前者有索引，但图找不到），采用山水画的技法，彩绘弯曲黄河以及夹河滩、沿河明长城、镇远浮桥、兰州城池，逐一绘出水车位置、辆数，在相应位置贴上红纸浮签，上写所灌农田亩数、田主姓名。但未注明绘制者，可能为皋兰县衙绘制，用以全面掌握水车情况，以备征税，或打官司的凭证。

（二）水车的组合

水车大小不一，一处取水处多设置一辆水车，也有二辆一组、三辆一组，五辆一组，最多十辆一组的。一辆水车一般灌田一二百亩，三辆水车一般灌田五六百亩，五辆水车一般灌田一千多亩，十辆水车

可灌田一千二百多亩。

这些水车浇灌农田、果园、菜地，使干旱少雨的兰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膏腴地区。

(三)水车的选址

水车并非随意就能在黄河边修建的，关于水车的选址，兰州翰林刘尔炘总结出八条：

一河岸不可太高也。太高则车轮不大，不能引水上岸。大则笨重拙滞，水之力不可胜。一河干不宜太深也。盖筑坝愈长，取势愈远，水愈有力。有车在此，而取势在二三丈之外者，太深则石衔精卫，填海无功。一水性不宜太缓也。河至兰州，两山夹束，其势奔放，故能得力。若河身宽阔，有汪洋浩瀚渟蓄之致，则其性必缓，无计可施。一河底之刚柔宜办也。兰州之河皆石底，每有天然水港如支流，然略加修筑，即成不拔之基。倘沙软泥松溏焉，若不测之溪、无底之壑，则石不能留，坝不可起。即勉强施工，而坝基不牢，易于冲刷。一水势之涨落宜察也。察其常年之中涨至何所，落之何地？而取其中，不致猛雨暴涨，车随水去，小旱不雨，车又停轮，随停轮之弊究不能免，而暴涨之患在所必防。一水边宜多粗砂大石也。此间乡民有仅筑两坝，而费至数百千馀金者。若运石远方，则劳费难支。一境中宜多茂林大木也。一轮之力，所利无多，推广扩充，必欲成十轮十数轮以溥其利，非就地取材，不能得心应手。一民间宜有铸冶铁工也。车轮之轴径数尺，两端围以铁箍，架上受轴处亦用铁承之，如仰月形，名曰仰盂，与铁相切，注油其中，车便灵动。其铁箍有重至数十斤者。若无此工，亦不免棘手。凡此八端，皆极切要，而轮机之制造，犹其后焉。[10]其中前五条说水车选址时必须调查考量其地形、地势、地质及水文条件，条件相当苛刻，这就是为什么从河州到中卫县长770里的黄河两岸，仅仅只有360多辆水车的原因之所在。后三条建议就地取材，以节省经费，以省民力。

(四)水车的建造

水车是用榆、柳、槐等硬杂木制成的。先用黄河石筑起两道名叫“龙墩”的石坝，坝四周打入柳木桩使其坚固而耐冲刷，形成水车巷。“龙墩”中各砌入两根名叫“马口”的木柱。“马口”上安置驮梁，其上装置榆木车轴，车轴上安装车轮。水车的主体是车轮，其中心是轮轴，粗约三尺，轮轴周边安装辐条，一耦两根，辐条外端用一条条木板固定，形成一个大圆圈，成为“纲线”；再向内用一条条称之为“蹬弓子”的木条，固定辐条，形成一个内圆圈。两圆之间装置刮水板和名叫“挽子”的长方形水斗。车轮大的直径有八九丈，小的四五丈。靠岸边栽树干成为“鸢架”，其上置承接水斗倒挽河水的“掌盘”。再栽一溜顶端分杈的树干，仅仅剐去树皮，取弯曲自然之势，架上木槽，将河水引入农田。水车的上游用卵石砌成一道石坝，呈扇形，加大水量，加快流速，把河水逼向水车巷，再加上巷内掘有深坑，用石头镶砌，形成很大的冲击力，才能使上万斤重的庞大水车转动起来，提水灌田。

(五)水车的管理

兰州水车最早在农历二月二举行开启仪式，九月中旬停止，提灌时间7个月左右。兰州地区的降雨集中在农历五、六、七三个月，而多数农作物在农历三月前后播种，这就要靠水车提灌，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水车的运行由车头管理。车头由灌田农民推举，都是些办事公道，为人诚实，掌握技艺的农民。无论是一辆，还是三辆一组、五辆一组，一般推举两个车头管理，正的尊称为“大车头子”，副的称车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保障水车顺利转动，倒挽河水灌田，以及组织农民维修水车，疏浚巷道。灌田期，他们住在水车巷道旁的水车房子里，轮班日夜看护水车，注意水车的各个部件是否牢靠？看水斗的铆是否松了？刮水板是否掉了？辐条是否松动？一旦发现问题，视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拴车”(刹车)修补？还要关注水坝是否漏水？漏了要及时堵漏。还要及时给车轴膏油，油是用猪板油熬制的。每年灌冬水后，水车停止运转，车头就要拔掉销子，把水斗一一拆下，藏在埽台下的窑洞里，使它润而不干裂，

次年春天一一装上。

这都是些技术活，其中最难的是“牢车”。所谓“牢车”，就是农田灌饱浇透或雨后，不需要水时，要用粗麻绳将水车拴牢，使它停止转动。“大车头子”先将近两寸粗的麻绳一头拴在岸边的拴绳木桩上，另一头打成环形，瞅准时机，算好提前量，将绳子从转动的水车辐条间抛过去，然后迅速跑过水车巷的木板桥，抓住绳头，套在拴绳木桩上，就能刹住水车，不再转动。白天、晴天还好“牢车”，雨天、夜里就要显神手了，万一操作不当，就会摔伤人。

灌水次序的前后和时间的长短，根据用水农民贡献的多少而决定。贡献指建造和维修水车时出钱的多寡，清淤修坝的出工数的多少。计时一般按燃了几炷香来计算，为了使香的燃烧速度恒定，要装在香匣里避风。某户规定的香烧完了，地未灌完，则由下一户灌溉。这一切由车头掌管。

每年开春后，由车头收钱，算工，组织农民清除水车巷道里的淤泥。黄河含泥沙多，经过一年的过水，水车巷里淤积了很厚一层泥沙，很硬，铁锹铲不动，就用人拉耧铧犁松后，装入背斗，倾倒在水坝上，既利于过水，又巩固了水坝。还要请木匠维修水车，坏的木构件换了，破的补了，以确保水车正常运转。

维修完毕后，待二月二龙抬头，要宰猪会餐，举行开车礼式。大车头子祭供猪，焚香化表祷告龙王爷等水神，祈请保佑水量丰沛、水车安全。同时在神的面前报告收支情况，并张榜公示。之后将猪切为若干条，每户分一条，称之为“抓份儿”，然后再吃烩菜馍馍。所谓“抓份儿”即是古代“分胙仪式”的遗风，“胙”就是祭肉的意思。古人认为祈福时以牲体通神，神灵在享受祭肉之后，便将福祉寄寓在祭肉中，所以，分胙就能够得到神的恩赐。中国古代的分胙礼仪，起源于原始的图腾文化中的宰杀和分食图腾圣物的古老习俗。后来逐步发展和演化，在祭祀文化体系中，以礼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所谓的“分胙礼仪”，就是宰牲祭神之后，将祭肉分给与祭者食用的一种活动。分胙礼仪可以促进人神之间的交流，进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完美精神境界，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新水车造成了，大车头子选择黄道吉日吉时吉刻，主持隆重举行开车仪式。在水车上贴红纸对联，供上猪头、羊头，焚香叩头，恭读祭文，祷告河神保佑，水量充沛，水车稳如泰山，鸣放鞭炮，开坝放水，转动水车。之所以供献猪头、羊头，是沿袭古代少牢祭祀礼仪，诸侯、卿大夫祭祀宗庙时即用猪、羊，见《礼记·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要加上牛。

(六)水车的命名

水车皆有名称，林林总总，雅训俚俗并举，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是按一组水车的辆数得名。如三辆车、五辆车、十辆车。

二是以姓氏而得名，即以出资建车者的姓氏得名。如老虎车意为老虎家的水车(举人虎文炳。详见前文)。练家车，为练氏家族出资所建水车。兰州练氏为明初建文帝忠臣后裔。练子宁(1350～1402年)，新淦（今属江西)人。明洪武时翰林修撰，建文帝时改任吏部侍郎，因痛斥燕王篡权谋位，被惨杀，族灭，其漏网后裔逃亡兰州得以延续后代。还有刘家车、王家车，分别由刘家、王家出资所建。

三是以吉祥语而得名。东胜车、三义车、永和车等。

四是以水车所处位置而得名。如上车，意为处于上游的水车。下车，处于下游的水车。红古区湟水弯曲处，建水车四辆一组，称水车湾。

五、水车文化

水车独居特色灌田功能及其高大、空灵极富动感的形象，使古今之人产生美感，激发创作激情，于是写作诗文，创作美术作品，乃至制为旅游商品、布置园林环境、印入钞票和邮票，不一而足，形成绚烂多彩的水车文化。

(一)诗词歌赋中的兰州水车

自兰州创制黄河水车以来，关于水车的诗词歌

赋、绘画作品层出不穷。青城副贡生金炼所作《翻水车赋》：

繄翻车之创制，自汉代以相传。起桔槔之挹取，陋抱瓮而往还。轮因回以引水，地有轴以随天。个个瓢翻，激惊涛兮百尺；辘轳环转，泊银浪兮长年。盖其为制也，如南斗之挹酒浆；其运勺也，如北辰之转轮廓。其去势之蜿蜒也，若戏水之游龙；其陡形夫转侧也，若盘天之野鹤。尔乃板压波心，瀑垂云窟，斜挂长虹，空捞明月。昼而望之，晴亦风雨；仰而观之，高凌巍阙。逝者如斯，斯相代代，叠出不穷；水性喜下，下乃上上，取之不竭。如阴阳之循环无端，如日夜东西之出没。原夫湍水无分西东，使之在山，得其寰中。非若推车之往而复还，运行必需牛力；若非挂车之夜以继日，转动要用人工。南阡北陌，旷野平原，变为沃壤，胥作良田。荷锸如云，不借油云之布；携锄成雨，俨然得雨而先。开不涸之财源，同等乐岁；收无疆之利，爰记长篇。

歌曰：法四时之运行兮，功一成而退。一消一息之因时兮，明与晦相对。若稍事倾侧与羁留兮，不陨越而奔溃。久能执其中兮，斯翻车实可佩。永言在兹乡兮，愿无侧而无背。

又诗云：汉时巧制夺天工，引水非关郑白功。苗到旱时曾望泽，车因底处更翻空。斗旋勺运连云汉，浪激轮奔带雨风。野老灌田谁抱瓮？西桥遗样古今同。[11]此赋骈四俪六，洋洋洒洒，先写水发明史，接写水车的工作原理，以颂扬水车的贡献而结束。巧用典故，词句典雅，音韵铿锵，诚文理俱佳的短赋。金炼意犹未尽，继写离骚体歌、近体诗七律，多侧面阐发水车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佳制。

还有大量吟咏水车的竹枝词：

清乾隆兰州举人江得符：

我忆兰州好，熏风入夏时。踏花寻竹坞，醉月泛莲池。泉石多情趣，园林尽古姿。晚来水车下，凉意沁诗脾。[12]

道光时叶洋：

水车旋转自轮回，倒雪翻银九曲隈。始信青莲诗句巧，黄河之水天上来。[13]

民国黄国华：

水车日夜未尝停，水在金城头上行。蔬菜禾苗碧万顷，丰收原不关阴晴。[14]

(二)行旅者眼中的异物

清代民国以来，东南一带人士西行过兰州时，出城到黄河边欣赏有如摩天巨轮般的水车，成为习俗，震撼之余，写入其行记。

(三)兰州水车是画家描写的对象

马五《金城揽胜图》所绘同治、光绪黄河沿的两处水车：居东的是老虎车，居西的是浇灌陕甘总督署内节园的水车，具有写实性。而晚清民初兰州画家温晓舟所绘《兰州八景图》之一"莲池夜月"景观，画的是小西湖荷花怒放，芦苇飘拂中的水车，则带有几分写意色彩。

(四)兰州水车是摄影家捕捉光影的对象

自晚清以来，外国人伯雅斯基、莫理循、雪莱等路过兰州，对于水车倍感兴趣，拍摄了很多照片，刊载于报刊中，印制为明信片，传播海内外，使之认识了建造水车，灌溉园圃的习俗，并给后人留下了当时水车的形象资料。

1935年，甘肃省平市官钱局发行一组以兰州风物为图案的钞票，其中面值五角的钞票图案是水车园的三辆水车。

抗战胜利后，避居大后方兰州的东南人士纷纷挈妇将雏东下返乡，兰州照相馆老板及时推出一组兰州风物照片，裱在硬纸板上，便于陈设或玩赏，东返者购买数封，用以自赏或馈赠亲友。

1994年兰州市旅游局在七里河区建成两辆水车并列的小型水车园兰州水车博览园，是修复兰州水车历史记忆的先行过程。2005年，兰州市政府在原水车园遗址建成水车博览园，12辆水车两辆一组一字排开，掩映在绿树红花中，矗立在黄河岸边，不停旋转，倒挽河水，令人震撼。而其中的两辆水车为露天水幕演出广场的背景，在水车旋转中，举办中国水车节以及中外文艺演出，具有别样的感受。何鄂女

士创作的段续石雕，背景是一辆南方竹制简车，捕捉段续手持图纸，指挥若定 神态，形象地展示了段续创制兰州水车的历史片段。

2005年9月22日，中国国家邮政局与荷兰TNT邮政公司联合发行《水车与风车》特种邮票，共1套2枚，面值共1.60元。图案分别选取中国兰州的水车和荷兰的风车。水车，见证了华夏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黄河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象征。风车在荷兰的历史也有700多年。它利用风力带动机械动力代替人类磨面、排水、锯木等生产劳动，凝聚着古代荷兰人的智慧。水车与风车，虽然来自东西方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都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六、水车的民俗文化功能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物

在生产能力低下的旱作农耕形态中，引进简车提灌技术，加以改良，创制水车，将岸高水低的黄河兰州段一带变为水田，在这一过程中秉持“天人合一”的观念，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一是体现在材料上。水车部件除轮轴为铁制品以外，皆为木料。两条水车巷道石坝，皆系木桩为框，内砌大鹅卵石，石缝中着生野草，加之杨柳树桩生根发芽，增强了石坝的坚固。莺架选用带杈杨柳树，不拘曲直，支撑水槽，显得古朴自然。反观如今仿建的水车，水泥砌就破山石，莺架用方木支撑，并刷油漆，尽失古朴生态之趣。

二是体现在选址和水车的组合上。在尊重河道自然形成的走向的前提下，根据河道弯曲、水流缓急等不同的水文情况，因地制宜设置水车，组合辆数、车轮大小，因势而定，或三辆一组，五辆一组，或一辆独居，充分利用空间，发挥最佳提灌效益。这一方面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可能挖河改道，以多建水车，另一方面则是先民敬畏黄河，认为它有神性，只能顺之，不能逆之。而今所建水车博览园，所建12辆水车皆为两辆一组，大小一致，一字排开，单调呆板，并且将水提到高处，顺低下的渡槽排放到黄河之中。何以不利用水车顺势灌溉其上的绿色公园呢？

(二)敬畏大自然的心态

昔日兰州农民视水车为生命线，认为是上天所赐，尊称为“天车”。每年隆重举行开车仪式，顶礼膜拜龙王爷，祈祷水势平稳，水车转动正常，以保丰收。这是一种农民的自治制度，通过公推的车头掌控着分配水资源的权力，他们通过祭祀龙神的仪式，将之转化为神权权威，等于车头接受了神灵的授权，代表神灵行事，车头秉持公平理念，带领农民按时按节，顺序灌田，从而避免了纷争，凝聚了人心。

兰州民间赋予水车某种神性，称为“神车”，它的某些部件被渲染为为“三十六天罡”。其中的老虎车最有神性，每当夏日老虎车发出难听的噪音，尤其是夜深人静之际，呜呜咽咽，如哭似泣，老人就会忧心地说：“老虎车吼了，龙王爷要收人唠！”所谓“老虎车吼了”，是指车轴膏的润滑油（猪板油所制）消耗尽了，摩擦力加大而发出的噪音。这时正值黄河汛期，水势汹涌，漩涡湍急，天气炎热，常发生小孩或成人因“洗澡儿（游泳）”导致溺水而亡的悲剧。其实老虎车“吼”不“吼”与溺人无关系，应与游泳者不识黄河水性、游泳功力不到、体力不支有关系。

(三)共有性的体现

明清以来，兰州农民为了经营水车，顺利开展农业生产，苦心规定了一些相互关系。黄河具有共有性，任何人皆可利用其水资源，然而除去居族大户，花费巨资，能独立建造水车利用黄河水灌田外，大多数农民皆需按户集资，共建水车，这辆水车便具有共有性了。共有性还表现在农民共同维修水车，疏浚巷道、水渠，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祭祀龙王爷的费用也由农民共同分担。共有性保障了公平性，灌田先后、时间长短，皆按贡献大小而定，没有人也不敢破坏共有性，多灌田，少出钱少出力。

综上而述，兰州水车是兰州人的精神象征，兰州人虔诚顺乎自然，巧妙利用自然，发展生态灌溉农业

与园艺业，造福地方，永续利用，为黄河渡口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在管理水车灌田、修缮等方面，形成一整套制度，产生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民俗。20世纪50年代，随着黄河电灌工程的发展，绝大多数水车已失去灌溉功能，被拆除，只有西固区新城园艺村尚存一辆水车灌溉菜地果园。改革开放以来，为保护传承这一民俗事项，先后建设了七里河区水车园、城关区水车博览园，成为颇具兰州特色的旅游景观，吸引海内外游客游览、瞻仰。同时，一些民间艺人制作大小不等的水车模型，或为各大酒店、大商厦布景，或作旅游产品，游客购置后，或自用或馈赠亲友，将之摆设案头清供。之所以水车仿制品大受青睐，一则是它的灵动、润泽，能够带来愉悦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水象征着财，水激轮转，象征着财源滚滚而来。2006年将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水车技艺必将传承下去。

注释

①《水车传入兰州之谜》，《兰州晚报》2007年5月13日第12版。

②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三《经政》下第十一页。

③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三《经政》下第十一页。

④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二十二《人物》页三十三。

⑤姜洪源《名人信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兰州市志·水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⑦秦维岳《皋兰县续志》卷三《水利》。

⑧《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一《舆地》下《水利》页四至页五。

⑨《兰州市志·水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⑩刘尔炘《果斋前集》乐善书局民国三年版。

⑪邓明《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874页-875页。

⑫江得符《三馀斋诗草》汲古书屋乾隆丙午版。

⑬雷梦水《中华竹枝词》(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⑭邓明《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001页。

（作者：甘肃省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平凉市地方志办公室荣获“全国方志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7年9月1日，甘肃省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第二次方志馆工作会议上荣获“全国方志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平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毛存显、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应虎荣获“全国方志馆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陈乐一供稿）

《肃镇华夷志》文献价值初探

高启安

内容摘要:《肃镇华夷志》作为元明以来现存河西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书,提供了数种已佚方志的信息,其关于肃州、镇夷地方的城池、烽堠、边墙(长城)、墩台、堡寨、关隘等军事设施记载无不详备。而关于人口、税赋、马政、水利、贸易、物产、教育等材料尤其珍贵。关于东迁各部的种族、部落变迁、人口、语言、风俗习惯等材料,真实反映了裕固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裕固族的专志。志书保存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是元明最重要的关于西域道里、山川、城池、民族、宗教信仰、物产及生活状况等的重要资料之一,堪与《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著作相媲美。

关 键 词:肃镇华夷志　文献价值　初探

笔者曾就《肃镇华夷志》的名称以及版本情况撰文考辨[①]。指出现存《肃镇志》应即《肃镇华夷志》,现名应是清顺治十四年高弥高重刊时所改;台湾影印本《肃镇志》实即《甘镇志》。本文就《肃镇华夷志》的文献价值作初步探讨。

一

作为现存最早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方志,《肃镇华夷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肃镇华夷志》不止一处引用《肃州卫志》(卷一《沿革》"肃州卫"条)、《元志》和《总志》,史料均未予记载。《元志》或为元代所修《肃州志》;《肃州卫志》诸材料没有记载,或者即嘉靖所修的《肃州新志》;《总志》或者为嘉靖《陕西通志》,或者为明人郭绅所纂《甘肃志》[②],或者即《陕西行都司志》。提供了数种已佚地方志的信息。

由于肃州在明西部边疆的特殊地位和修志者的独特用意,《肃镇华夷志》尤其注重辖区的军事防守记载,诸凡城池、烽堠、边墙(长城)、墩台、堡寨、关隘等军事设施记载无不详备,而关于戎器、兵饷等也极尽详细,其中有不多见的关于守军装备中的用于治疗刀枪创伤的药材名称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西部边疆兵防材料。

为了防备来自于南、西、北游牧民族、特别是来自于北部套部蒙古(所谓"北虏"、"套虏"、"海虏")和西部土鲁番以及瓦剌等的侵扰,明代在北部边疆先后修筑了大规模的防守工事,这就是后世著名的"长城"。《肃镇华夷志》不仅记载了辖区数次所修长城的地点,而且其长度、高度、走向以及长城的其他设施(烽堠、墩台)、防守路线、防守兵丁的配置等,一一清楚明了。而于西部雄关嘉峪关长城的修筑起因、筹划等记载尤其详细。因此,《肃镇华夷志》又是研究明代长城兵防的第一手可靠资料。

我们知道,五代至元,敦煌、肃州一线,由于战乱频仍,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有明一代,处于恢复性阶段。《肃镇华夷志》详细记载了元、明洪武、嘉靖、万历等各个时期肃州卫、镇夷所的人口数量,记录了肃州及其周边农业水利恢复、发展的状况。《水利》一节,反映了从祁连山南麓引水和开垦农田,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向肃州周边开垦的历史。无疑是肃州农业开发和水利建设的最早资料。"有人开了西洞子,狗也不吃麸剌子"就是最形象的记录。而一些地区的开垦,又与安置的东迁各部有关。可以这样说,环肃州周边农业开发,裕固族做出

了很大贡献。

而有关稻米的最早种植(卷四“人材”:“邹和任指挥,教民树艺,稻田自和始。”)、玉米的种植,都是宝贵的农业开发资料。如在“物产”一节中,收有“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天麦’。”这是较早关于玉米在西部地区种植的记载。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城镇,肃州历来是商贾云集、交易频繁的贸易中转地,即使在明代陆路丝绸之路贸易衰落后,肃州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频繁的贸易活动。明代弃置敦煌、退守嘉峪关以后,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即担负起了中西贸易及使节中转的重任。《肃镇华夷志》透露,在肃州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马匹、丝绸、茶叶、毛皮、药材、玉石等的交易。肃州居住的三种“夷人”中的“回回”,就是滞留或专门从事贸易的西域商人。出钱修桥铺路和修盖寺院的商人大多是“晋商”。这些材料无疑是研究衰落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宝贵材料,也是研究晋商崛起与丝路贸易、与明政府实行的“盐引”政策等关系的重要材料。前来贸易滞留在肃州的西域商人及东迁的哈密卫及其他卫部众,如哈剌灰人、畏兀儿人等,其数量的不断增加(环肃州地区居住的东迁部众,一度达到接近汉人数量的程度),促使地方政府在肃州城建立专门的“夷厂”安置。这也就是顺治年间米剌卬、丁国栋振臂一呼,而肃州有那么多回民揭竿而起的原因。

在卷二“学校”中,记载了肃州卫和镇夷所明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于校址的建设尤为详备。而当时的地方官员倡导、督促,采取优惠措施令东迁各少数民族部众子弟入学接受教育的资料显得尤其珍贵:“又令夷童亦诵儒书,而夷俗少变。”(卷二)它多少改变了大汉族主义者一直推行的愚民和奴役少数民族政策,在裕固族发展史、民族教育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资料的缺乏,明代敦煌历史几乎是空白,而《肃镇华夷志》中记录了不少敦煌的资料。比如关于东迁各卫的记载,有不少涉及到了当时沙州的民族、人口变迁,居民生产方式以及与周边的关系等,可以说大大丰富了明代敦煌研究的资料和内容。

“哈剌灰”是出现在明代史料中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名称,是当时哈密城中三种居民之一,后来许多东迁至肃州。关于“哈剌灰”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9]。《肃镇华夷志》记载了居住在肃州城的“哈剌灰”人的来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从佛教转为伊斯兰教的过程。据笔者所知,有关“哈剌灰”人原驻地及东迁,史料记载较多,但关于他们的族属、语言、风俗习惯等却记载不多,因此,这是为数不多的直接讨论“哈剌灰”人的种族、语言、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史料之一,可为“哈剌灰”人的研究提供数条翔实、可靠的资料。

在“山川”、“物产”条中,还有诸如肃州产诸多宝石的记载:

“狼心山:城东北七百里,亦套虏经过之地,探贼者常至此取红玛瑙石为记。

火石山:城东北六十里,石可打火。

寒水石:出肃州南山,取烧熟,细面可以绘塑。

玉石:出红水坝河内,乃石之似玉者,有菜色,有白色,俱可磨器。

代赭石:出肃州南山,高台者细红。

嘉峪石:出嘉峪关西,可作砚。先年,兵备副使长垣侯秩题其砚云:兹石三德,体制润泽,既不废笔,又不废墨。”

其中“嘉峪石”为甘肃省又一著名笔砚石料,因发现于彭泽墓而知名。近年有关厂商多方找寻,以备开发。

这些宝石等的记载,为商业开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文化背景。

由于《肃镇华夷志》是河西走廊较早的方志之一,受到了清代西北学研究者的注意。清人梁份《秦边纪略》的诸多材料,虽未言明出处,但显然来自于《肃镇华夷志》。而黄文炜等撰修《重修肃州新志》虽言“先翻检肃镇旧志,见其版刻漶漫,笔画舛讹,至不

可句”(“序”),但实际受影响不小。《新志》多处原样保留了《肃镇华夷志》的内容就是证明。

二

裕固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是甘肃独有的少数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裕固族研究无论在史料的钩稽、整理,还是在各领域的探索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应当承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一样,裕固族研究,同样有一个历史资料缺乏的问题。为数不多的资料,也是散乱芜杂,语焉不详,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就裕固族历史来说,明末清初裕固族形成的重要阶段,资料不可谓不多,有《明史》殊域周咨录》《边政考》《秦边纪略》《甘州府志》等正史、野史以及方志,但恰恰缺乏裕固族东迁和七部形成过程的记载,更缺乏裕固族服饰、饮食、生产方式、语言、风俗等的详细史料,而这些,又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和裕固族形成、发展、变化的重要证据。

在众多记载明清之际裕固族史料的著作中,《肃镇华夷志》详细记录了从明中叶以后东迁的关西数卫部众的部族、首领、人口、牧居地及其变化、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等详细情况,无论在资料的丰富、详细、系统上,都堪称之最,是裕固族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因此,其意义又超出了一般方志,在裕固族研究上堪称珍贵,也使《肃镇华夷志》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我认为和其他方志相比较,这是《肃镇华夷志》最大的价值所在。

首先,原书名之为《肃镇华夷志》,作者依据现状,辟出相当篇幅,记载了东迁环居肃州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予以非常的重视,这种独特的见识,超出了一般方志。尽管其动机目的主要是出于“安边”、“固疆”考虑,在叙述中,显露历史局限,暴露了视少数民族为“犬羊”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

《肃镇华夷志》中关于东迁各部族的资料,有三处:其一,在《沿革》一节中,有“附内地住牧番夷”条,记录了畏兀儿、哈剌灰以及瓜州、赤斤、苦峪、王子庄、柴城儿、骟马城、大草滩等地东迁之各部族的居住地、头目、帐房及人口数,而且对嘉靖二十八年杨博重新安置的情况也作了记载。

其二,在全志最后,专列了《属夷内附略》,内分“种属”、“族类”、“住处”和“风俗”等目,以大量篇幅记叙了各卫诸部东迁以及牧居地的变化情况及各部的分化、组合和最后的安置地、头目、人口。由于志书是在嘉靖张愚创修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反映在对东迁各卫部落的记载上,出现了“嘉靖”和“万历”两个时间,恰好反映了各部落的迁徙和帐房、人口、头目、牧居地的发展变化情况。其中记录了一些东迁以及部族来源的传说,是我们探讨裕固族族源的宝贵材料,如关于“扬州乐户”的材料、“耳交王”的记载等。和其他方志记载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含混不清、后世读者往往不得要领不同,《肃镇华夷志》很详细地记叙了包括畏兀儿、哈剌灰、“熟达”以及“西番”等族从服饰、饮食、婚丧、语言、宗教信仰、生产方式以及行礼、拜头领等习俗,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更是弥足珍贵。如今天裕固族最隆重的待客方式是“抬羊背子”即在其中有记载。还记载当时裕固族人喜欢酿造一种“卤酒”,饮酒方式为按尊卑用吸管吮吸。这些可以说是对裕固族文化最早最详细的记载,亦可谓明末裕固族的专志。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汉族中心”立场的偏见,其中有一些对少数民族错误的称谓和认识。

其三,是散见于“城池”、“兵饷”、“堡寨”、“关隘”、“军制”中的一些材料,如东迁各部族出军丁、编入防守军制参与防边的材料,居住地的材料,构筑城池的资料、裕固族子弟入学的资料等。虽不多,但同样重要。

裕固族七部如何形成,这是今天研究裕固族历史难以解开的一团乱麻,它不仅与东迁前的各卫部众、种族有密切关系,也与东迁后各部众不断分化、组合有关系。而《肃镇华夷志》对各部族人口、牧居地、头目变化的记载,提供了解开这团乱麻的正确途径。

一般认为，裕固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但《肃镇华夷志》透露，在东迁前，居住在沙州、赤斤的部分裕固族人，已经定居务农，修筑城池。东迁后，其中一部分仍然从事农业。他们对于因战争而萧条的环肃州周边的开垦和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今天居住在酒泉黄泥堡的裕固族为何一直从事农业的缘故。一些史料过分强调东迁部众的安置对肃州防务带来的压力，而忽略了裕固族对本地发展的贡献。而这些，都是我们用新的眼光看裕固族的依据。

裕固族“大头目”“安”姓来源，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裕固族形成阶段材料的缺乏，学者见仁见智，互不上下。而《肃镇华夷志》的丰富材料相信可以提供打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学界对裕固族形成的时间有数种看法。仔细研究《肃镇华夷志》中相关资料，相信能得出一致的意见。

《甘镇志》虽然在《沿革》下也列有“内属番夷附”条，分别叙述了罕东卫、曲先卫、安定卫（有目无内容）、“阿端卫”“西番十三族”“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哈密卫”及摘录杨一清、唐龙的奏疏和魏焕《甘肃考》，大抵没有超出《明史·西域传》中关于数卫的记载，远没有《肃镇华夷志》具体、详细、丰富。《重修肃州新志》中的“属夷”一节同样只记载了属地各少数民族的居住地、户口和纳粮、贡马状况，而没有风俗习惯、部落变化状况等重要内容，因此，就裕固族历史资料而言，两者价值高下，自不能相提并论。

遗憾的是由于《肃镇华夷志》流传不广，这些宝贵资料学界利用有限。

三

在“西域疆里”中，《肃镇华夷志》还记录了从哈密到“鲁迷城”、“西海”的道里及沿途城池、山川、种族、物产、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有四千多字。经考证，这正是有着极高历史价值的《西域土地人物略》。

《西域土地人物略》撰写年代、作者已不可考，没有单行本传世，今存于嘉靖《陕西通志》（以下简称《通志》）[4]、张雨《边政考》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秦边纪略》中，然而后两者脱衍错讹较多，只有《通志》所载完备[5]，而与《边政考》所载内容、叙述顺序有部分不同。虽说简略，但其价值却不可低估，是明代丝绸之路路线的完整资料。在中西交通、民族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堪与《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著作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以上著作。

《肃镇华夷志》收录之《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有4500多字。和《陕西通志》不同的是，全文均用双行小字。文中出现地名近300个，记录了从嘉峪关到鲁迷城的道里、城池、民族、人种、宗教信仰、风俗、物产、生产生活状况等。

清人梁份所著《秦边纪略》（即《西垂今略》，以下简称《秦》）卷六单列《西域土地人物略》[6]，其体例与嘉靖《陕西通志》本相同，亦为大小字双行，疑抄自是书。

嘉靖二十六年张雨所撰《边政考》卷八（以下简称《边》）“西域诸国”所收《西域土地人物略》[7]，用表格的形式记载了西域的地名、里程、物产、山川名称。其中物产栏目内记载了各地住民种族及物产。

《肃镇华夷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与《秦边纪略》《陕西通志》（以下简称《通志》）所载对比，其开头叙述并不一致，且没有名之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而是列在卷一“沿革”下之“西域疆里”，叙述了自嘉峪关至哈密的三条道路，大体与郭绅《哈密分壤》所记嘉峪关至哈密三条道路相似[8]。从“哈密”迤西的叙述中，三者的文字才吻合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三者的叙述顺序与《边》有较大的出入。主要差别有两点：其一，《边》所记一些地名下的种族、物产，在三者中没有。如在“物产”与地名的对应中，《边政考》在“哈密”“阿思打纳城”“鲁珍城儿”“羊黑城儿”“土鲁番”“俺石城儿”“苏巴失”“昆迷失”“义力失城”“黑水泉”“独树城儿”“察力察井”“察兀的河”“榻子河”“古克兀城”“若先城”“阿速城”“阿

亦地里城”“克力宾城”“河西丁城”“失哈力城”“我撒剌”等地名下，三者均没有“种族”及“出产”的内容。这就使其价值大打折扣。

那么，这些缺失的内容是《边政考》成书时加上去的呢？还是其他版本漏载呢？这是判定《通志》《肃镇华夷志》等原本来源的重要线索。

其二，《秦》本、《通志》本和《肃镇华夷志》本所载许多地区的“种族”“物产”和《边政考》不相一致。如：

《肃镇华夷志》：“又西为哈利迷城，有缠头回回，多养羊、马，种旱田，有水磨，出黄葡萄及各色果品。

又西为阿的纳城，属鲁迷城管，有回回，种糜子，出棉花。

又西为菲即城，其城一重，有（《秦》本有“小”）王子，俱汉儿人剪综披发戴帽（《秦》《通志》本有“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羧毡，出金子、黑石、珍珠。”

《边》：“哈利密城：有水磨，城西八百里为阿的纳城。有缠头回回，多养羊、马，种旱田，出黄葡萄、各色果品。

阿的纳城：属鲁迷城管，又西四十日为菲即城。有回回种糜子，出棉花。

菲即城：又西一千二百里为安各鲁城。其城一重，有王子，俱汉儿人剪综披发戴帽儿，种稻田，养蚕，织金蟒龙、撒黑剌，剪羧单，有金子、宝石、珍珠。”

这样张冠李戴的地方有几十处。经分析，可能是《边》在列表时造成了叙述顺序的混乱。

《边》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而这时，关西诸卫遗众已悉数内迁至肃州周边。如《边》中所列之“大草滩”“回回墓”“骟马城”“三颗树”“赤斤城”“苦峪城”“阿丹城”“瓜州城”“西阿丹城”“沙州城”等地的诸卫遗众，早在正德七年前已经内迁肃州。是书卷九“西羌族口”中就有详细记载。《肃镇华夷志》则记载得更详细。比如，瓜州城头目总牙部东迁后居住在威虏、察黑包二城；赤斤头目革力箇失部、柴城儿头目卜木尔吉东迁后居住威虏西空堡；苦峪族居住在白烟墩南空堡；沙州族东迁后居住在金塔寺城。而“总牙父名曰总不克，因避西夷侵掠，正德间投顺肃州地方。”苦峪城居住的“卜剌有”在《肃镇华夷志》中作“卜剌召”：“苦峪卫不知何代建立为卫都督卜剌召乃肹卜儿加之父，与也先革同宗，今朵尔只之祖也指挥管卜儿加、舍人绰儿吉搔宗以上四族闻皆指挥苟骨班之男，今无遗种矣。”“其部族如千户哈剌那孩族即今巴郎之祖也则住大草滩；指挥他失卜族今锁聂族是也则住回回墓；指挥总失加族原系西宁属番，投苦术部下，今[牙]兰族是也。则住三棵树”；“失加卜丁今剌尔即之祖等则守赤斤城，都督赏不塔儿乃昆臧之子，锁纳束之父也指挥仓阿他儿、子锁南奔、舍人帖木儿皆苦术部下子孙，今在南山。皆分据赤斤四面者也。”

“三颗树”的“也先克”即《肃镇华夷志》中的“也先哥”：“革力哥失族亦系赤斤蒙古卫都督苦术枝派（派），正德间父也先革预知有西夷犯边之机，先投来肃州近地”。

而最近的东迁也是在嘉靖初年。“卜木尔加族亦苦术之后，分居柴城，与革力哥失、肹卜尔加同宗。嘉靖初年卜木尔加父曰帖木儿，来归肃州，部落百人”。

因此，《边》之《西域土地人物略》所载之哈密迤东各地之少数民族部众居住状况，应在嘉靖以前。就是说，《边》所收录之《西域土地人物略》应在嘉靖初年以前。如果《边》中哈密迤东各地之少数民族部众的记载为张雨所加，则《西域土地人物略》应早于正德年间。甚至早于包节著《陕西行都司志》的嘉靖年间[9]。

诸家以出现“苦峪卫，我皇明”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著之上限[10]。按“苦峪卫”之设，不见正史。《肃镇华夷志》亦谓“传闻有此卫，不知何代所建。”（卷四“属夷内附略”）诸家认为与哈密卫被土鲁番残破、部众东迁，明政府诏敕暂居苦峪为苦峪卫之设时间。按《明史》，成化十三年“冬十月戊申，复立哈密卫于苦峪谷，给土田牛种。”[11]。《殊域周咨录》亦谓苦峪城

筑于成化十三年，“十三年，都督佥事王玺等于赤斤、苦峪筑城，复立哈密卫，令罕慎居之。”[12]实际上所谓“苦峪卫”，实即逃亡的哈密卫。从《肃镇华夷志》和《边》记载来看，嘉峪关至哈密一段，各家记载内容多寡不同。其中“苦峪卫，我皇明”句，《边》和《肃镇华夷志》本均无有，作为《西域土地人物略》产生之上限，似仍有可讨论之处。且《肃镇华夷志》在叙述了嘉峪关外三道通向哈密的道路后说：“按弘治前，里至与今少异，且多番族。今悉载之。”隐约透露出原本《西域土地人物略》至迟产生在弘治以前，其叙述内容有可能从哈密开始。

是书记载了嘉峪关到鲁迷一路几百个地方的种族、宗教信仰、出产、生产方式等。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其中许多地方居住有“汉儿人”。如“怯迷城”有“四族番汉”；“文谷鲁城”“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汉田”；“也勒多思城”“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稻田”；“撒黑四塞”“有汉儿人蓬头戴帽儿”；“菲郎城”“俱汉儿人剪综披发戴帽儿，种稻田”；“鲁迷城”“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等，耐人寻味。这些遥远的地区，何以有汉人？显然，这不是空穴来风。《肃镇华夷志》“故迹”下就记载：“威远城在卫东北三百八十里，城筑于唐宋，元因之，明初立为所。后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惧，俱入西域。今有旗杆山，即当时招抚叛民，立旗七杆，军民竟入回夷远地，今尚有三杆峙立焉。又西夷云，威远汉人今在鲁迷地方，穿衣戴帽与夷不同，衣制同中国，穿则襟治于背后，网巾同汉人，戴则悬圈于额前，养食猪犬，与回夷处，多不同俗。”正证明了在远外的汉人“蓬头戴帽”的实际。李之勤先生从其中“汉儿人”口气推断作者可能为少数民族[13]。而“汉儿人”的口气和一些地方设有“通事”透露，这部宝贵的著作或者产生在元末明初。我们知道，元代著作中，“汉儿人”的口气较多；而“通事”之设，则只有元代这样统治区域广袤、驿传交通发达的情况下才会有。当然，这只是猜测。关于这些地名以及汉人为何到了遥远的地方，其时间是元代，还是明代，还需要详加研究。

“西至”“哈至”是裕固族东迁历史研究中被学者强烈关注的两个地名。部分学者也曾将探询的眼光投向古代史料，以期找寻出相对应的地名。如钱伯泉先生曾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辑录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发现了河西到哈密、土鲁番的道路、地名和里程的记载。由于此文缺失较多，钱伯泉先生认为“在记苦峪城西通哈密的三条路中，失去了有关‘西至－哈至’的地名。”[14]而郭绅的《哈密分壤》记载了一个叫“哈至”的地名。《肃镇华夷志》详细记载了弘治前后从嘉峪关经由苦峪到哈密的三条道路的里程、名称、泉水、城池等，其中有“哈至”地名的记载：“又一路自苦峪从北而西至羽寂灭，正北一百二十里至蟒来，西一百四十里至垣力，西一百五十里至哈剌哈剌灰，西一百二十里至哈至，西一百三十里至坡儿那，西一百四十里至羽六温，西一百二十里俄伦咲，西九十里至俄例海牙，西一百四十里至阿赤，西一百七十里至克力把赤，西一百三十里至撒力哈密失，西五十里至哈剌木提，西四十里至哈密头墩，亦抵哈密。”但没有“西至”及相关读音的地名。与《秦边纪略》（卷六，但没有与《西域土地人物略》列在一起）、《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收《西域土地人物略》相同，《肃镇华夷志》也记载嘉峪关至哈密的三条路，足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靠证据。

经对比，《肃镇华夷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与《通志》《秦》略同，个别文字有出入。应当来自于相同的母体，这个母体，很可能就是已佚的《陕西行都司志》或更早的著作。

关于《西域土地人物略》的价值与意义，诸前辈学者已有精辟论述[15]。无论其叙述范围、内容及可靠程度等，都不下于当时流行的其他类似著作。其中尤以种族和出产为重要。这也是它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所在。

《肃镇华夷志》无论体例、内容，还是文字，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错讹。如《肃州新志》黄文炜“序”，谓此志误谬颇多。酒泉太守竺曾，讹为竺会；张奂渊泉人，讹为酒泉人[16]，攀附名人等。而《宦籍》《人材》

抄录正史资料错讹尤多。如张奂学“欧阳《尚书》”，讹为“欧阳修《尚书》”；《宦籍》“郑吉”条“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而原文省略为“郑吉”被封为“归德侯”。卷四《人材》在叙述隋“赵才”后，又从汉代“盖勋”开始，加进了许多敦煌的名人。抄袭某敦煌志的痕迹明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些叙述也有前后矛盾和不明确之处，如“西蕃”的概念不明确。再如“哈剌灰”，或言“元之达种”，或言“突厥种族”。而错讹字更不在少数。但瑕不掩玉，相信读者自能辨别。

近代由于《肃镇华夷志》只有善本存世，部分图书馆存有缩微胶卷，许多古籍丛书都没有收录，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⑯，“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续编》⑱，《续修四库全书》⑲等。而台湾影印乙本的发行，使许多人误认为彼《肃镇志》即此《肃镇志》，使这一宝贵资料少有人关注，而真正的《肃镇华夷志》却藏于深闺无人识，学者利用不多。

《肃镇华夷志》的独特史料和研究价值难以尽述。以上只是笔者孔见，难免疏漏。

注释：

①高启安《<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及版本考辨》。待刊。

②据《甘镇志·官师志·甘肃行太仆寺卿》：“郭绅，江西宜春人，弘治中任。廉勤有干，且瞻文词，尝纂《甘肃志》。故实有征。”见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

③马寿千《明代哈密地方的哈剌灰人》，《新疆社会科学》，1983(2)。曾文芳《明代哈剌灰人的来源、组成和名称诸问题》，《西域研究》2002,(3)。曾文芳《明代哈剌灰人族源探讨》，《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2(1)。吐娜《明朝哈密卫哈剌灰人及其内迁》，《甘肃民族研究》2003(3)等。

④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编)·嘉靖陕西通志》，北京：中华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⑤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⑥[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⑦[清]张雨《边政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78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⑧冯家升等《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⑨《肃镇华夷志》、《甘镇志》等受《陕西行都司志》影响较大。《陕西行都司志》修撰于嘉靖年间，今不存，见高启安《<肃镇华夷志>名称及版本考辨》待刊。

⑩转引自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⑪[清]张廷玉等《明史·本纪·第十四·宪宗二》。

⑫[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4“赤斤蒙古”，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⑬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⑭钱伯泉《裕固族故地“西至－哈至”考察》，《甘肃民族研究》1992(2)。

⑮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⑯[清]黄文玮、沈青崖纂修《重修肃州新志》“序”。乾隆二年刻本。甘肃省图书馆存。

⑰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北京：中华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⑱王希隆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续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⑲《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作者：兰州财经大学教授）

秦国“西都”考述

袁智慧

内容摘要：陇右“西垂”，又名“西”，是秦人故地、秦国故都和秦先祖宗庙及陵园之地；该地于上世纪末发现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证实了史书的记载。

关 键 词：秦国 西都 考述

陇右地区的西犬丘、西垂，是秦人先祖的居住地，秦国的早期都城及秦公王室的宗庙、陵墓都在这里。因此，研究秦国历史，必须研究陇右西垂，从它的源头做起。

秦民族在创立和经营秦国的过程中，由西向东，多次迁都，其中，西都、雍都和咸阳，最为重要，可谓秦国三大都。因为，秦国其它几处都城仅仅是临时性都邑，驻扎时间短暂，相应的城郭建设也少。而西都、雍都和咸阳，就不同了。这三处都城，经营基础雄厚，有宏伟的城郭建设，而且，先祖宗庙和重要的王公陵墓也在这里。所以，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先王宗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①]这里的“西雍”，即西都和雍都。司马迁把“西都”与雍都、咸阳并列，可见“西都”位置之重要。《史记·封禅书》载：“西亦有数十祠”。司马贞《索隐》：“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司马贞已明确指出，西县之地为“秦之旧都”。此西县旧都，可以称之为“西都”。

西都，是秦国三大都当中时间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都城。“西都”所在地西犬丘、西垂，既是秦国的故都，又是秦民族发祥地和秦国先祖的宗庙、陵区。因此，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首先西巡陇上，其目的主要是祭祖。这些史实，史籍已有明确记述。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②]然而，后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了。于是，出现了史学界对秦国历史中的许多问题不能正确解释，甚至抛开史书记载而曲解的情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才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填补了多年来秦史研究的一些空白，史学界也开始重新按照史书记载的事实研究秦史。现在就可以大胆地说，陇右地区的西和、礼县及天水市西南，古代地名为“西垂”，是秦民族的发祥地和秦国创立的地方。

西垂这片地方本名为“西”。秦庄公《不其簋》铭文中就有“西”的地名。[③]秦朝在此设立“西县”，也取义于“西”。直至秦二世时，大臣们给二世奏报时仍说：“先王宗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④]这里的“西雍”即“西”和“雍”两个地方。到汉代，司马迁、班固等称西县之地为“西垂”或“西犬丘、犬丘”，不称“西”。由此可以推断，“西”“西县”是秦人自己的地理名称，“犬丘”“西犬丘”、“西垂”是其他族人对“西”地的称谓。秦人从庄公到二世时，一直称自己的西垂祖地为“西”和“西县”。别族称“西”地为“西垂”，不光是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早在西周孝王时就这样。非子养马有功，孝王要封赏，当时与犬丘大骆部族为邻的

申国国王“申侯”与孝王的谈话中就有“保西垂，西垂以故和睦”之句。依据上述史实，可以将秦国早期都城“西垂”之地，按照秦人自己的名称，应该称作“西”或“西都”。

“西都”之地，作为秦人故里和秦国故都，秦人在此活动的历史，从记述可靠的殷商时期“中潏”“保西垂”算起，到秦始皇帝统一天下，至少在九百年以上，基本上包括殷商后期和整个周朝（西周到东周）。按照朱中熹先生的观点，秦人先祖为阳鸟部族，早在尧帝时，和仲之族就来到陇右，进行测日活动。这是最早来到陇右的秦人先祖，比殷商时期中潏“保西垂”更早。西周前期（包括殷商后期），秦人先祖虽然没有以“秦国”命名，但已经有嬴姓部落之国存在。西周中期非子始封为“秦”，到秦文公迁都之前，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秦国”国都。文公之后，这里虽然不是都城，但仍是故都、陵园及宗庙之地。刘瑞先生《秦信宫考》一文中说：秦西都“一直到秦始皇时他的地位依然重要，原因与其地有先王宗庙和寝陵有关。”[5]按照《史记·始皇本纪》所载，直到二世纪时西都（西垂）故地仍有先祖宗庙，地位依然重要。

关于“西都”的地理位置。祝中熹先生说：“西垂又名犬丘，即尧、舜时代肩负‘寅饯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西迁后所宅之‘西’。它的位置，汉晋至唐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6]《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说：“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正义》引《括地志》说：“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7]按《水经注》记载，“西县故城”在今礼县红河乡境内。《晋书·地道记》又记载：“天水始昌县，故西城也。”《水经注》中还载了“始昌峡”和“始昌城”，位置不在今红河乡，在今长道镇和盐官镇之间。[8]祝中熹先生经过大量考证认为，“西县城当在西和峡口与祁山之间，决不会在如《水经注》所说西北偏至阳康川，即今礼县红河附近。”他认为今礼县永兴乡古称“店子上”，是古代“天嘉县”位置，也就是秦汉时代的西县城所在地。[9]赵逵夫教授《略论“空城计”的有无与西城地望》一文认为秦汉至三国的“西县城”治地在今长道镇。[10]张希仁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今礼县永兴乡和西和县长道镇街道连为一体，虽属两县两镇，实为一地。

下面就秦国“西都”的历史地位及有关事实再作进一步考述。

一、“西都”之地是秦族故地

从史料记载可知，秦人本姓嬴，以“玄鸟”为图腾。玄鸟，即燕子。嬴，即由燕子的叫声“乙乙”演变而来。秦人之祖，多爱驯养鸟兽、崇拜鸟类，玄鸟、凤凰和鸡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因此，历史上称秦人之祖为“鸟夷”和“鸟民族”。秦人先祖当中“大廉”，被称为“鸟俗氏”；“蜚廉”的“蜚”，意即“飞”；“孟戏”和“中衍”，又是“鸟声人言”。

关于“秦民族”的起源地，史学界有的说在西方，有的说在东方。杨东晨先生《秦人秘史》中说，秦人远祖为“少昊”，与太昊伏羲族有共同的图腾。伏羲，又写作伏戏、庖羲、羲皇等等，太昊，也写作泰昊、太皞等。[11]《世本》云：“太昊伏羲氏。”《帝王世纪》说：“庖牺氏风姓也。”伏羲族源于陇右天水、陇南一带。祝中熹先生《早期秦史》中也认为秦人为少昊族鸟图腾；又为颛顼之后，崇拜太阳，即阳鸟部族。《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之祖“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是“颛顼”帝之苗裔。颛顼，即高阳氏，是黄帝之孙。《帝王世纪》说：“少昊名挚，字青阳，是为玄嚣。”《史记·五帝本纪》说：玄嚣是黄帝之子。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路史》罗泌注说：“寿丘在上邽（今天水）。”黄帝部落故地与秦人故地都在今陕甘交界的宝鸡、天水一带。再按照杨东晨先生的观点，秦人之祖少昊族源于太昊伏羲族，那么伏羲族故地也就是秦族故地，也都在今甘肃东部的天水陇南一带，即西汉水上游地区，这与上文所说黄帝族故地的说法一致。

伏羲族生活在七千年前，是炎帝、黄帝之前的中国古部族。伏羲被称为“人文始祖”。伏羲族最早居住在“古城纪”。《开山图》记载：“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今西和县仇池山，是伏羲出生的地方。《帝王世纪》和《补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母名叫华胥，在雷泽履大人迹而孕，后生下伏羲。《汉书·地理志》说，仇池山附近有“天池大泽”。雷泽，可能就是此“天池大泽”。仇池山下的河流称“西汉水”。“汉水”，即“天上之水”。[12]《禹贡》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13]礼县出土战国时代的“家马鼎”，铭文中有“天水”字样，于是有专家认为“天水”地名源于西汉水。伏羲族所居“成纪”，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在今甘肃省东南部的天水、陇南一带。后来，伏羲族向东扩散于大片地区，因而全国各地都有伏羲族遗迹。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和西和县宁家庄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在七千年前，有专家认为就是伏羲族在陇右地区生活的佐证。

秦人嬴姓族是伏羲族的后裔。他的直系远祖就是少昊青阳和太昊伏羲。太昊伏羲和少昊青阳一脉相承，同为鸟民族。伏羲风姓，风者凤也。少昊又名挚，也是鸟部族。按照祝中熹先生观点，秦人先祖居住陇右西地（西垂）的时间，应该上溯到“和仲宅西”。《尚书·尧典》记载：“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宅西，意即居住“西”地。到夏初之际，秦族部落分布较广，“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见《史记·秦本纪》）夷狄，就包括“西都”地区。商朝时期，秦人之祖中潏部落就“在西戎，保西垂”（见《史记·秦本纪》）。到西周时，大骆、非子居住犬丘。由此看来，秦人祖先在西部陇右地区的居住时间很早也很长。《水经注》记载：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水“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大丘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西都故地之所以称为“西”，是秦人鸟图腾的反映。“西”，从字形字义分析，指秦人居住的地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说：“西，鸟在巢上也。”[14]就是“西”的原始意义。作为地名意即“鸟儿栖息的地方。”西犬丘、西垂，怎么是鸟儿栖息的地方呢？因为，秦民族为鸟夷、鸟民族。意思即这里是鸟族秦人居住的地方。祝中熹先生认为，秦人为阳鸟部族，崇拜鸟或太阳。“西”或“西山”，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于是后世“西”字又演变为“东西南北”的“西”。也有资料说，“西山”也叫“兑山”或“崦嵫山”，是太阳落的地方。秦人由于崇拜阳鸟（太阳），所以，他们的地名中喜欢用“阳”，如，平阳、栎阳、咸阳，而且，有一个地名就叫“阳”。远古时代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居民对太阳在西部落山感到很神秘，于是产生“夸父逐日”等神话。史书记载，太阳落山的地方有“西”“西山”“兑山”“崦嵫山”。《山海经》还说：“常羊之山，日月入焉。”[15]“常羊”也作“常阳”。赵逵夫教授认为“常羊山”即仇池山。西犬丘、西垂，后来作为秦国的都城，秦国人自己称“西”。居住在秦国“西都”之地的嬴姓部族，是秦人的正宗之族，其它嬴姓部落，只能算是旁系亲族。《诗经·秦风》前四首，就是西垂秦地的作品，也是陇右地区天水、陇南最早的文学作品。

二、“西都”是秦国故都

秦国创立于周孝王时期，嬴非子是其第一任国君。《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息养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谓之间，马大繁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这之前，秦人称嬴，不称秦。“秦”的名称，由此开始。“邑之秦”的“秦”，就是秦国的第一个都邑。班固《汉书·地理志》上说：“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谓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亭”的位置，一般认为在今天水市东北张川县境内。[16]

最初的秦国地盘很小，称为“附庸”。一方面，地盘非常小，不到五十里；另一方面，在隶属关系上，只能隶属于诸侯，不能直属于周天子。《礼记·王制》记

载:“附于诸侯曰附庸。”[17]《孟子·万章下》说:“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18]由此可知,秦国初创时期,只是一个依附于地方诸侯国的附庸小国,没有独立性,不能直属于周天子。现在有些著作上仍把秦附庸国,说成周朝国王的附庸,是错误的。非子居住的“秦”,当时只称为“邑”。秦邑,相当于秦附庸国所依附的“诸侯国”的一个重镇而已,还够不上“都城”的级别。

既然,非子秦邑级别较低,为附庸,不达天子,附于诸侯,那么,“秦附庸”附于谁呢?按照当时情况,只能依附于“大骆犬丘国”。因为,“犬丘”是非子父亲大骆之族的地盘,居住历史悠久,势力较大,当时,虽然不是周朝的分封国,但实际上是具有诸侯实力的地方部落国,周孝王都对它很尊重。《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分封非子时,“孝王欲以为大骆嫡嗣”,但由于申侯的建议,孝王就把非子改封于秦,大骆之地留给了大骆的小儿子成(申侯女所生)。由此可知,“犬丘”之地,是秦非子父亲大骆的政治中心。换句话说,犬丘“西都”,不但是大骆犬丘国的都城,也是秦非子附庸国的实际都城。秦邑,只能算是秦国雏形时期的小驻地,还不能称为都城,“秦”的一切还隶属于犬丘国,“西都”才是秦附庸国的真正都城,这是“西都”作为秦国故都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秦国受封于秦地之后,在秦邑居住的时间很短,有四任君主,即秦嬴(非子)、秦侯、公伯和秦仲,大约四十多年。到了秦仲的儿子庄公,又迁回到原犬丘之地。庄公从秦邑搬回犬丘居住之后,不是居住原地,而是向西推进,居住在“西大丘”。于是,“西犬丘”成了秦国的唯一都城。此后,庄公、襄公、文公等都以此为都城。西犬丘,即西都城邑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公“西犬丘”与大骆犬丘城不在一处。庄公“西犬丘”位置大约在大骆“犬丘”的西面不远处,相当于今天礼县大堡子山东侧附近。王国维也认为秦庄公返回西垂之后,“则又西徙”。《史记·秦本纪》记载:“庄公居其故西犬丘。”

西都,作为秦人先祖之地,从非子受封到庄公之前,秦国作为“附庸”小国,名义上封于“秦邑”,实际上依附于“西都”犬丘国。“西都”具有都城地位,秦附庸仍受犬丘国统辖,这从秦戎交战及相关活动可以证明。后来,庄公直接迁都西犬丘,“西都”又成为秦国的真正都城;襄公时,周朝正式封秦国为诸侯,“西都”就成为秦诸侯国最早的都城,具有政治中心的地位。秦西都,有宗庙,有墓地,又是秦人故地。“西都”在秦国的故都地位,一直保持到秦始皇时期。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首先西巡陇上,一方面祭奠先祖。同时,也是故都之游。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其中,鸡头山,就在“西都”之地,即今天西和县东北云华山。唐代《括地志》说:“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唐代成州治上禄县,即今西和县城所在地。

三、“西都”地区是秦族宗庙之地和早期秦公陵园

刘瑞先生《秦信宫考》一文中说:“秦西都”“一直到秦始皇时它的地位依然重要,原因应与其地有先王宗庙和寝陵有关”。《史记·秦本纪》说:“先王宗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西雍,即西都和雍都。

咸阳,有秦始皇陵和兵马俑,驰名中外;雍都故地风翔县境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掘出了秦公大墓;西都怎么样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同样找到了秦公墓地及众多文物,为研究秦史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填补了空白。

由于时间太久远,史书对秦在西都的历史记载比较简略,可以印证的遗迹很少,只有通过地下文物加以印证。《史记》记载,襄公、文公葬于西垂。《史记》又载,文公“葬西山”,“宁(宪)公葬西山”,“宪(宁)公居西新邑,死,葬衙。”上述记载中,襄公葬西垂,无歧义;文公既葬西垂,又葬西山,这说明“西山”即“西垂”之地的“西山”;宁(宪)公居住“西新邑”,既葬“西山”,又葬“衙”,说明“衙”与“西山”为一地,所居“西

新邑”也在西都故地。大骆、非子、秦仲和庄公等陵墓，无明确记述，但不会超出西都之地。根据以上情况看，西都之地的城池，不止一处，有犬丘、西犬丘、西、西垂宫和西新邑等等，那么，秦人墓地，也限于一处。墓地名称，按照上述《史记》所载也有几个名称，如，“西山”、“西垂”、“衙”、“西陵”等。它们是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还是几个不同地方的名称，有待进一步研究。按照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秦国故都在西汉水上游的红河、盐宫一带，但是，近年来秦公墓地又在西汉水中游的大堡子山一带发现，而且，大堡子山墓地也范围较广，包括大堡子山、圆顶山、赵坪、捷地、长道等多处，都有出土。此外，从嶓冢山、祁山、兑山（西山）及崦嵫山等山的名称来看，秦人墓地及活动范围还会更大一些，有可能分布在西汉水中上游的大片地区，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只是其中一处。“嶓冢”，按照字义，也是陵墓。从现有发现看，以大堡子山为中心，秦人活动的范围西北至今甘谷县境内，东北至清水、张川县境内，西南至西和县、礼县南部，东南至麦积山和党川镇。

秦国在西都地区的宗庙，《史记·封禅书》记载：“西亦有数十祠。”《史记》注《索引》说：“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又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史记·始皇本纪》中又载：“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史记·封禅书》也载：“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断，西畤，是秦西都之地的大型祭祀场所，规模不会太小。《史记》注《索引》还引《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祝中熹先生说：“秦人所尊崇的‘人先山’应当就是西垂地区的主山祁山，它绵延于西汉水北岸，为秦都西邑背靠的天然屏障。……秦襄公所主祀白帝少昊的‘西畤’，可能就设在祁山堡上。”⑱

综上所述，西都是秦国的故都，是秦人故地，秦民族和秦国由此兴起，具有奠基作用；这里还埋葬着秦国的王公贵族，既是秦国最早建立宗庙的地方，也是秦人最早的陵区。总之，西都之地，是一个巨大的秦史档案库和历史资料馆，其中，保存着许多秦人及秦国的历史，有待人们去不断地探索和挖掘。因此加强对秦“西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无论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还是现在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②④司马迁《史记·始皇本纪》。

③《不其簋》铭文。

⑤《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期载刘瑞《秦信宫考》一文。

⑥⑨⑩祝中熹《早期秦史》。

⑦司马迁《史记》注释。

⑧郦道元《水经注·漾水》。

⑩赵逵夫《略论“空城计”的有无与西城地望》。

⑪杨东晨《秦人秘史》。

⑫班固《汉书·地理志》。

⑬《尚书·禹贡》。

⑭许慎《说文解字》。

⑮《山海经》。

⑯徐日辉《秦州史地》载《秦亭考》。

⑰《礼记》。

⑱《孟子》。

（作者：甘肃省西和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庄浪卫蒙古裔姓氏源流考

周朝阳

内容摘要：历史是文明传承的积蓄，姓氏是文化传承过程中每个家族、每个人的标签，是文化的根源。本文就明清时期庄浪卫蒙古裔姓氏的源流作考证，对庄浪卫辖区及周边青海河、湟地区蒙古族的来源和鲁土司的延续作研讨，探讨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和趋势。

关 键 词：庄浪卫　蒙古　姓氏　源流考

兰州市永登县，古称庄浪，也称平番，明朝在此设庄浪卫，即今兰州市永登县、红古区、武威市天祝县及古浪县部分地区，以及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此地处陇西黄土高原和祁连山的交界地带。地形特点是三山夹两河，“两河”即黄河第一级支流庄浪河和第二级支流大通河，庄浪之地名由此而来。“三山”是祁连山余脉在该境内的三条支脉，分列大通河西岸、庄浪河东岸及两河之间的山脉。叶剑英元帅《西游杂咏永登》诗云：“拔海两千七公尺，昔日平番今永登。车上东滩滩上望，乌鞘白衣卧云天。”对永登和天祝的形胜作了高度概括。

这里物产丰饶，人杰地灵，历来是多民族集居的地区。早在汉代，朝廷就从内地迁徙汉族屯垦戍边，唐代中叶吐蕃入驻，明初朝廷将脱欢所部蒙古族安置在连城，清乾隆间满族入驻满城，清代回族迁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各民族的交融，这里成为以汉族为主，尚有回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居住区。在庄浪河流域的永登、皋兰、榆中、红古等地及周边地区的现有汉族姓氏中，该地有许多《百家姓》里没有载入的火、把、脱、达等姓氏。据《永登县志》载和对他们的姓氏标签研究，这些姓氏均为西域胡姓，可以探究出其先祖源于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后裔。那么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源流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他们来自元朝蒙古部族，其先祖为元朝蒙古人。现以明清庄浪卫（今甘肃省的永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兰州市红古区、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及周边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裔姓氏变迁为例，就其源流考论之。

一、蒙元的来历和在甘肃青海的活动

蒙古族是个古老的民族，长期居于中国北方，与古代的东胡、鲜卑、契丹、室韦有渊源关系，最初只是蒙古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是唐代室韦的一支，《旧唐书》称“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东岸，有许多部落，各有名号。辽、金时期多以“鞑靼”泛称其各部。十三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孛儿只斤氏即黄金家族，统一主儿乞、泰亦赤兀、弘吉剌、可烈、乃蛮、汪古诸部，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蒙古遂成现代蒙古族的族称。

元太祖成吉思汗于漠北建国后，即挥师南下，于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6年）再伐西夏，第二年春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闰五月避暑六盘山，秋七月病逝于萨里川（今甘肃清水县西江）。后其孙忽必烈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年生于甘州大佛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元朝时今甘肃全境，分属陕西、

甘肃两个行中书省和宣政院直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庄浪地区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

蒙元灭南宋后，将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即西域各族人）、三等汉人（北方原辽、金治下的汉人）、四等南人（原南宋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地位远高于汉人、南人，各行省、路、府、州、县官吏都由前两种人担任。

自元世祖忽必烈传九代至惠宗（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638年），元王朝被大明兵攻灭，汉人复国，元主及宗室被逐出中原，北遁漠北，居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之北）。元将扩廓贴木尔（即王保保）据定西，明大将军徐达出西安击之，大破元军于沈儿峪，扩廓贴木尔北走和林（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南）。明征西将军冯胜连克兰州、甘州、肃州，至此，陇右、河西的蒙古诸王部落皆投降于明，并由朝廷安置在当地定居下来。

二、庄浪卫鲁土司的来历

蒙元灭亡后，原屯驻在今甘肃及周边的蒙古诸王部落皆归附于明朝，明朝廷为了安抚投降内附的蒙古部族，对降服的蒙古诸王、头领或设卫所给诰印授以指挥等官，或授以土司，以统其众。土司是本地区本部族的首领，也是朝廷的官吏。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土司的职责是“各统其部众，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据《西北通史》《甘肃通史》载，明朝廷当时在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设有八个羁縻卫所，一般认为是安定卫（治今青海大柴旦）、阿瑞卫（今青海新疆交界一带昆仑山以北，治贴儿谷，即今青海茫崖镇尕新斯）、曲先卫（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茫崖以东）、赤斤蒙古卫（治所在今玉门市北）、沙州卫（治今甘肃玉门市境）、罕东卫（在赤斤蒙古卫西和西南）、罕东左卫（明宪宗时从罕东卫分出，卫城在沙州城）、哈密卫（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市），其地域在今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和新疆东部。其中沙州卫、罕东卫、罕东左卫、赤金蒙古卫等卫所安置的是先后内徙的蒙古部落，其主要民族是蒙古族与藏族。安定卫、阿瑞卫、曲先卫的主要民族是撒里畏兀尔人，而官员主要是蒙古人。除上述安置归降的蒙古军民卫所外，河湟地区也是集中安置的地区之一。在众多蒙古卫所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庄浪卫，其土司鲁氏即是归附于明朝廷的蒙元后裔，被朝廷授予庄浪卫连城土司指挥使。

庄浪鲁氏始祖脱欢，元朝宗室之后裔，元末封武定王兼平章政事。但是据今人研究，鲁土司不是元朝宗室后裔，即不是来自黄金家族，而只是卫拉特蒙古人后裔（见《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二期，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明灭元时，脱欢曾随元顺帝北遁未成，流落河西走廊。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脱欢率领部众投降明朝，被明朝廷封为甘肃庄浪卫连城土司。

把只罕，脱欢长子，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随父亲降明后，被授予都指挥佥事，赐姓鲁氏，名贤。后连城土司什伽因为建立军功，升任庄浪都卫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使。此即是庄浪鲁氏的由来，后数传至子孙后代鲁典，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归附清廷。

鲁土司共传19世22代，所统辖区域包括今甘肃省的永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兰州市红古区、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和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县的部分区域。有常规士兵500余名，历代土司曾因功被明清朝廷封为都指挥、都指挥佥事、甘肃副将等官职。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国民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才结束了长达561年的土司统治。

连城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是一组宫殿式建筑群。一进数院，布局对称、形制规整、雄伟森严。明宣德、嘉靖年间都有增修；清嘉庆年间，十五世土司鲁纪勋赴北京归来，又仿北京紫禁城皇宫形式做了大量修缮。至今，该建

筑群虽然历经风霜，年久失修，但是仍然不失旧日风貌。1981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又经兰州市和永登县人民政府拨款修缮。199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精心保护和修缮，现已经成为“中国西北游相约在兰州”的重点旅游景点和文物保护对象。

三、庄浪卫蒙古部族及后裔姓氏

蒙古分很多部族，一直互相争斗，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卫拉特和硕特部蒙古首领顾实汗率领部族由西域（现新疆）进入青海河湟及庄浪地区，击败喀尔喀蒙古绰克图台吉入主青海和贺兰山。追根溯源，庄浪卫辖区及整个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部族属于卫拉特蒙古。卫拉特亦作厄鲁特，为清时西部蒙古各部的总称，明时称为“瓦剌”。清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分授卫拉特蒙古诸部扎萨克，划定各自牧场，遂使卫拉特蒙古诸部驻牧区在此地相对固定下来。该部自降明清朝廷落居该地以来，为当地民族构成和分布带来明显变化。据《甘肃通史·明清卷》载，明洪武时期，朝廷规定了一系列限制胡人的政策，如禁止胡人姓汉姓以及严禁胡服、胡语、胡俗等，这无疑使大量落居庄浪卫辖区及整个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部众转而与当地民族通婚。在汉族地区，其主要表现为蒙古族与汉族的融合，在河州等民族众多的地区，演变为蒙古族与当地民族的融合。经过明清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蒙古族原有的族属特征已经十分模糊，姓氏上也逐渐取汉族姓氏。原来蒙古七大姓氏家族是蔑儿吉驼氏、都冷仓、乌兰巴尔思，秃秃黑里歹、奇渥温、察罕不花、郭尔罗斯，皆是贵族。众多蒙古部族无论贵族还是百姓，在汉化后，其姓氏很多直接取汉族姓氏为姓，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大融合的特征之一。

蒙古族后裔变迁为汉姓的来源主要有五种情形：1、以部落名称为姓。2、以氏族名称为姓。3、以祖先名字首字为姓。4、明清朝廷赐姓。5、直接取汉族姓氏为姓。

*一是以部落名称为姓。*例如《元史》汉译时错误地将奇源部误译为奇渥温氏，将成吉思汗的姓氏记为：“铁木真，姓奇渥温氏。”“奇渥温”应作奇源，明朝人贬称“乞颜”，其实是成吉思汗所属部落的名称，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奇姓均取自于此。

*二是取氏族名称为姓。*例如成吉思汗是乞颜部包尔之金氏，明朝人贬称孛儿只斤氏，其后裔取首字“包”的汉译音、以“包”为姓。还有以谐音取姓，与音近的汉字为姓，如其父名为伯颜，则子取“伯颜”首字的谐音为白姓。

*三是取祖先名字首字为姓。*例如嘎达梅林取其先祖莫勒特图的“莫”字汉译音“孟”为姓，其汉名叫作孟青山；清朝郭尔罗斯前旗王爷驻京代办富格日特的后裔取首字“富”为姓；父名为布仁，则取“布仁”首字“布”为姓；父名为“呼德”，则取“呼德”首字的谐音“胡”为姓。

在庄浪卫蒙古裔中，最典型的以始迁祖名字首字取为姓氏的“火”氏。曾有蒙古族“火你”，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内附，取字首“火”的谐音为霍、火等，更其名为“火庄”。据《金陵火氏宗谱序》，今永登县、皋兰县“火”氏源于元代丞相脱脱。元亡后，其子火石先因反明，被逮后安置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被朝廷强行迁徙安置于庄浪卫红城子（即今永登县红城镇）落籍，其后代遂以始迁祖火石先的首字“火”作为姓氏，此既为今永登、皋兰一带汉族“火”姓来源。

*四是明清朝廷赐姓。*碾伯（今青海乐都）祁氏，元裔，蒙古名朵儿只失结，元末为甘肃行省右丞，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附于明朝廷，授河州前卫指挥。死后其子端竹袭职，赐姓“祁”氏，调守西宁卫。其子孙后人祁国屏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降清，后嗣不绝。另外，西宁元裔祁延谏，也在顺治二年降

清，清廷授世袭西宁卫指挥使，其官职由子孙后代一直传续到清末光绪年间。此二者即是青海河湟地区及周边兰州等地的汉族“祁”姓来源。

碾伯（今青海乐都）阿氏，蒙元裔，世居碾伯白崖子，其祖先名失剌，元朝为甘肃省郎中，明洪武年间归附，后人阿吉扈从明成祖北征有功升总旗职务。子孙阿镇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降清，袭职，传至清末，后嗣不绝，此即“阿”姓来源。

狄道（今临洮县）赵氏，亦蒙古裔，蒙古名脱铁木尔，明初投降明朝廷后，被授临洮卫指挥同知，赐姓“赵”氏。其子孙后代赵师范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降清，授管辖临洮卫指挥使土司事务，此即是甘肃和青海汉族“赵”姓来源之一。

蒙元部族首领观音保，于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附明，朝廷赐姓名为李观。丑驴，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附明，朝廷赐姓名为李贤。

五是以汉族姓为姓，这主要指按蒙语意译成汉姓。如锡拉特蒙古语为黄，译成黄姓；查干，蒙古语意为白，译成白姓；呼和，意为蓝，译为蓝姓；阿拉坦意为金，译成金姓等。有些直接取汉族姓氏为姓，例如直接使用王、李、张等汉姓。据阿拉坦格日乐先生所编、蒙汉文对照《蒙古族姓氏录》一书载，该书共著录560余个姓氏，注释近300个姓氏之源。如：宝日努德 ，汉姓为吴 ；沙吉盖 ，汉姓为潘；巴亦拉葛赤，汉姓为边 ；蒲甘，汉姓为蒲；扎兰努德，汉姓为张。如汉族“杨”姓，来自蒙古姓氏普鲁。据皋兰县刘永山先生编写的《中堡村史话》载，皋兰县中堡村汉族“杨”姓的祖先是蒙元皇室后裔，名为飞也不花，曾在扩廓贴木尔（王保保）军中任职，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朝廷造黄册以籍人口，遂入籍临洮府金城卫东川里，此即是现定居在永登、皋兰人口众多的汉族“杨”姓来源。

现永登秦川镇（今属兰州新区）一带的汉族“把”姓，也是源自庄浪卫蒙古裔，笔者研考其来源有二，一是与连城鲁氏同源，直接取其祖先把只罕的名为姓，二是据阿拉坦格日乐先生《蒙古族姓氏录》书载，蒙古姓氏巴尔虎转为汉姓为“把”、“巴”、“胡”。再如现定居西固的汉族“达”姓始祖纳忽里，仍然是蒙古裔，其三世达里麻答思宣告以“达”为姓。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达氏先祖哈纳亚被朝廷授封兰州卫指挥，遂迁至兰州。据《西固史话》载，明隆庆年间，哈纳亚六世孙搬迁至兰州西八十里古台定居，就是现在兰州市西固区达家台，此即是兰州汉族“达”姓来源。

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汉民族是由许多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在它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成为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文化先进的主体民族。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证，蒙古族的一部分融入汉族，而汉族也有融入其他少数民族，这是在历史发展中相互融合的过程，这样才使得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优秀民族。

参考书目：

1.《永登县志》。

2.《西北通史》。

3.《甘肃通史》。

4.兰州市志第42卷《民族宗教志》。

5.胡国兴《甘肃民族源流》。

6.任文军《甘肃蒙古史话》。

7.邓明《兰州史话》。

8.毛祖军《西固史话》。

9.阿拉坦格日乐《蒙古族姓氏录》。

10.刘永山《中堡村史话》。

（作者：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张世英与清末秦州地方自治

陈尚敏

内容摘要：宪政运动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是其基础。甘肃宪政运动因前任总督升允的抵制而迟滞不前，升允在被开缺之后，继任者长庚出于时间紧迫，便采取变通作法，一边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一边调在陕西渭南作知县、在任期间自治已办有成效的张世英来甘，先在其本籍秦州（今天水）试办。由秦州自治规划及其依凭的思想资源大致反映主持者对地方自治的基本理念，同时在由秦州自治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反应中也能了解清末当地的一些社会状况。

关 键 词：张世英　清末新政　秦州　地方自治

庚子事变，皇室西狩，清廷痛定思痛，颁行变法上谕，是为清末新政，牵及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大端。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宪政运动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是其基础。地方自治思潮缘起于维新派的治国理念，从知识精英的思潮到王朝的政策再到实际推行，一波三折，几经变化。基于传统政治史观的叙述话语，既有的关于清末宪政运动研究多在政策出台、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等方面，但对各地自治实际推行情况的研究并不多见。

甘肃宪政运动因前任总督升允的抵制而迟滞不前，升允在被开缺之后，继任者长庚出于时间紧迫，便采取变通作法，一边为地方自治做准备，一边调在陕西渭南作知县、在任期间自治已办有成效的张世英来甘，先在其本籍秦州试办。显然，长庚希望张世英的秦州自治成为样板，在全省自治推行中产生示范效应，但实行仅数月辛亥风起，自治也就不了了之。就现有关于秦州自治情况的史料看，由其规划及其依凭的思想资源大致反映出主持者对地方自治的基本理念，同时在由秦州自治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反应中也能了解清末当地的一些社会状况。

一、清末甘肃的宪政运动

升允任职陕甘总督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3月，迄于宣统元年（1909年）5月，这段时间正是清末宪政运动推行的重要时期。升允被开缺的直接原因是奏阻立宪，“近年以来，法穷则变，力图自强，制作纷纷，预备立宪，固属刻不容缓之举。惟不求其本，徒袭皮毛，舍中国千年相沿之成法与我列祖列宗建国之方略。”[①]不仅立宪，其他新政，升允也多有微词。关于教育新政，他认为一无是处，“自停科举开学堂以来，合京师及各省算之，靡费以千万计，阅时八九年，成效未睹，而学生嚣陵之习，挟制官长、干犯名义时有所闻，东南风气最著。通西学者不过能充翻译、买办，精格致者不过可为艺士工师，其邪僻而无所长者，乃至勾结匪徒，倡言无忌，平权、革命并出其途。此教育失序重末轻本之所致也”；编练新军更是弊窦丛生，“闻成效素著之江鄂奉直等省亦仅衣帽步伐整齐可观，居平卫生洁净自喜，此兵家之所忌非宜也。上年安徽兵变，尽属新军，其首恶且系武备毕业学生；江南征兵亦有与巡警冲突情事，流弊至此，可谓寒心”[②]。

清末新政的开展，本有清廷自我救赎的意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对此怀有矛盾心理的疆臣肯定不止升允一人，但当新政开展已成大势所趋的情

况下，升允不合时宜的言论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宣统元年5月，升允被开缺后，清廷以伊犁将军长庚代之，在长庚未到任期间，由藩司毛庆番护理。

升允奏阻立宪思想想来也非即兴的，其形成也非一日，至于它对宪政运动在甘肃推行的影响，因限于史料，很难做出准确判断。仅从现存的两份奏折来看，升允奏阻立宪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光绪三十二年9月1日，清廷颁行预备立宪诏谕后，鉴于立宪人才匮乏，要求各省设立法政学堂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8日，升允奏改原甘肃课吏馆为甘肃法政学堂，在甘肃法政学堂的首批招生中，既有官籍又有绅籍，升允以为甘省地处边陬，“预备立宪，凡在官绅皆与有责，自应力图进步，冀获通才”，“甘肃风气不开，由于绅智锢闭，阻力横生”，特招绅班，学额五十名，每县选送一人，重点学习宪法，户籍法、警察法、教育行政、地方制度等，以一年毕业，“庶学成而归，襄助新政，不无裨益”[3]。按清廷谕令，法政学堂招生限于在籍地方官和候补官员。士绅为地方社会的权势阶层，他们对立宪精神的理解直接影响到立宪的推行。何况宪政运动的实质是“纳民于政”，要求人民参与政治。升允特设绅班，实属有见地之举。宪政运动的实体在中央为资政院、在省为谘议局、府州县为议事会。在同年12月26日，升允奏设甘肃谘议局筹办情形折时就有了明显的拖延之意：“惟是甘省僻处边隅，民智锢弊，语以议员资格、选举章程，多茫然不解所谓，况境域寥远，文报需时，将来按期程功，殊无把握。”[4]翌年上半年，升允就连续上疏，诋毁新政，阻挠立宪。

按清廷规定，甘肃谘议局议员额定43名[5]，光绪三十四年6月24日诏谕，“著各省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谘议局)限一年内一律办齐。”[6]张慎微《宣统年间甘肃咨(谘)议局概述》称甘肃谘议局成立于宣统元年9月9日，议员27名。议员地域分布为皋兰县4名；永昌、肃州(治今酒泉)、岷州(治今岷县)、安定(治今定西)、西宁、平番(治今民勤)、秦州、静宁各1名；靖远、伏羌(今甘谷)各2名；凉州、宁夏满营各1名；其余籍贯不详。27名议员当中可考身份的有24名，其中17名拥有科举功名[7]。甘肃谘议局未能按时成立、首届议员未能足额以及议员地域分布不广，也应与升允抵制立宪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事变动有关。

宣统二年本是清廷规定地方自治正式推行之期，长庚于宣统元年(1909年)10月抵任，也就是在升允开缺5个月之后，地方自治“一切事项尚付阙如”。鉴于前任的教训，长庚自然不敢再有所迟延，即着手成立自治筹办处，设立自治公所；清查户口，调查选民；选举议事、董事会职员；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遴选熟悉法政之员，充当讲员、所长等。终因开办较迟，端绪纷杂，在有些问题上只能采取折中办法，如法政学员的培训由一年改为六个月，虽言“讲授课程，悉遵照奏定各项科目”[8]。对此只能是姑妄听之。

清末甘肃地方自治在县一级的实施情况，地方史料载录无多，稍有例外者如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6《民政志·自治》，对当时该县实施自治的情况略有叙述：“清宣统元年三月，邑宰宋运贡奉令开办自治，二年六月一日设立自治公所于本城西街昭忠寺，由邑绅公举举人张宸枢为所长，附生张有敬、刘渥恩副之，以专责成，并选送李之英、焦述志等人赴省立自治研究所听讲，以为办理县自治研究所之师资，一面设立总调查处于县城中，分调查处于各镇，均设处长一人，处员若干人，协同各区巡长、绅士调查户口”等，自治尚在机构设置阶段。另有秦安士绅巨子馥自撰年谱，对本籍自治略有叙述，巨子馥自宣统元年从新疆阜康知县卸任归里，二年，“倡立自治公所，报地点在兴国寺，黄国琦(时知秦安县)上报甘藩司，委任筹办所长”；“自治经费无着，上请长庚准由地方公产筹画，然一以收回城隍苇苗、春场一带房租”；三年，“辛亥新政名色日多，公所又有议事、参事两会，余与薛仲升分任会长”；秋，“军兴奉文暂缓筹办”[9]。

仅此而已。

二、秦州自治规划及其思想依据

张世英，字育生，秦州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进士，获馆选。曾在陕西渭南等地任知县，“大计卓异，除州陟府，传旨嘉奖者五次，政绩为三秦之最，循良称全陕第一”[9]。张世英是在宣统二年重阳前一日抵家，先后两次到省城兰州，与总督面商自治事宜，并邀集本籍人士完成其基本的自治规划，并到乡村作了宣传动员等工作。直到宣统三年阴历六月自治才开始进入实际推行阶段，三个多月之后辛亥风起，全省新政一律停止。

张世英地方自治规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基层社会的行政区划上实行区、社、村、甲四级单位，各立之长。百余户为甲，五百有余为村，三千五百有余为社，五千有余为区。

在地方税收方面成立经征局。设有总副办各一，提调稽核员各二，均尽义务，轮流值日。职员有文牍、书记、庶务各一，均举妥绅充当，薄支薪金，常川驻局。局内分民、屯两科。每科派书差各十四人，以供缮写。经征办法举地方岁入正、杂各款，悉由该局征收。除正供赋税照旧如数征解外，至于盈余陋规与书差额外浮收之规费，均酌量减轻，化私为公。

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主要涉及民间教化、治安和风俗三方面的内容。诸如成立夜学巡更，寓维护社会治安于教化，即“巡更之处为教学之地”；成立息讼会，“民间纠纷先由村长、社长解决，如若解决不了，然后呈递官府”；成立乡甲约，“采用吕氏乡约法，每逢朔望，由绅士召集民众，序齿分班，尊长少幼，依次行礼，然后讲演孝友睦姻之方，助扶捍御之术”；成立崇俭会，“专为矫黜习俗奢侈而设”[10]。

张世英的自治规划理念基本来自于儒家思想。如基层社会区划，是变《周礼》比、闾、族、党为区、社、村、甲；成立经征局是为了“限制里老、乡约沟通书差勒索截粮”，“严防乡约、当事籍公肥己”，“作《政教备忘录疏证》，销纳轻弊恤民，条陈于《乡官书考法》，即司徒十二教中”；倡行乡饮酒礼、婚礼、冠礼等，旨在“救当时《礼记》、《阴礼》等教之失”[11]。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重教化、厚风俗都与儒家文化有深切的渊源关系。张世英特别重视古礼古法，诸如对婚礼、冠礼、乡饮酒礼等的倡导。礼在原初带有鲜明的阶级特色，“礼不下庶人”为其规定，但在传统社会后期，伴随着理学思想的庶民化，礼开始下移，成为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政府行为的“乡饮酒礼”以尊老外，其婚、冠之礼的仪式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官方也顺乎舆情加以倡导，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法制度。张世英还重视敬宗收族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的实质是对血缘的重视，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其反映。由血缘伦理向社会伦理以及政治伦理外推，朋友以兄弟相比附，君臣以父子相比附，血缘伦理不断被放大和泛化，伦理性社会在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说到底是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因而敬宗收族观念也为官方所倡导。上述大致可见张世英地方自治规划所依据的思想资源。以儒术缘饰吏治，本是传统政治的特点。

三、秦州自治与地方社会的反应

秦州自治虽然推行时间不长，但社会反响强烈。“天水若要好，先死张育老(张世英)”[12]，即其明证。民国《天水县志》卷11《人物志》对此亦有一定叙述：

潘世俊，庠生，张绅世英创办自治，民多疑谤，独俊赞之甚力。银粮官收诸弊丛生，立经征局，身自经理，厘剔中饱，官忌侵权，诸多掣肘，俊以坚忍持之。

李天煦，庠生，尝襄赞乡绅张世英轻弊恤民。其练团、兴学、保甲诸条规及歌词，多天煦所拟。忌者几焚其居，弗顾也。

萧汝玉，庠生，张世英倡办地方自治，汝玉赞襄轻弊恤民诸端，颇为官庭所不喜……某官率众入其室，屯聚践掠，毁其家。

其中原委最主要是经征局的设立，侵犯了地方

官府的利益，包括依附政权机构的书吏衙役以及相关利益者。经征局的成立，主要针对税赋征收中的陋规，目的在于杜绝书吏衙役伙同基层社会里老、乡约的浮收冒滥等弊端。

清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实际上操之于三班六房，三班指的是壮、快、皂衙役，除了催督和征解税收外，还负责指传人证，缉捕盗贼等外勤事务；六房指书吏，各州县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具体办理文书、档案等内勤事务。这些人不属于国家正式的行政人员，流品纷杂，地位甚至在一般平民之下，但做的却是正式的行政工作，他们按规定只能得到微薄的工食银，因此在征税和经手讼案时，书吏衙役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三班六房受雇于地方官，是他们的私人力量，其低微的工食银也由地方官支付。在地方赋税征收中，书吏衙役代表政府执行任务，在具体的乡村地区由乡约来完成。乡约产生于宋代，本是一种民间教化组织，但在清代中后期，乡约发生了职役化，主要在于协助政府完成征税任务，因为利益的一致性，乡约与书吏衙役相互勾结，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清代州县政府陋规的产生及其引发吏治腐败显然有其制度根源。

秦州向为甘肃腴区，产粮较多，平日三班六房等的舞弊情形就会更加凸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任内阁中书的秦州籍进士任承允和举人白映震等地方士绅联袂向州署揭发书吏衙役的贪渎情状，知州李瑞徵不得已受理此案，审问属实，要求书吏衙役将历年所浮收的粮款限十日内如数交出，否则囚禁或被处死。当时这伙人共200余人，面对此情，不得不做出应对措施。他们认为官府怕洋人，惜助神甫保护为其上策，于是他们集体到秦州天主教堂请求入教。时任陕甘总督的崧藩唯恐惹起中外交涉，竟将知州李瑞徵撤职，申斥地方士绅，对书吏衙役之浮收粮款等情，因事属既往，免予追究，只是要求教堂退出他们的教籍，送回衙署继续办公[14]。

书吏衙役虽不是国家正式的官吏，却因依附国家政权而在乡土社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清代官员铨选有着严格的回避制，官员来自他省，且调动频繁。书吏衙役与官员不同，其任期没有具体规定，只要不犯重大过失，可以任职终身。由于他们和官员利益的一致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州县官吏、书役之弊之日增月盛。由于大府之体恤州县，州县恃以无恐，强取巧图，有加无已，遂不得不体恤书役”。做了二十余年知县的张世英对此自然有着切身体会：

> 盈千之禄养，尚不足牧令一岁之用乎！六房三班之服劳，尚不给一官之使乎！而难之者则曰：“一署眷属、亲戚、幕友、家丁、厨夫、奴隶之众，各处馈赠、输助、派摊及家乡亲友接济，需用之费，盈千之入能给求乎？”摧征、唤案、供差、供述、解犯、辑捕之役，新政造册、填表之类，卷案之繁，备于往昔。上领工食，既苦无几，本官津贴，亦属甚微。惟房与班所取于民之项，所供役使之数，不再加增，已为幸事，尚何轻减之有？不知朝廷设禄，只代一官之耕，其余家属，均应执业自养。自浮征端开，始而家属，取给于官，既而族戚取给于官，友朋取给于官。久之，无论相识与不相识，而凡懒惰好逸之人，则皆取之于官[15]。

清代地方官俸银甚微，但却有着极强的支付能力，其实“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按规定数目报解税银后将其余部分截归己有。换句话说，在政府中公私财产分界不明使地方官员常常借征税之机化公为私”。[16]经征局的设立，对地方官、书差衙役等沆瀣一气，巧取豪夺，可谓是釜底抽薪，遭致地方官的反弹自然就不难理解了。“初，先祖（指张世英）之归也，欲以其治关中者移之陇上。而昔为官，今为绅，事权迥不相侔，终龃龉不得自行。其志惟创立经征局以便民而已。”[17]“欲以治关中者移治陇上，而客官皆不悦，阴排挤之。”[18]

经征局的设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应该是直接的受益者。当地流行的谣言，其实也反映了民众对张世英的不满，要因还在于秦州自治所制定的一些规条过于苛严和僵硬。如成立夜学巡更，每夜齐集民众，“课以简易识字及警章，间夜体操或器械”；成立乡甲约，“采用吕氏乡约法，每逢朔望，由绅士召集民众，序齿分班，尊长少幼，依次行礼，然后讲演孝友睦姻之方，助扶捍御之术。听毕退散，使之爱群而有亲上敌忾之风”。谁说这不会影响到普通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他如“嫁女索聘毋过六金，极贫四金、二金均无不可，富者妆奁限以百金”；“娶妇只期成礼，非为欢宴，本不应贺来，照应着略款酒食，贫者更无论矣”；“宴会禁用珍错，至多十品，至少二品，下酒多八碟，至少二碟”；“冠礼不妨数家合办，每家出钱无多，不过一串”[18]。厉行节俭，作为倡导，本无可厚非，但将其量化，规定过死，未能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情况，势必会招致反对。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特别是庚子赔款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社会深陷危机之中。在此情境下，政府不断扩大税源，加大对民众的榨取，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清末新政的开展，其费也并非政府财政挹注，多取自于对民间的苛捐摊派，这势必会激起民众强烈的抵触情绪。

四、余论

清末地方自治是在民主宪政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后，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时，发现各国都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作为立宪之基础一时间受到朝野各方的重视。清廷制定一系列章程也是为了自治在推行过程中有据可依。像宣统元年，清廷颁布《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自治研究所章程》，前者规定限年内全国各府厅州县一律成立议事会、董事会等领导机构，就地方教育、实业、捐税征收等事务实行自治，并规定先在城区进行实验，而后推及乡镇[19]。后者规定在各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以“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还将“城镇乡应办自治各事，演为白话，刊布宣讲，以资劝导”，旨在为地方自治做好人员和思想准备[20]。就秦州自治的情况看，也并未按规定的先城区、后乡镇的次序来进行。至于成立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在秦州自治中尚付阙如。张世英为了宣传自治精神，也曾延请陕西人李坤生为秦州自治讲员，并邀周子扬“遍历四乡，为之演说，到处纪事以诗”[21]。但毕竟事出仓促，准备不足，也就是说，秦州自治是在社会动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推行的。

地方自治，顾名思义，即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以地方之人谋地方之公益。按章程规定，地方自治受地方官府主导，由地方人士具体执行。“自治之事渊源于国权，国权所许，而自治之基乃立。由是而自治规约，不得抵牾国家法律，由是而自治事宜，不得抗违官府之监督，故自治者，乃与官治并行不悖之事，绝非离官治而孤行不顾之词”，“自治与官治，乃有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之势”[22]。晚清无论维新派还是立宪派都希望通过兴绅权来伸民权，这种思想基于旧有的行政机构在日常运作中暴露出所谓“制度疲软”的严重问题，换言之，新政的实施仅靠正式的行政机构是无法顺利完成的，所以一些主张立宪的官僚上奏朝廷要求将地方士绅纳入因新政开办而设立的政治性机构，这在其发生模式上与传统“以绅治辅官治”相类近，只是绅权得到了制度性的支持。就秦州自治的情况而言，其主导权在总督，这就撇开了州县官对它的监督和控制。张世英之所以能够在自治时设立经征局，掌控地方财税大权，是与自治的主导权在总督一级有着直接的关系，经征局设立是基于以往税收征收时的“陋规”，从道义视角而言无疑有着其合理性，但税收征收最能反映对社会的控制，它本是现行政府权利的体现，也是维持其正常运作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架空地方政府的作法，只可视为一种对公共权力过激情绪的宣泄。清末宪政运动是改革，而非革命，其属性是温和的，需要照顾各个阶层的实际利益，在程序上需要渐

进，甚至是妥协。

另外，主持者对自治精神的理解都会影响自治将要产生的预期效果，在秦州自治中，张世英自治设计所依凭的思想资源以及一些规约也纯属旧套，其思想境界不脱传统乡绅的特点，也就是说秦州自治未能呈现应有的新意，所以对其评价无须寄予过高期望。

注释

①《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17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补录开缺甘督升允痛诋新政折》，《盛京时报》1909年8月10日。

③《陕甘总督升允奏甘肃遵设法政学堂酌拟办法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00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陕甘总督升允奏甘省设立谘议局筹办处情形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97页。

⑤《宪政编查馆等奏拟定各省谘议局并议员选举章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69页。

⑥《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均照所议办理著各督抚限一年内办齐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71页。

⑦张慎微：《宣统年间甘肃咨议局概述》，《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内部发行。张慎微的父亲张云锦为第一届省谘议局常驻议员，留有一定数量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其中有当时议员全体合影照，清晰尚能辨认，照片上有27人。另外，该文录刘尔　题大会照片诗，“时事纷纭旧变新，阿谁还是葛天民。千头万绪从何说，也怕难为念七人。”“念七人”即“廿七人”。但该文又讲皋兰籍议员刘尔　未参加全体摄影。——照片上的人数与相关的文字记录并不吻合，原因不详。民国《甘肃通志稿》卷81《议员表》称，甘肃咨议局有议员43人，其中满族驻防专额议员三人，具体议员待考。甘肃谘议局首届议员未达到清廷规定的数额，满额是以后两年补上去的，并非首届议员数。

⑧《陕甘总督长庚奏设立地方自治筹办处并地方自治研究所情形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51页。

⑨巨子馥：《秦安巨子馥先生年谱（下卷）》，稿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

⑩民国《天水县志》卷11《人物志》。

⑪民国《天水县志》卷4《民政志》。

⑫张绍蕃：《清授中宪大夫花翎陕西候补知府显祖考育生太府君行述》，民国铅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

⑬新修《天水市志》，第2699页，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⑭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6。

⑮张世英：《拟覆上长治军书》，民国《天水县志》卷12《艺文志》。

⑯［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3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⑰张绍蕃：《清授中宪大夫花翎陕西候补知府显祖考育生太府君行述》。

⑱民国《天水县志》卷11《人物志》。

⑲民国《天水县志》卷4《民政志》。

⑳《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25页。

㉑《自治研究所章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47页。

㉒张绍蕃：《祖庭闻见录》，民国铅印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

㉓《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25页。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教授）

抗击吐蕃收复河陇的归义军首领张议潮评传

程对山

内容摘要：唐朝“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河西、陇右地区。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领沙州(敦煌)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先后收复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咸通二年(861年)，率蕃汉兵士七千人收复凉州，使凉州重新回归中原唐朝，被后世赞誉为“西域雄狮”。本文记述了张议潮在唐朝渐趋衰败的危难情况下击败堪称强悍的吐蕃王朝的事迹。文章以翔实的史料叙评了张议潮收复瓜廓十一州的历史背景，重点描述了“收复凉州之役”的艰难历程和重要意义，特别对张议潮治理凉州时采取措施推广中原文化、重开丝绸之路等历史功绩予以准确评价。

关 键 词：归义军　张议朝　评传

大唐宝应二年(763年)春，史思明摩下将军田承嗣献莫州投降，拘执叛军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家室妻子至唐军。史朝义被迫率五千步骑逃往范阳以图和李怀仙会合。然而，李怀仙也已率军向唐朝投降，范阳一带悉为唐军收复。史朝义顿感无路可走，遂自缢而亡。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始告结束。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是年，唐代宗李豫继位，改元广德。秋天，居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突然兴兵攻唐，占领陕西凤翔以西、邻州以北的十几个州郡。至十月又占领奉天(今陕西乾县)，很快攻至长安，唐代宗仓惶出逃，弃长安至陕州避难。而后，吐蕃占领首都长安竟达十五日之久。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廓州、凉州、兰州、瓜州等地相继陷落于吐蕃，吐蕃政权在河西置西凉府。

大中元年(847年)，唐王朝渐趋衰落，吐蕃王朝进入鼎盛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甘凉十一州归唐”大起义暴发，起义军首领就是被后世赞誉为“西域雄狮”的张议潮。那么，“甘凉十一州归唐”大起义是如何发生的？张议潮究竟如何以单薄之力，击败吐蕃王朝呢？

一

张议潮(799～872)，又名张义朝，贞元十五年(799年)生于沙州敦煌县。其祖父张季曾为唐朝北都节度留守，支度营田转运使，父张谦逸曾在德宗李适当政时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两岁的时候，即建中二年(780年)，沙州陷于吐蕃。史载，当吐蕃军最后攻取沙州时，虽然沙州与唐朝的联系中断，但城中军民却顽强抗击。沙州刺史周鼎一边据城固守，一边向回鹘求救。但救兵经年不至。周鼎召集诸将商议，欲焚毁城郭，率众东奔。部众都不同意，都知兵

马使阎朝便缢杀周鼎，自领州事，继续抗击吐蕃军。当时沙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军粮问题，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最后，“粮械皆竭”。为了保护城内兵民，阎朝与蕃将绮心儿相约，“苟毋徙佗（他）境，请以城降”。在绮心儿许诺不将沙州人民外迁的前提下，遂于建中二年（781年）出城投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陷落后的河西人民惨遭吐蕃剥削蹂躏，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新唐书·吐蕃传》）中唐诗人张籍在《横吹曲辞·陇头》一诗中描写了当时凉州陷落时的惨状：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的诗句，形象反映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凉州人民日夜思归唐朝的强烈心理。开成年间（836～840），唐使者赴西域，途中“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蕃之人见唐使者旌节，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其人皆天宝中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即使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仍念念不忘大唐皇朝。

张议潮自幼对吐蕃的残暴统治耳濡目染，对大唐故国心驰神往，立志要驱逐侵略者，回归故国。在黄永武所撰的《敦煌宝藏》所收的民间俗诗中，收录了张议潮在少年求学时期所写的一首《无名歌》：

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今年苗稼看更弱，坟榆产业须抛却。不知天下有几人，只见波逃如雨脚。去去如同不系舟，随波逐水泛长流。漂泊已经千里外，谁人不带雨乡愁。舞女庭前食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外空墙庭，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凄逗处，段段茅花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一段四六言赋体的小注，“所在君侯，勿须恼乱。发意害彼，不知自伤。此世招得恶名，当来必酬苦果。”在诗的末句尾注为“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此诗写于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年（815年），即乙未年，所以诗注简写作“未年”。当时张议潮只有十六岁，正在一所寺庙中求学。诗歌的内容写的是吐蕃奴隶主占领敦煌时期的生活，描写了百姓奔逃与漂泊的情景。当时民怨沸腾，物价高涨，米卖到“千钱”的高价，二顷田地收的粮食尚不能交上高额税收。通过贫富对比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百姓的悲惨的生活。最后的赋体小注强调了作者训诫的作用，写法隐蔽而委婉，采取托古曲笔手法。“君侯”暗指的是陷蕃的人，要大家无须烦恼和心乱，意思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倘若现在就发难于诗中称为“彼”的吐蕃人，反而会自找伤害，从而招得吐蕃人所谓的“恶”名，迎来的是必酬失败的苦果。为了实现驱逐吐蕃，收复河西的远大志向，张议潮刻苦学习兵法和武艺，并以自己的家产为军资，秘密招募，训练义军，同时不断收纳反抗吐蕃起义被镇压后的流亡人员，蓄积力量，伺机发动反抗吐蕃统治集团的群众战争。

会昌年间（841～846），吐蕃灾荒连年，人皆饥疫，死者枕藉。吐蕃内部尚婢婢和尚恐热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厮杀，一时大乱，吐蕃势力渐趋衰落。大中年间（847～859），唐朝乘机收复陷于吐蕃的三州（原州、乐州、秦州）和七关（石门、驿藏、木峡、特胜、六盘、石峡和萧关），极大地鼓舞了河西各族人民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不久，吐蕃首领尚恐热率五千骑兵来到瓜州，大肆劫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趁此时机，张议潮暗中结交豪

俊，密谋归唐。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见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张议潮变文》载，张议潮等率众驱逐吐蕃守将，“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顺利收复沙州，即派遣使者，赴京师告捷。当时，凉州等地仍控制在吐蕃手中，东道受阻，张议潮的使者，不得不迂道东北的天德城，至大中四年正月，才将捷报传至京师。接着张议潮又修缮甲兵，且耕且战，先后收复了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和廓州等十州。大中五年(849年)八月，复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以及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复归唐朝。唐宣宗大力褒奖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等差。十一月，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统领沙、甘、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张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

二

收复瓜廓十一州之后，张议潮以瓜州和沙州为根据地，对外征讨，扩大战果，巩固归义军政权收复河西的胜利成果。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是相当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吐蕃国内，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诸州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新唐书·吐蕃传》)。这些势力纠合在一起，对河西各地构成巨大威胁。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张议潮变文》记述了大中十年(856年)开始的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议潮出兵讨伐，两军在西同附近相遇，张议潮首战破敌，吐谷浑王败逃。张议潮率军乘胜追击一千余里，并大获全胜，活捉吐谷浑宰相三人，斩首示众，凯旋而归。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议潮奔袭，回鹘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沙洲军大获全胜。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议潮闻知大怒，愤而率兵反击。《张议潮变文》载，“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咸通七年(866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了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归义军控制河西的势力范围，已经达至陇右诸地。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凉州 。凉州是西汉以来的河西重镇，在唐朝前期一直是阻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驻地。吐蕃统治时期，又将凉州设为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里，那么张议潮所提出的收复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河陇地区，张议潮便从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率军开始了东征凉州吐蕃的伟大壮举。此时的凉州已经聚集了大批吐蕃军队，另外还有河西陇右地区败退至凉州的吐蕃军，军力十分雄厚，导致了凉州战役变得极其艰难。从广德二年(764年)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败逃算起，凉州已经落在吐蕃手中将近一百年之久。吐蕃自从攻取凉州之后，一直驻重兵防守。为了防止归义军进攻凉州，吐蕃军队早就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再加上占有地利优势，因而摆出一副与张议潮在凉州决战的架势。对于张议潮而言，如能夺取

凉州，吐蕃军队就会被彻底赶出河西，从而才能有效地控制河陇地区。对于吐蕃而言，经营凉州已近百年，根基稳固，此时更是把凉州作为嵌入河西的最后一根钉子，自然不能轻易撒手。双方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凉州之战一触即发。

三

为了夺取进攻凉州的胜利，张议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沙州起义胜利之后，经过和吐蕃的连年征战，在河西沿线给大军筹集调运粮草有一定困难。张议潮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因而在归义军各部精心挑选了七千名精壮士卒。士兵由汉族与诸少数民族人员共同组成，其中既有汉族子弟，又有粟特、吐谷浑和嗢末等民族成员，还有吐蕃降部和回鹘军队，甚至还有一大批蕃汉僧兵。各个训练有素，勇敢善战。张议潮又选派了诸多猛将，如侄子张淮深、女婿李明振、索勋，归义军押衙高进达、索忠顗、阴季丰、王景翼及归义军兵马使康通信等，这些将领都是在沙州起义之后在历次战争中锤炼出的猛将。

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二日，张议潮与侄子张淮深率领七千精锐，开始征讨凉州。

唐朝时，凉州辖姑臧、神乌、昌松、天宝、嘉麟五县，吐蕃军队在各县分兵驻守，尤其在凉州西北部的门户天宝、嘉麟(今永昌县一带)等县设置重兵把守。张议潮率军到达凉州之后，立即挥军进攻。《资治通鉴》载，归义军“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其战斗激烈可见一斑。归义军一时无法攻破堡垒，双方在凉州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敦煌出土的《张议潮变文》中收录的一首诗歌描写道：“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通过诗歌形象的语句，可以感受到当时攻克凉州的战事的惨烈与艰难。

咸通二年(861年)九月，张议潮终于攻克凉州。参加归义军对凉州战争的净土寺僧人谈广仲父法心，出家前是归义军的一名军将，参加了凉州之战。郑炳林所著《教煌碑铭赞辑释》收录了由其撰写的《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文中写道，“本自轩门，久岁族筛。三秋弥猎，陪太保以南征。万里横戈，执刀艇于瀚海。既平神乌，克复河湟。遂辞旌戟，南人洪源。舍俗出家，俄然落发。”此则文献中的河湟，指今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即唐代鄯州管辖范围。洪源，在凉州昌松(古浪)县南。可以推知张议潮的归义军收复凉州后一直追击吐蕃残兵到昌松、振武、鄯州等地。《张淮深碑》称颂此事道：“姑臧虽众，不寇坚营。忽见神兵，动地而至。无心掉战，有意逃形。奔投星宿岭南，苟偷生于海畔。我军乘胜逼逐，虏群畜以川量。掠其郊野，兵粮足而有剩；生擒数百，使乞命于戈前。魁首斩腰，僵尸染于秦莽。良园既遂，据祖父之沉冤。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

四

收复凉州后，张议潮即遣使入告朝廷，奏曰：“咸通二年收凉州。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冲要，为东夏关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之则外无堵堑之固。”十月，唐懿宗敕曰：“凉州朝廷旧地，收复亦甚辛勤，藩屏长安，固不抛弃。”随后，朝廷就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凉州的控制和防护。首先对凉州城的城防状况进行加固，以加强凉州的防御能力。《资治通鉴》载，咸通四年(863年)春，皇帝游宴，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史学家胡三省注曰：“西凉，即凉州，盖此时谋进筑也。”表明咸通四年正月以前唐政府就已开始加固凉州城，反映了朝廷对凉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是年五月，

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显示其控制凉州等地的决心。朝廷向凉州派遣二千五百人的鄯州兵，以增强凉州的军事力量。《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记载，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凉州留后孙超遣使者晋见唐明宗时，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发鄯州兵二千五百戍之。”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

张议潮攻克凉州之后，标明河西地区才得以完全收复。《张淮深碑》称之“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对于在凉州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堪称英雄盖世之功。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张议潮在敦煌莫高窟修建洞窟，并在主室南部下面绘制了统军出行图，题为《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扫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当朝进士、秘书省校书郎、著名诗人薛逢听到张议潮收复凉州的消息后，欣然提笔，在长安写下一首《凉州词》：

昨夜蕃兵报国仇，
沙州都护破凉州。
黄河九曲今归汉，
塞外纵横战血流。

朝廷为了表彰收复凉州之功，诏令李明振因功授凉州左司马，驻守凉州。《李明振墓志铭》载，李明振“二十余载，河右麾戈，克复神乌，而一戎衣。”归义军押衙索忠顗驻守神乌县，《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载，索忠顗“勇冠三军，射穿七札，助攻六郡，决胜先行。攻五凉而克获，驻军神乌，镇守凉城。”归义军兵马使、凉州西界防御使康通信驻守天宝县，康通信“助开河陇，效职辕门，姑臧守职”，为番禾（今永昌县）镇将。姑臧县由河西都防御使右厢押衙王景翼驻防。史载，王景翼“助开河陇，决胜先行，身经百战，顺效名彰，刚柔正直，列职姑臧”。归义军押衙高进达驻守嘉麟县，押衙阴季丰被朝廷敕命为凉州都防御使。

五

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之后，开始经营管理河西地区，大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内政方面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的建制。归义军在乡一级还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在凉州城内，归义军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与此同时，张议潮还仿照内地，设置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管理制度。其次，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归义军时期的户籍，除注明人口情况外，还注明了各户土地亩数与分布情况。针对当时荒田闲地较多的特点，张议潮实行请田制度，即允许百姓向归义军衙门申请耕种荒田闲地，对于百姓之间自愿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官府一般也予以批准。在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出土的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地子完全按亩交纳，纳的是粮食。官布、柴草也是按亩交纳的。为什么地税中既有地子，又有官布和柴草呢?这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河西地区还没有实行货币经济有关。因为在吐蕃统治凉州时期，实行部落将制和突田制，唐王朝的通用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的是原始的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由于货币极度缺乏，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仍以麦粟、绢帛、布匹等实物计价。从已知的出土敦煌文书看，在交换领域除以麦粟计价者外，以布匹计价者也

很多。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货币反而不是普遍的交换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张议潮的归义军政权才将唐朝赋税制度中应交现钱的那部分税收改为征布或者其他实物，因此在今天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征收官布和柴草的记载。

《资治通鉴》称“河西创复，尤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瑁末，雷威摄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规俗一变”。在社会生活中，张议潮着力恢复唐朝服装，在凉州地区推行汉化生活方式，很快就使凉州成为“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在吐蕃时期被废弛的各项水利设施也被重新运作起来，并在河西诸州重新开挖沟渠，设立专职水利管理人员，使河西农业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对此，有诗曾盛赞张议潮治理凉州的功德：

> 三光咋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州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沟渠。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无名氏《赞张议潮》）

本诗通过略带夸张的笔调，赞颂了张议潮治理凉州政绩卓然，如同古代圣君“尧帝”一样。“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州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沟渠”等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归义军管理时期的凉州大地田舍平整，生机勃勃的欣然景象。

张议潮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那些已经受到汉化影响者则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保持吐蕃化生产生活习俗的则继承吐蕃制度，尊重他们的习俗，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管理和统治。对于吐蕃民族中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活动，张议潮采取废除僧官制度，恢复唐制管理的宗教事务政策，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削弱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后来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河西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不再发达，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这样的改革活动使全社会的劳动力都得到充分利用，有效的促进了凉州的生产发展。经过张议潮的努力，河西凉州的各族民众开始和睦。

六

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张议潮离开凉州，前往长安。《张淮深碑》称之“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议潮入朝后，授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给予很高礼遇。

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张议潮卒于长安。唐朝追封张议潮为太子太保。张议潮病逝的消息传到河西地区，万众悲哀，哭声动天。

大顺元年（890年）张淮深去世后，张议潮之子张淮鼎继任河西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开始执掌归义军。唐末，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咸平五年（1002年），归义军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曹宗寿掌握归义军。宋朝以羁縻对待，依然以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归义军也和辽朝开始通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寿卒，其子曹贤顺即位。天禧四年（1020）和天圣元年（1023），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贡物品。景祐二年（1035年），归义军为李元昊所灭，第八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以千骑投降西夏。

张议潮收复凉州的战争消除了吐蕃对归义军的阻隔和威胁。收复凉州以前，归义军的使节通使唐朝一般取道回鹘地区，走蒙古草原到天德军的北道。这条道路绕道很远，行走艰难。凉州收复以后，敦煌归义军的使节可以直接经由瓜、肃、甘、凉、灵武、义渠、邠州到长安。《张淮深碑》称颂此事道谓“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

郡山河，宛然而旧”。收复凉州的战争对唐朝影响巨大，唐朝的治理范围扩展到青海地区，鄯州等地也属于归义军管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归义军与唐朝管辖范围的连接。所以这是唐史中唯一记载到归义军的一次战争。《新唐书·懿宗纪》载，咸通三年“三月戊寅，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克凉州。”《新唐书·吐蕃传》载“咸通二年，义潮奉凉州来归。”张议潮收复凉州之役，收复了唐朝失去近百年的河西土地，之后在凉州地区推广中原文化，重开丝绸之路，河西地区重现繁华生机。

（作者单位：武威市地方志办公室）

甘肃省志四部专志通过终审

2017年10月12日，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终审通过《甘肃省志·人物志》《甘肃省志·农业志》《甘肃省志·国土资源志》《甘肃省志·审判志》4部志书。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黄强常务副省长指出，地方史志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将精品意识贯穿编纂工作全过程，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甘肃特色的精品佳作。

黄强常务副省长对终审通过的四部志书的编纂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对各位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在编纂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快工作进度，树牢精品意识，进一步提高志书编纂质量，精心打磨，精益求精，确保全省二轮修志任务在2020年全面完成。要坚持修以致用，注意抓好读志用志工作，宣传好志书所记述和反映的甘肃各领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所总结的实践经验，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服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孔令奇供稿）

甘肃史志 GANSUSHIZHI

2017年第4期（季刊）（总第32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